

语言 与文化

论坛

2020年

Forum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第一辑

叶兴国 余玲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年. 第一辑 / 叶兴国, 余玲
主编.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20. 8
ISBN 978-7-5108-9307-0

I. ①语… II. ①叶… ②余…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30562号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0年. 第一辑

作 者 叶兴国 余玲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定州启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8.5
字 数 183千字
版 次 202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9307-0
定 价 3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主 办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语言与文化论坛》编委会

主 任 徐真华 费君清（特邀）

主 编 叶兴国 余 玲（执行）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晓宇 王 宏 王 峰 冉永平 孙玉华

孙绍振 齐沪扬 吴秀明 宋协毅 张 江

陈众议 陈 龙 陈思和 陆经生 陆建德

胡剑锋 修 刚 聂珍钊 贾文键 曹德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宗杰 史忠义 朱文斌 刘家思 许金龙

李建英 李贵苍 杨小平 杨爱军 吴国良

吴 笛 何建乐 何海翔 余卫华 张仕英

张 明 陈文涛 金健人 周颂伦 赵海峰

栾 栋 戚宏波 葛金玲 韩岳峰 魏大海

魏小琳 Georges Ubbelohde

编 务

陈俊伊 陈晓烨

前 言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讨论，并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该研究覆盖面较大，既包括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宏观分析，又包括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文学作品等关于语言与文化特征的具体介绍，还包括语言的多种社会功能以及文化对语言形式产生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论坛》为综合性人文学学术出版物，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主办、九州出版社（中央一级综合性出版机构）出版。本书坚持以会通中外语言文化、关注学科发展前沿、注重基础应用研究、促进人文学学术交流为宗旨，探讨不同语言与文化理论、交流最新研究动态，挖掘语言与文化多元化特征，力求结合地方文化，聚焦社会热点，凸显栏目特色，塑造属于学报自身独特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论坛特稿栏目收录的《跨文化研究的三个概念综述》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把我们日常最常说的文化进行细致解读，帮助读者了解跨文化现象，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项目动态追踪栏目收录的《影响留守幼儿认知发展的家庭语言环境因素研究综述》，揭示了留守幼儿发展与家庭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栏目收录了《法国作家帕斯卡·基内亚尔与道家思想研究》《空间批评视域下莫迪亚诺记忆书写中人物的居所》《论女性意识的缺失与觉醒——以〈祝福〉和〈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主人公命运为例》等三篇论文，通过异质文化间的对话、哲学思考来探讨人类存在之谜，进一步阐释语言与文化，通过对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展现各个国家的文化魅力。

外语教育教学研究栏目收录的《从“学科德育”到“课程思政”——高校〈经贸西班牙语〉课程中的德育创新与路径研究》提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精神，促进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育人，通过对思政与高校教育的融合，展现西班牙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风采，积极引导高校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帮助其塑造较高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质。《基于 SPOC 的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混合式教学实证研究》在充分调研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利用优慕课平台，开展教学改革实践，有效解决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教学短板。《自动作文评阅系统评分效度验证及教学启示》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自动作文评阅系统的评分有效性进行验证，指出一线教师不应完全依赖系统进行写作评估，需谨慎将机器分数用于终结性评价中。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栏目收录了两篇深度分析二语习得和修辞格的论文。例

如,《基于句法—形态接口的英语功能语类 T 习得研究》在特征理论框架下,基于特征重组假说,从句法—形态映射角度考察英语学习者习得功能语类 T 的情况,探讨影响因素。《英语修辞格 Metonymy 和 Synecdoche 的对比分析》从定义、特点、理论基础等角度出发,对这两个修辞格做了全面的对比和分析,对修辞格是否需要区分、如何区分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青年学者园地栏目更是呈现出多元化的学术成果。《高校外籍教师招聘管理对策研究——以越秀国际社区管理模式为例》以越秀国际社区管理模式为契机,研究高校外籍教师招聘管理,提出增加多元文化内涵,通过搭建教学交流研究基地、创造组织关怀的平台、营造浓郁的国际化氛围,促进越秀外籍教师队伍的品牌建设。《社会历史视域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通过对列宁新闻观的研究,探析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与发展。《地方院校国别区域研究困境及解决路径研究——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为例》对其在发展国别区域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解决路径。

《语言与文化论坛》收录的论文理论多元,视角多样,既反映了当代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又符合《语言与文化论坛》多元化的宗旨。希望本论丛能够一如既往地得到海内外从事中外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校内外同仁的支持和热爱。

目 录

论坛特稿

跨文化研究的三个概念综述 ◎余卫华 / 3

项目动态追踪

影响留守幼儿认知发展的家庭语言环境因素研究综述 ◎肖 文 / 15

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法国作家帕斯卡·基内亚尔与道家思想研究 ◎葛金玲 / 25

空间批评视域下莫迪亚诺记忆书写中人物的居所 ◎史烨婷 / 33

论女性意识的缺失与觉醒
——以《祝福》和《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主人公命运为例 ◎魏 蔚 / 40

外语教育教学研究

从“学科德育”到“课程思政”
——高校《经贸西班牙语》课程中的德育创新与路径研究 ◎耿 璐 / 51

基于 SPOC 的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混合式教学实证研究 ◎楼玲玲 / 59

自动作文评阅系统评分效度验证及教学启示 ◎王 建 张藤耀 / 67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基于句法—形态接口的英语功能语类 T 习得研究 ◎傅燎雁 / 79

英语修辞格 Metonymy 和 Synecdoche 的对比分析 ◎钱建萍 / 88

青年学者园地

高校外籍教师招聘管理对策研究

——以越秀国际社区管理模式为例

◎陆海萍 张露露 祝世佳 / 101

地方院校国别区域研究困境及解决路径研究

——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为例

◎徐 晨 魏潘潘 / 110

社会历史视域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

◎吴文艳 杨 晶 / 118

论坛特稿

跨文化研究的三个概念综述

◎余卫华

在国际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热门学科。在修订出台的《外国语言文学类国家课程标准》（简称国标）和各种外语类教学大纲中，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俨然已经成为外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其实，跨文化研究属于典型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在外语教学中需要了解跨文化现象，而且在人类学、历史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和外交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也要开展跨文化研究，譬如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以及国际公民意识的研究等。本篇文章主要介绍跨文化研究的三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综述，不涉及具体的跨文化交际过程和案例分析。

1 文化的界定

跨文化研究必须熟悉目的语文化，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了解目的语文化必须首先清楚文化的界定和内涵。尽管文化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学者们对于文化的定义已有不下数千种，因此要正确界定外语教学环境下的文化内涵是不容易的，其中英国著名文化化学研究的学者 Goodenough（1964:36）对于文化的界定是引用得最为广泛的定义之一：“特定社会的文化由该社会所必须了解或信仰的东西构成，目的是能够以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方式实施。文化并非自然现象。它并非仅仅包含事物、行为和情感，而是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譬如，风俗习惯、行为举止和思维模式等）。文化是社会成员头脑里固有的东西的成形，是他们观察和联想的模式以及不同的阐释方式。”

根据 Goodenough 的界定，文化是特定群体共享、共同商定的特定知识，属于特定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并不因个人或个体而特有。文化人类学的学者 Hofstede 具有影响力的经典论断强调了文化知识的系统性和传承性的本质。“文化是具有历史传承性质、以符号为象征的意义模式，是以象征形式表述的概念传承系统。特定群体以这种模式和系统为媒介进行交流，传承并发展他们对于人生态度的认识”。（Hofstede, 2010 : 89）文化中的大部分知识以人类物质遗产和行为方式等通过象征意义表述出来，并以规则、典范、期望传承遗产、道德和法律准则、谚语、父母对后代的指示等方式系统地确定下来。大部分文化知识都是心照不宣的，很少人会主动意识到它的存在，除非有人做出了难以意料或出格的事情。

Taylor 认为文化含义中的很多范围有些是确定的，有些是没有确定的。这些范围远

远超出个体之间的共有和分享。文化的含义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含在社会现实的常规和惯例中。隐含在这些常规惯例中的文化含义和规范并非存在于行动者的意识中, 而是长期存在于这些常规惯例本身之中。这些常规惯例不可能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来自行动者的系列个体行为。它们主要是社会关系和相互交流的不同模式。(Taylor, 1971 : 27)

从上面 Hofstede 和 Taylor 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人类个体赖以生存的文化含义的模式或者说是关系网。Taylor 以文化交往中的“协商”(negotiations)为例, 指出个体行为被看作“协商”“终止协商”“提议”等。这些协商被看作对于构成整体活动规范的遵从。这些规范并非仅仅存在于个人的头脑里, 而是都具有相互理解的含义。继 Taylor 之后, Hofstede 还提出了文化中更多的属于社会现实的一部分的意义范围, 譬如: “共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体现文化的物质遗产 (artefacts)。他说: “我所指的共有意义其概念的重要性, 首先是其共有性不仅在于人人拥有这些含义。共有性的含义更应该体现在身处在一个共有的参照世界里。”(Hofstede, 1973 : 30)

Hofstede 所提出的例子的含义是说: 讲法语的群体人士所具有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生存概念同样也是加拿大魁北克人所能理解和共享的共有意义。Taylor 接着将这种共有意义与社区群体概念联系起来: “共有意义是社区群体的基础。跨主观的含义使人们有一门共同的语言来讨论社会现实。”(Taylor, 1971 : 30)

上述观点其实提出了民族身份、民族认同和民族统一性的存在和生存问题, 譬如法语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就是“共有意义”。百合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共有意义是“百年好合”, 而在西方文化中它的共有意义则是“纪念逝去的亲人和友人”。

虽然文化是特定社会的共有意义, 而且不仅仅是群体所通用共享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文化绝非是静态和同源的, 而是永远动态、发展的。文化的特征和变化必须适应新的不同的社会和环境的需求。因此, 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是一个持续不断、永远向前的过程。(DeCapua and Wintergerst, 2004) 本族语与目的语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是促使文化发展的因素之一。

美国的一些跨文化研究的学者 (譬如 Chastian, 1976 ; Seelye, 1994) 将文化界定为大文化 (Big Culture) 和小文化 (Small Culture), 有点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大文化是指整个社会的主要产品和贡献或者是特定社会里杰出个人的主要产品和贡献。在学习大文化时, 语言与文化的专业学生主要研究特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以及该国的伟大政治家、杰出英雄、作家和艺术家等。小文化主要是对特定群体开展人类学研究、及研究特定群体的特定生活方式。通常语言与文化专业的学生与不同文化开展跨文化交际时主要产生直接关系的大多数便是小文化。小文化通常也是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核心内容, 通常包含三个方面: 特定文化群体的思维模式、群体成员之间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Seelye, 1994)

对于语言与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 了解一点美国人 Sapir 和他的学生 Whorf 在 20 世纪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The Sapir-Whorfian hypothesis) 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这个假说谈到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语言的学习是不能与文化的学习割

裂开来的；如果不了解使用这门语言的特定人群的文化，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学会使用该门语言的。（Kramersch, 1988 : 63）他们的这种假设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学习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譬如，在如今的全球化和国际化时代，英语已经成为一门国际通用语（ELF :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现代英语已经有了各种变体（World Englishes）（Graddol, 2010），那么仅仅学习英美国家的社会与文化就远远不够了。

“文化”一词在中文里也是一个自古就有的词汇。“文”指各色交错的纹理，隐身为语言文字的各种象征符号，伦理修养以及德善美的品德。“化”的本义为改和易、生成造化等。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为一个词。（张岱年、方克立, 2004 : 3）其实，中文里的文化一词主要专注精神领域，强调遵从礼仪、伦理与道德，有学识，有修养，“以文教化”，而英语中的“culture”则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

2 文化研究及其综述

文化研究是对文化现象（产物、过程、问题）开展多学科或跨学科分析。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起源并发展于英国，在过去几十年内传播至世界各地及其他各门学科。

Richard Hoggart 和 Raymond Williams 最先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了文化研究这个术语。他们沿承了英国文化批评的传统（如 Matthew Arnold, T.S. Eliot, I.A. Richards, E.R. Leavis 等），并加以扩展、改变，使文化概念民主化和平民化。研究重点不再是上层或精英文化，而是注重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这一视角的改变归因于 20 世纪二战后全球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诸多转变。这些转变包括英国社会福利状况的扩展（譬如福利国的出现）、劳工阶层的中产阶级化、劳工党当权、大英帝国的衰败、越来越多接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权利，以及多元文化的英国社会的形成。

英国的文化研究的开始、发展和制度化源于一些基础性文章。（如 Hoggart, 1957 ; Williams, 1977 ; Thompson 1963, 引自 Kramer, 1997）这些文本试图阐述和解释上述诸多转变。Richard Hoggart 于 1964 年建立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从事文化研究并对相关问题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在 Hoggart 的管理下（1964—1968），该中心致力于文学和文化社会学问题的研究。在 Stuart Hall 的管理下（1968—1979），该中心则集中于有关媒体文化、流行文化、青年和工薪阶层文化、女权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的研究，同时，理论和意识形态也被加入研究议程中。这些研究采用不止一种特定理论研究模式：法国结构主义（Saussure, Levi-Strauss, Barthes）、新马克思主义（Lukies, Althusser, Gramsci），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学派等（Williams, 1977, 引自 Kramer, 1997）。这些模式当时都具有相当影响力。直至 1979 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才跟大学的英语系联合起来。当 Hall 离开该中心加入英国开放大学时，该中心在 Richard Johnson 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人文社科学院下面的独立的研究单位。1988 年，该中心和社会学系合并成为商业和社会科学学院下的文化研究系。

尽管有着类似兴趣的其他组织和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也开始存在,并且它们也对文化研究做出了很大的学术贡献(例如利兹大学的电视研究中心,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格拉斯哥媒体学会),但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通常都是把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相提并论。大约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自主招生和自主学习机会的来临,国际学生的需求还是催生了各种文化研究和课程的建立和开设,首先在一些理工类大学,其次是其他大学。从1982年到1987年,开放大学开办了一些流行文化的课程,由一些学者和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开设,最终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和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Bassnett, 1997)

至此,英国的文化研究受到世界各地的欢迎。(Kramer, 1997)与此同时,根据美国(Nelson and Grossberg, 1988; Grossberg, Nelson and Treichler, 1992),澳大利亚(Turner, 1992),中国台湾(Chen, 1992),意大利(Baransky and Lumley, 1990),德国(Kramer, 1997),欧洲的其他国家(Journal of the Study of British Cultures, 1999)以及世界各地(British Studies, 199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98年起至今)的具体需求,文化研究与各地不同的特定环境下的本土传统和文化相融合,对各国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作用。差不多也在这个时段,文化研究被引入(或被再次引入)外语教学(Buttjes, 1981; Byram, 1989; 引自Kramer, 1997)和其他国际科目的教学中(Aronowitz and Giroux, 1991)。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研究呢?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即特定群体共享意义的输出、传播和吸收的方式、地点、时间和效果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文化圆圈来表示,圈中的五个方面是:表征、产生、吸收、认同、规范。

(1)表征:含义只能因为人类拥有两个互相依存的表意系统而产生。第一个系统使我们把世界的事物和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联系起来;另一个系统使我们把头脑中的概念与特殊的符号或符号系列联系起来。事物、概念和符号的关系是语言意义产生的核心。我们把这三个因素联系起来的过程叫作“表意”(Hall, 1976: 19)。

(2)产生—吸收:个人、集体和社会机构输出并传播意义;但在吸收的过程里也会产生意义:人们听音乐,读文章,看电影,穿衣服,参加聚会等。通过这些事情,人们赋予代表他们身份的这些文化产品特定的意义。

(3)认同—规范:通过输出共享意义,群体成员产生身份认同感。这些意义可以作为一种规范手段:当这些意义通过包含或排除其他意义而起作用时,它们赋予群体身份和认同特定的规范。

在文化研究中具体运用何种理论和方法具体分析以上问题并未达成共识。在最好的文化研究中,创造性的折中主义最为流行,它集合了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性别研究、女性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相对论、文化唯物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等。因此文化研究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

尽管人们对于文化研究在多样化和多学科方面为什么经历了如此的流行度和发展趋势这一点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当那些所谓的自明之理的意义不

再是不言而喻时，对文化的讨论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下所提出的文化研究流行的原因可以窥见一斑：（1）当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逐渐消失，社会和心理资源再一次得以充实时，人们越来越对人性化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感兴趣。这就促使人们可能再一次去反思、探讨和彻底改变那些曾经无法与法西斯和战争抗衡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在欧洲，这些过程逐渐从“人性的危机”中显现出来，也再一次表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学生动乱及相关的政治、文化转型之中。文化研究分别对学术观点以及整个一代人的政治和文化观念产生了影响。（2）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移民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数逐渐增加。在当时的社会，这些移民并未被认为是影响政治文化的因素，但是他们至少微妙地影响了关于文化和政治的讨论。当这些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进入学校时，他们对欧洲政治文化的统一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3）很巧合的是，美国在文化研究成功发展的同时，丧失了控制全球经济的能力。人们也意识到美国再也不可能为了确立自己的大国地位而建立“世界新秩序”了。（4）从全球视角来看，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过程给文化研究带来了一场必然的持久的探讨与思考。

3 文化差异与文化模式的综述

一些跨文化研究的学者 [譬如美国学者 Hall (1976) 和荷兰学者 Hofstede (2010)] 认为，文化是一个特定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他们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文化差异基本可分为六个维度：高低语境文化 (low versus high context cultures) ，高低或大小权力距离 (high versus low power distance)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男性度与女性度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 (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避免 (certainty versus uncertainty avoidance) 以及短期与长期价值观念取向 (short term versus long term value orientations) 等。

3.1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 (high context culture versus low context culture)

你可能会发现不同地方的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有不同的表露程度。在低语境文化 (low context culture) 中，人们常常被要求直白地表露自己的意思，不要拐弯抹角、婉转其辞。低语境文化下的人们更看重人的自我表达、个人观点的陈述还有说服他人的能力。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低语境文化国家。而加拿大、以色列还有大多数的现代欧洲国家，都属于这样的文化国家。

而在高语境文化 (high context culture) 的国家中，人们从小被教育说话要婉转，不能太过直接。除了中国人外，这样的人群包括了韩国人、新西兰的毛利人以及美国的土著人。在这些社会当中，保持社会的和谐、防止与他人发生冲突等显得更为重要一些。

因此,人们讲话会更加婉转,行为也会更加谨慎,他们往往通过脸部表情以及声调等更加微妙的行为信息或语境线索来表达自身的意思。

从人们处理批评和反对意见的方式中,我们可以一窥这种文化差异对沟通行为的影响。在低语境文化中,上司可能会公开严厉地训斥一个不负责任的下属,拿他来做例子,以儆效尤。这个上司可能会毫不顾情面地揭露下属的错误,同时也会直截了当地说出希望对方改正的地方,以及如果再达不到期望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等。

然而,在高语境文化中,这个上司可能会顾着下属的“面子”而不当众训斥他,相反,上司更多地会在私底下向下属提出批评,同时会选择一些婉转的语言来表达批评的意思。他不会直接说出下属哪里做错了,但是他会通过“绕圈子”的方法引导下属自己发现错误。例如,一个员工经常迟到。在高语境文化中,上司不会直接针对迟到这件事情来批评他,相反,这个上司可能会不断强调同事之间的责任感,成为团队里面“拖后腿”的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等。在这个时候,这个员工通过上司的语气声调、肢体动作以及脸部表情,应该能够明白其所想表达的意思。

你可能也会想到,当低语境文化背景的人到了高语境文化中,他受到误解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假设这样的一个情境。

你想邀请两位朋友明天晚上一同去一家十分受欢迎的书店咖啡厅喝咖啡。来自低语境文化背景的朋友蒂娜对你说:“不了,我明天晚上要学习呢,但还是谢谢你的邀请。”而另一个来自高语境文化背景的朋友小李对你说:“那很不错啊。”但是,之后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并没有如约去喝咖啡。

你是怎样解释这种行为上的差异的呢?在高语境文化中成长的人,他们很难对别人说不。即便是他们真的拒绝某事,他们也会因为害怕得罪别人而婉转其辞。与他来自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人通过他的语音语调以及脸部表情就可能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他实际上并不太想去喝咖啡。但可能因为你生活在一个低语境文化中,你认为他没有直接拒绝即表示赞同,因而你会误认为他愿意与你一起去喝咖啡。

3.2 高低或大小权力距离 (high power distance versus low power distance)

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企业当中可以理解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必然会从该社会内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例如,美国是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美国员工倾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所以在美国,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更平等,关系更融洽,员工也更善于学习、进步和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相对而言中国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在这里地位象征非常重要,上级所拥有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特权有助于上级对下属权力的实施。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关系

的创造和员工在企业中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因而要在中国的企业当中采纳“构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以及“为员工在工作中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不断进步”这两项人本主义政策，管理者有必要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减小企业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这样才会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

3.3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个人主义”是指一种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

美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个性自由及个人的成就，因而开展员工之间个人竞争，并对个人表现进行奖励，是有效的人本主义激励政策。中国和日本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更加容易构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

3.4 男性度与女性度 (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

男性度与女性度又通常翻译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的差异也就越大。美国是男性度较强的国家，企业当中的重大决策通常由高层做出。员工由于频繁地变换工作，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因而员工通常不会积极地参与管理。中国是一个女性度较强的国家，注重和谐和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做事融入社会的精神。根据对 IBM 员工价值观的调查分析显示，女性价值观的差异性小于男性价值观；而且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视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3.5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避免 (certainty versus uncertainty avoidance)

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不确定性文化的人们试图用科技来抵抗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用法律（成文和不成文）来抵抗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不确定性，而宗教则被人们用来化解不可抵抗的死亡和来世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中，人们更注重情感，有一种高度的紧迫

感和进取心；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

在任何社会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会感到面对的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防止的方法很多，例如提供更大的职业稳定性，订立更多的正规条令，不允许出现越轨的思想和行为，追求绝对真实的东西，努力获得专门的知识等。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防止不确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则普遍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

例如，日本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在日本，“全面质量管理”这种员工广泛参与的管理形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终身雇佣制”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与此相反，美国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国家，同样的人本主义政策在美国企业中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日本推行良好的“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却几乎没有成效。中国与日本相似，也属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在中国推行员工参与管理并增加职业稳定性的人本主义政策，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有效的。此外，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见，上级对下属的授权被执行得更为彻底，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和独立地工作。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里，上级倾向于对下属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

3.6 长期价值观念取向与短期价值观念取向 (long versus short term value orientations)

第六个维度的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且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儒家的教义中找到。孔子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儒家哲学思想家，生活于公元前500年前后。不过长期价值观念取向与短期价值观念取向这个维度也适用于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

在一些西方跨文化交际领域的学者看来，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偏向于高语境、高权利距离、集体主义、男性强势文化、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和短期价值观念取向，而西方文化则多多少少是相对应或相反的。

上面我们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三个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和综述。这三个概念都是开展跨文化教学和研究所必不可少的。首先，作为外语教学的跨文化研究离不开了解特定的目的语文化。我们所研究的文化既不是单独的个体也不是脱离人类而单独存在的自然界，而是特定的人、社会与自然界的天地人的融合。所以目的语的学习必须融入特定的目的语文化，才能够做到“入乡随俗”。其次，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表征、产生、吸收、认同、规范”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相互依存而又不可分割的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跨文化交际过程也应该遵循这五个方面。最后，跨文化研究必须开展文化比较，而开展文化比较又必须了解文化差异和主要的文化模式。西方跨文化研究的学者

们在比较不同文化差异时提到了六大主要模式：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高低权力距离或大小权力距离，确定性避免与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文化与女性度文化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以及短期与长期价值观取向等。尽管我们应该以谨慎评判的视角审视这六大文化模式，但是这些模式确实对于我们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过程是有一定帮助的。

参考文献：

- [1] Aronowitz S, Giroux H A. *Postmodern education: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al criticism*[M]. Minneapoli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2] Baransky Z, Lumley B.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post-war Italy: essays in popular and mass culture*[M]. London: Macmillan, 1990.
- [3] Bassnett S. *Studying British cultur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4] Buttjes D. Culture in Germa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king use of an ambiguous past[C]//Byram M, Buttjes D. *Mediating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1.
- [5] Byram M. *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M].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8.
- [6] Chastain K. *Developing second-language skills: Theory to practice*[M]. Rand McNally College, 1976.
- [7] Chen K H. *Media/cultural criticism: a popular-democratic line of flight*[M]. Taipei : 1992.
- [8] Crystal 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M].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9] DeCapua A, Wintergerst A C. *Crossing cultures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M]. 2nd e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6.
- [10] Goodenough W H.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linguistics*[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1] Graddol David . *English next*[M]. British Council, 2010.
- [12] Hall E T. *Beyond culture*[M]. New York: Anchor, 1976.
- [13] Hall E T. *Silent language*[M]. New York: Anchor, 1988.
- [14] Hofstede G, Hofstede G J.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M]. 3rd ed. Boston: McGraw Hill, 2010.
- [15] Hofstede C.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C]// Hofstede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by Clifford Geertz*.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16] Hoggart R. *The uses of literacy*[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7.
- [17] Kramsch C. *Language and cultur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8] Kramer J. *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M]. Frankfurt: Peter Lang, 1990.
- [19] Kramer J.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M]. Munich: W. Fink, 1997.
- [20] Nelson C, Grossberg L.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M].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1988.

- [21] Seelye H, Seelye N, Alan J. *Culture clash: Managing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M]. Chicago: NTC Pub. Group, 1994.
- [22] Taylor C.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s of man[J].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71, 25(1): 351.
- [23] 张岱年, 方克力. 中国文化概论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作者简介:

余卫华, 英国杜伦大学博士,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稽山杰出学者(A2), 首届校级教学名师, 英语学院院长, 浙江省翻译协会副会长, 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浙江省省级特色专业(翻译)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 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评审专家,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十三五学科组专家, 浙江省社科联专家库专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一项、教育部重点课题一项、省级精品资源课程一项及省市厅级课题多项, 在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光明日报》《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电化教学》等权威核心学术期刊和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 30 多部。获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浙江省高校首批“互联网+教学优秀案例”特等奖。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育。

项目动态追踪

影响留守幼儿认知发展的家庭语言环境因素研究综述^①

◎肖文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重组,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输出。由于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因素,他们不得已把年幼子女留在了家乡交给祖辈或亲友照顾,使得我国留守儿童逐年增加。而且0~6岁的学龄前留守儿童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的原因与落后的家庭教育观念有关。普遍的农村家庭认为这一年龄段的幼儿只要照顾他们吃饱穿暖就够了,不需要特别的教育和引导。与此相反,国外大量研究指出,早期的语言输入有助于促进儿童健康的大脑发育以及为日后的人生成就和幸福奠定基础。由于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父母提供家庭语言环境的能力不同。尤其在留守家庭当中,幼儿无法得到父母双亲的共同养育与教导,因此所导致的发展教育问题尤其突出。特殊的成长环境可能会使农村留守幼儿产生与非留守儿童在某些发育方面的差异,农村留守幼儿如何克服不利条件达到最优发展,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未来。

先前的研究数据表明,幼儿的成长受到各种社会和生态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收入水平、生长地域环境、语言状态以及获取教育、医疗、保健等资源的程度。(Hoff, 2006; Pruden et al., 2017)而且幼儿阶段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敏感期,这些因素对幼儿发展产生的影响并不会随孩子年龄增长而消失。其中认知发展是儿童整体发展的重要方面。一般而言,认知是指我们如何思考、注意、记忆和学习。认知发展着眼于儿童如何感知、思考和理解周围的世界,是关于知识、技能、问题解决的发展,涵盖了信息加工、智力、推理能力、语言能力、记忆能力以及大脑发育这些细分的领域。每个孩子在发展认知能力的阶段,就好比是小小科学家,他们不断地学习新思想,掌握事物运作的规律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简而言之,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试图弄清楚世界如何运转。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孩子不是被动的学习者,而是主动地去寻找信息。因此,语言是儿童认识世界的必要工具。因为人类使用语言来思考和交流,在与他人和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学习到新的知识,并且谈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达到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从而促进自身的认知发展。因此,语言技能和认知技能是儿童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即较强的语言能力意味着较强的认知能力。而家庭语言环境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至关重要。家庭语言环境包括儿童听到的语音以及他们自己的语言发声。语言发展需要来自父母和其他看护人的言语

① 20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 19CYY001。

输入和沟通交流。过往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语言发展与家庭语言环境的多种因素相关,例如语言互动的数量和质量,家长对儿童发育知识的了解程度和是否给予及时反馈的照料方式。(Rowe, 2012, Tamis-LeMonda et al., 2014) 家庭语言环境具有相当的可塑性,与先天的遗传基因决定因素相比,是更加有效地改善每个孩子发展结果的必需条件。

1 家庭语言环境对幼儿的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Hart and Risley (1995) 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表明,贫困儿童在出生后的头四年当中所听到的词汇数量比富裕家庭的同龄人少了 3000 万个单词。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家庭当中以儿童为导向的话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负面的。这 3000 万单词的差距代表着早期语言环境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社会经济差异,由此引发不同经济地位家庭的幼儿在语言能力上的差距。例如,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越好的幼儿所掌握的表达性词汇量越大。语言能力是日后识字和阅读发展的基础,也是决定学业成败的关键。随着年龄增长和时间流逝,早期语言输入的差距会对低收入家庭背景的儿童持续地造成不利影响。负面累积放大效应可能会使他们面临更大的学习困难和人生失败的风险。(Tamis-LeMonda et al., 2019) 例如,一项追踪研究证明了儿童早期语言能力与幼儿园入学时的学业和行为准备水平成正相关。儿童在 3 岁时的接受性词汇量能够预测其在 5 岁时的入学准备水平。(Cristofaro and Tamis-LeMonda, 2012) 研究数据显示早在 18 个月大时,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造成的儿童语言技能上的差异就已经显现出来了。(Fernald et al., 2013)

幼儿期是儿童认知和语言发展的关键阶段。幼儿和成年人的社会交往经验对于儿童的大脑发育、认知功能、语言习得和后期的学习技能获得至关重要。来自看护人的语言输入以及与看护人的社交互动使儿童能够练习他们新获得的语言技能,从而极大地促进他们的语言发展。家庭环境因素涉及多个方面,有学者将家庭环境因素分为过程性变量和非过程性变量。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年收入、家庭结构、父母文化程度等属于非过程性变量。而过程性变量包括亲子互动、分享阅读活动、教育方式、学习资源及看电视情况等。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从而构成对儿童认知发展至关重要的家庭语言环境。

1.1 看护人对幼儿语言认知发展的知识了解程度

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经济优势的父母往往对孩子的发展有更多的了解,并且掌握更多的育儿知识,因此能够致力于通过给孩子提供认知刺激和语言投入为他们营造有利的家庭环境。社会经济处于不利地位的家庭,看护者通常缺乏正确的育儿知识,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导致不能从家庭环境当中为孩子的发展提供支持。研究数据证明,与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同龄儿童相比,富裕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对孩子的发展了解更多,例如他们会认识到跟尚未掌握语言的婴儿说话的重要性。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意识地更多使用儿童指向的言语,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当的语言刺激。因

此，父母对类似的幼儿发展知识的了解程度能够预测孩子一年后词汇能力的增长程度。(Wacharasin et al., 2003)

以往对资源贫乏的家庭进行的研究发现，母亲积极响应的照料方式以及与孩子的互动质量是和母亲对儿童发展的知识水平相关的。有学者认为不同父母对儿童发育知识了解程度的差异是生活中观察到的父母为孩子提供充实活动和互动的差异的来源。例如，低收入家庭的母亲面对孩子会更多地使用命令式对话，和孩子的活动主要围绕照顾或给予命令（把鞋子穿上）。与此对应的高收入家庭的母亲会更多地引导和保持与孩子互动的对话（我们要去奶奶家了，所以要把鞋子穿上）。不同家庭的父母之间的表达能力、文化规范、语言风格也会有差异。例如某些文化就不会强调对婴儿说话的重要性。这些都是跟父母的育儿知识相联系的。

1.2 语言输入的数量

已有的研究一致认为，在幼儿期接受语言输入数量越多的儿童会掌握更多的词汇和更高的读写能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幼儿早期词汇技能的影响跟日常生活中看护人说话的语音数量直接相关。然而，仅仅听到家中成年人和他人说话并不一定能促进幼儿的语言学习，其中对学习语言真正有效的是指向幼儿的语音。实证研究表明，儿童所接触的来自成人的以儿童为指向的语音数量才是预测儿童日后词汇量和健康语言发展的决定因素。

轮流对话指的是持续且非同时进行的口头交流。在这种交流中，看护人和孩子对彼此先前的言语提供了及时的语言回应和反馈。轮流进行对话让幼儿有机会练习和巩固他们新获得的语言技能，促进他们的语言发展。尤其是在很小的时候，与成人进行轮流对话互动比单向的观看视频更容易成功地学习到新的词汇。看护人如果能够使用多样化的语言，与孩子进行丰富的一来一回的互动对话，这样的早期经验能够高度预测孩子日后的语言能力，并且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语言能力和学业成就成正比。因此，对话的相互性是幼儿认知发展和语言学习的关键之一。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会花更多的时间陪幼儿沟通交流，会通过正在活动的幼儿给予关注来增加互动次数。

总的来说，早期儿童所接受的语言输入数量是由两个方面来衡量，即看护人的话语词汇量（包括指向儿童的和非指向儿童的语音）和轮流对话次数。作为干预手段，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为孩子增加语言输入，缩小早期语言发展的差异。

1.3 语言输入的质量

单纯地通过言语数量来评估家庭语言环境的方法忽略了语言学习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看护人的语言输入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融入日常生活和游戏活动等社交互动中的。通过看护人的言传身教，幼儿可以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学习新词的含义。因此，照顾者与儿童互动的质量也是家庭学习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同样决定着幼儿认知和语言发展。

在家庭环境中，认知刺激是指父母尽力使孩子参与互动学习活动当中所做出的尝试

和努力。例如,父母应针对幼儿发展水平采用描述性或者解释性语句,来激发幼儿学习新词的兴趣和提供必要的学习支持,以促进他们的认知成长和语言学习。家庭学习环境的认知刺激包括儿童绘本、学习活动以及父母为幼儿阅读的时间,它们都与幼儿的语言能力发展之间存在相关性。

国内外研究一再证明亲子语言互动对幼儿语言发展有着积极影响。亲子语言互动包括亲子图书分享阅读、亲子叙事、亲子书写互动。亲子分享阅读指的是父母给孩子朗诵书本以及围绕图画绘本展开讨论和交流的一种分享性的阅读活动。父母的阅读习惯会影响幼儿阅读的形式及内容。有鉴于阅读能力对学业、工作和生活中的成功至关重要,孩子如果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阅读,就极有可能提高日后成功的概率。因此,越来越多的家长为他们的幼儿大声朗读书本,使得孩子的词汇量增长,他们对世界也将了解得更多,从而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和感知能力。幼儿早期阶段家庭在亲子阅读中所使用的语言量、读本数目、阅读频率和阅读时长与3~4岁幼儿言语能力呈显著正相关。亲子叙事以父母采用话题拓展的方式和孩子谈论其亲身经历和体验的事件,促进儿童词汇发展和叙事技能的提升。Rowe(2012)发现当母亲更多地使用去语境化语言,即讨论不在眼下的事件或物品,学前儿童的词汇技巧更高。父亲也在儿童语言发展道路上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研究发现当父亲使用更丰富的词汇与孩子交流时,孩子的表达能力更高,当父亲更多地使用“什么”提问时,孩子的言语推理能力更好。在排除家庭语音数量对孩子词汇发展的贡献之后,看护人和孩子的互动质量仍有效地预测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因此,高质量的亲子互动是家庭语言环境中为儿童认知与语言发展提供促进作用的过程性因素之一。

父母文化水平的差异,会导致教养方式的差异,以及对幼儿进行教育时采用不同的语言风格。看护人的积极情绪、爱意表达、情感鼓励和接纳,会让幼儿感觉周围环境是安全的,因而促使幼儿积极探索外部的世界和参与学习活动当中。看护人在互动中展现出的积极行为和情感已被证明可以促进幼儿早期认知能力、沟通能力和词汇的发展。相比之下,看护人的批评、人身限制和惩罚、负面情绪的表达以及尖酸刻薄的语气则对儿童的认知和语言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

几乎所有儿童的父母和照顾者都希望能够提供有助于儿童积极发展的经历,但是有些家庭确实缺少实现它的资源和知识条件。从以上论述表明,看护人的育儿知识水平、语言输入的数量和质量对幼儿语言词汇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面向儿童的语音越多,实施亲子互动的质量越高,不仅为学习单词提供了更多的情境例子,而且还提高了幼儿的新词汇处理能力,为词汇学习带来一系列好处,从而增强幼儿关键的认知技能,提高学习效率。因此,理论上来说提高父母与幼儿言语互动的干预水平有可能改变词汇量累积的过程,进而改善弱势群体的未来结局。

2 留守幼儿的认知能力和家庭环境因素分析

关于留守幼儿的概念界定,不同的研究关注的样本存在分歧。本文综合大多数学者

的观点，把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时间为半年以上，由父母一方、祖辈或其他亲属照料看护的0~6岁的幼儿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他们的认知能力和家庭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国内关于留守幼儿的研究多数关注他们的精神健康和社会性发展，但是对留守幼儿早期认知能力的研究还不多见。现有的与当前议题相关的研究显示，农村留守幼儿在思维发展、空间认知、安全认知、社会认知和言语发展都落后于非留守幼儿。（吴凡、梅萍，2009；徐芳芳，2011）在入学准备水平方面，和非留守幼儿相比，留守幼儿在多个发展领域有明显的落后。例如在语言发展方面，留守幼儿倾听和表达能力不佳。在科学领域，留守幼儿探索未知和感知觉能力也比不上城市同龄幼儿。（史爱华，2012）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方式领域表现最差，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在运动技能发展领域的准备水平也有显著差异。（胥莹莹，2016）罗洁颖（2016）对农村留守幼儿语言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发现留守幼儿在倾听力和理解能力、记忆力和表达能力方面都不如非留守幼儿。张维佳（2016）对留守幼儿与非留守幼儿在感知觉能力、注意力、推理能力和记忆力各方面进行比较，调查结果显示在记忆力方面没有差异，但是注意力及认知灵活度方面有明显的差距。与史爱华（2012）的结果一致，留守幼儿与非留守幼儿相比倾听能力差，语言理解能力也较弱，语言习得起步晚，表达能力差。通过对留守幼儿和非留守幼儿在幼儿园自然情境中与同伴或老师的会话语料分析，梁金梅（2019）发现留守幼儿在会话发起、会话维持、会话修补、话轮转换方面能力滞后于同龄非留守幼儿。但是以上的研究是以个案分析和问卷调查为主，样本量太小使得数据缺乏代表性。研究方法没有深入幼儿个体家庭当中去观察，同时对幼儿的认知能力测试缺乏信效度，因而关于留守幼儿是否在认知发展上落后于普通儿童，尚未得出确切结论，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收集。

在儿童早期，父母亲的陪伴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几乎是无法替代的。留守幼儿的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缺席，产生单亲监护或祖辈监护等不同的监护类型。张娜、蔡迎旗（2009）采用问卷调查不同监护类型的留守幼儿在生活、学习及沟通方面的困难与需求，结果显示单亲监护的留守幼儿与普通幼儿不存在显著差异，隔代和亲友监护的留守幼儿则面临更大的问题、困难与需求。随着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输出至大城市，留在农村的婴幼儿看护人由于面临生活与劳动负担，对幼儿的教育往往力不从心，对生活中教育事件不敏感，因此不能有效地通过展开家庭亲子互动以促进幼儿早期认知能力的发展。杨雪萍（2015）调查了农村留守幼儿的家庭语言环境，问卷结果显示，母亲外出的占多数，监护人文化程度多为高中或中专以下，家庭经济条件均不利于幼儿的语言能力发展。张维佳（2016）也表示单亲监护家庭的留守幼儿比隔代监护的幼儿倾听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要好。一项对农村留守幼儿早期阅读的特征研究显示，农村留守幼儿早期阅读主动性较低，缺少适合的阅读内容，监护人陪同幼儿阅读的情况也明显较少。（张和新、李兴菊，2019）由此看出，造成留守幼儿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来自家庭环境，包括看护人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有效亲子互动时间的长短等因素。

不同于以往的问卷调查研究，刘诚（2015）采用一对一的游戏任务测试幼儿的数学技能，结果发现留守幼儿数学能力得分低于非留守幼儿。作者尝试从农村留守家庭嘈杂

度切入来解释该发展上的差异。家庭嘈杂度的调查结果与预期的假设一致,留守儿童整体家庭环境质量不如非留守儿童家庭环境质量,表现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嘈杂度水平高于非留守儿童家庭。家庭嘈杂度水平衡量家庭生活中的噪音,是反映紧张和无序的日常生活指标。非留守儿童的家庭生活相对规律、有序,与此相关可以观察到非留守儿童家庭亲子数学互动频率更高。而留守儿童的家庭生活多数情况下是紧张无序的,亲子数学互动较少发生。由此看到,家庭环境质量的差异致使留守儿童在早期数学能力和日后学业成绩上产生与正常成长幼儿的差距。

家庭环境质量的好坏也影响着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而导致儿童认知发展结果的差异。嘈杂无序的家庭更多地采用消极的教养行为,例如留守幼儿的看护人会让幼儿长时间观看电视来打发在家育儿时间,并没有意识到幼儿如果过度观看电视,会降低亲子交流的频率和孩子开口说话的次数,直接导致幼儿语言能力发展滞后。长期暴露在成人电视节目背景下成长的幼儿认知功能也会受到损害。积极的教养方式倾向于采用温情和理解,例如对幼儿的学习困难能够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能够促进亲子互动的有效开展,避免不良的认知发展结果。当家庭中的噪音与拥挤程度升高的时候,父母对子女的积极教养行为随之降低。

表1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认知发展对比研究

认知能力	调查方法	来源
语言发展,包括会话能力、倾听能力和表达能力	语料分析,问卷	梁金梅(2019),罗洁颖(2016)
早期家庭阅读	问卷	张和新和李兴菊(2019)
入学准备水平	个别测查,问卷	胥莹莹(2016),史爱华(2012)
社会认知、表情识别	个别测查,问卷	刘方然(2017),徐芳芳(2011)
思维能力、数的认知、形状认知、空间认知	儿童测查,问卷	吴凡和梅萍(2009),刘诚(2015)
感知觉能力、注意力、推理能力和记忆力	问卷	张维佳(2016)

3 余论:进一步理论及应用研究的迫切性

家庭环境是幼儿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交学习环境。幼儿需要不断地与自己的成人看护人进行互动来获得其语言、认知、社会交往能力的最大化发展。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缩小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早期语言输入差距是提高幼儿语言和学前技能的关键一步。通过对家长进行关于幼儿认知和语言发展的知识教育,可以有效调节导致早期家庭语言环境差异的家长行为,提高照顾者为其幼儿提供的语言输入量和社交互动的质量,为幼儿早期家庭语言环境提供坚实的基础。例如美国的亲子家庭计划项目,通过改善亲子间的言语互动质量、增进亲子依恋关系来提高儿童入学准备。可以看出通过这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就可以很容易地收获不俗的效果。

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间的日常互动难以实现，与隔代抚养人的沟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影响值得学界、国家和社会的关注。留守儿童是中国经济发展随之产生的特殊群体，缺乏可以从国外研究直接借鉴的数据和理论支撑。但是世界范围内致力于改善低收入群体儿童发展结果的各项研究和措施可作为参考依据。本研究综述进一步证实了对我国农村留守幼儿制定有效的家庭干预计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综上所述可知，第一，留守幼儿是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其发展关乎乡村振兴。消除贫富差距的目标和愿望的实现，需要结合国外关于贫困落后家庭的幼儿发展数据和理论来推进国内农村留守幼儿的积极发展。第二，现有的数量有限的研究显示留守幼儿的家庭环境和认知能力和非留守幼儿存在差距，但是缺乏进一步消灭差距的有效干预办法，多数的建议仅仅停留在想法层面，并没有实际数据和理论支撑。第三，已有的研究资料主要利用问卷调查，较少深入家庭、深入幼儿的语言环境中去观察和实验，如表一所示。

下一步的研究设想应当关注中西部留守幼儿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使用现况录音法去调查留守幼儿的家庭语言环境，并以此对留守幼儿认知发展滞后做出解释。在理论方面，通过系统调查留守幼儿的各方面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父母缺位对幼儿语言和认知发展的影响机制。从父母抚养缺失的角度探讨语言环境对幼儿认知发展的关键作用，为国外相关理论作补充验证。在应用价值方面，我们必须使用建立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亲子对话和沟通基础之上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才能够为发展落后的幼儿群体提供可靠有效的和有针对性的教育指导建议。同时，应当充分挖掘造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幼儿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深入研究家庭语言环境在此系统中对幼儿发展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幼儿各种认知发展上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干预措施，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Cristofaro T N, Tamis-LeMonda C S.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t 36 months and at pre-kindergarten: Relations to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J]. *Journal of Early Child Literacy*, 2012, 12 : 68-97.
- [2] Fernald Anne, Marchman V A, Weisleder A. SES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skill and vocabulary are evident at 18 months [J].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13, 16(2) : 234-248.
- [3] Hart Betty, Risley T. *Meaningful differences in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young American children* [M]. Baltimore : Brooks Publishing, 1995.
- [4] Hoff Erika. How social contexts support and shape language development [J]. *Developmental Review*, 2006, 26(1) : 55-88.
- [5] Pruden Shannon, Hirsh-Pasel K, Golinkoff R M. The social dimension in language development: A rich history and a new frontier[C]//*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gagement: Neurobiological Perspective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18-152.

- [6] Rowe M L.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 directed speech in vocabulary development[J]. *Child Development*, 2012(83): 1762-1774.
- [7] Tamis-LeMonda C S, Kuchirko Y, Song L. Why is infant language learning facilitated by parental responsiveness?[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3(2): 121-126.
- [8] Tamis-LeMonda C S, Luo R K, Mcfadden K E, al. Early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predicts children's 5th grade academic skills[J].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19, 23(2): 153-169.
- [9] Wacharasin Chintana, Barnard K E, Spieker S J. Factors affecting toddler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familie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J]. *Infants & Young Children*, 2003,16(2): 175-181.
- [10] 梁金梅. 农村留守幼儿会话能力研究: 与非留守幼儿的比较 [D].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2019.
- [11] 刘诚. 家庭嗜杂度对留守和非留守幼儿早期数学能力的影响 [D]. 郑州: 河南大学, 2015.
- [12] 罗洁颖. 农村留守幼儿的语言发展现状调查——以富源县富村镇中心幼儿园为例 [J]. 文教资料, 2016(6): 39-40.
- [13] 史爱华. 留守幼儿缺失了什么——对 516 名 6 岁城乡幼儿“前学习能力”的测试与反思 [J]. 学前教育研究, 2012(4): 10-15.
- [14] 吴凡, 梅萍. 农村留守幼儿认知发展问题及教育对策——以湖北省黄冈市 8 所幼儿园为例 [J]. 学前教育研究, 2009(6): 29-33.
- [15] 徐芳芳. 湖南 3~4 岁留守幼儿认知发展与社会化比较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 [16] 胥莹莹. 农村留守儿童入学准备研究 [D]. 郑州: 河南大学, 2016.
- [17] 杨雪萍.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幼儿家庭语言环境现状调查及对策 [J]. 文教资料, 2015(5):161-162.
- [18] 张维佳. 成长环境对农村留守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农村 2~7 岁留守幼儿语言发展个案分析 [D]. 郑州: 中原工学院, 2016.
- [19] 张娜, 蔡迎旗. 不同监护类型留守幼儿在生活、学习及沟通方面的困难与需求差异比较 [J]. 学前教育研究, 2009(5): 32-37.
- [20] 张和新, 李兴菊. 农村留守幼儿 (3~6 岁) 早期阅读的特征研究 [J]. 甘肃高师学报, 2019, 24(1): 93-96.

作者简介:

肖文, 女, 1985 年 4 月生, 广东韶关人, 哲学博士,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心理语言学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哲学博士,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在 *Developmental Sci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Perception,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等权威核心期刊和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4 篇。研究方向为语言习得的机制与过程。



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法国作家帕斯卡·基内亚尔与道家思想研究

◎葛金玲

20世纪,世界出现了两股逆向的潮流:一是东方文化的“西方化”,二是西方文化的“东方化”,这种文化的对逆现象是空前的。对于大多数法国作家来说,中国文化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他者,是一种“非我”的神化,一种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文化构想物”。(刘成富,2002)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与融合,而中国思想影响着现当代的法国文学。

基内亚尔从小受家庭影响,博览群书,熟知中国的古典哲学和文学,并深有研究。在创作过程中,不仅让读者重新审视西方文化,更是将希腊、印度、日本及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使作品具有显著的异域特征及神秘色彩,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亚洲文化”成为他创作思想的源泉,与东方对话,成为他巨大的创作财富,也是他写作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

1 基内亚尔对“老庄思想”的追寻

基内亚尔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源于老庄思想,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他将道家思想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

老庄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老子,姓李名耳。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博学多闻,以得道高人著称。他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宇宙的根本,也是万事万物的至理。道法自然,自然二字在老子思想中举足轻重。自然是无为的,无为而天地万物生生不已,因而自然、无为、清静是道家的基本观念。老子著作《道德经》被尊为中国的宇宙论,并且为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所敬重和研读。老子的思想在国外也广为传播,有英、法、德、日、俄等译本问世。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从《道德经》中汲取思想之素,不少文学家也从老子那里采撷智慧。老子走向世界,世界得益于老子。

庄子,姓庄名周,子为古人对名人大家之美誉敬称。著有《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等篇章。他继承了老子的法天法地法自然的精神,以道为旨归。他的文章哲理透辟,行文洒脱,其中充满了寓言故事,堪称文学典范、哲学翘楚,对后世哲学与文学影响深远。

基内亚尔将庄子尊为圣贤,并声称其为自己的老师,曾来到中国寻找庄子的遗迹,

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1995年，他不辞辛苦来到了位于河南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的庄子故里。在他眼里，那是一趟让他感到些许艰难的旅程，他不仅有病在身，而且恶劣的环境让他无法忍受。他是这样描述那段经历的：

“在此，我想总结一下闭目不看的经历。我们在森林中、夜色下寻找庄子的坟墓，到了他的墓前，我从未如此窘迫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闭目不看。我到了庄子村，才略微理解古罗马的一个奥秘。远东，中国人完全封闭的农业帝国，西伯利亚的萨满教仪式和日本的神道仪式，这一切令我能够进入夹在埃特鲁里亚帝国和布匿帝国中间的那个从狩猎走向农耕的罗马。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小村庄里，我洞察了 *desiderium* 这个单词的神秘含义。”

（帕斯卡·基尼亚尔：《秘密生活》）

但这并不能阻碍作者追寻庄子足迹的旅程。最终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他来到了庄子故居前，感叹道：

“坟头和墓碑也许已不复存在。

它们也许本来就不存在（早在公元前三世纪，这位年老的隐士就已经嘱咐，在他死后将他的身体放在树枝之间，任由鸟类啄食）。

突然这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

对我而言，只要呼吸一下他呼吸过的空气，在他遁世的尘烟里走一走就甚感欣慰了。

能够在他曾经滑倒的泥浆里滑倒就够了。

我的双手已经抓过这松软的泥土。我已经进入了这雨水的洪流。我已经触及他的灵魂。”

（同上：193）

基尼亚尔对庄子的敬重是发自内心，深藏在灵魂深处的，所以他才会透彻地理解庄子思想的内涵，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2 作品中“天人合一”价值观

基尼亚尔说：“艺术就是行为，行为的行为性，‘道’的准确性。创造不会从世界中减去任何东西，也不会减去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这就是真正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道。Intro-ire 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走进什么’。这就是走进生活之道。这就是出生。Intrusus 则是强行进入者，他并没有权利这么做，他强行进来，结果是遭到驱赶。这就是不速之客。这就是大家公认的‘闯入者’（intrusus）这个词的最美妙定义。”（帕斯卡·基

内亚尔:《游荡的影子》)

基内亚尔对中国之“道”的理解,基本符合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核心观点。他认为创造只是在遵循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一种改变,艺术作为一种行为,必须遵其道而行。真正的生活也要循其道。

在小说《游荡的影子》中,作者深切表达了自己对人类生活现状的担忧和恐慌。由于社会发展没有遵道而行,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破坏,最终遭受自然的惩罚。正如基内亚尔所言:

“地球上的自然美随着人类的意志而熄灭。色情欲望也从未经历如此突然的惩罚。死亡、焦虑、抱怨再也不是日常的脏物,而是王后,随着她们变成更加虔诚,她们也更加全能。人们用水换取钱。人们给大地一个死者以换取钱。人们用太阳换取钱。大海中充满海盗,空气接纳他们。就像第一批天上的神灵,他们变成了空中的英雄。每个民族都是圣父的选民,并像激发起自己的气息一般激发了一队逃难者。众神和伴随着他们的恐怖回来了。”

(同上:83)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符合自然规律,既要改造自然,又要顺从自然,既要不屈服于自然,又要不破坏自然。这样才能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同样,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包括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追求和无休止的欲望充斥着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开始浮躁,更加看重利益追求,离儒家倡导的“和”,离道家推崇的“善”越来越远。这也正是基内亚尔所担心的。

当今社会,各国为争夺国际经济利益、国际权力不断发生战争与冲突,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加大军事投入,研制可能对人类形成毁灭性打击的武器,威胁人类的生存。一些国家的种族战争也在继续,恐怖主义袭击不断发生,国家间的贸易战争等都威胁世界和平,使人类承受巨大的痛苦与恐慌。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战争从未消失,只是形式不同,人们从来没有消除内心的恐慌。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战争武器更加尖端,带给人类的灾难也将是空前的。

基内亚尔在作品中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对外扩张也给予了极大的批判,因为它造成了不同文化国家及民族间强烈的冲突,引发了世界战争,破坏了世界和平。他说美国从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到对非洲黑人的种族隔离和奴隶制之后,又发起了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作者详细叙述了发生在1853年美国对日本的战争。美国佩里准将带着自己的舰队驶入了日本的江户湾,历史上称为“黑船来航”。

“美国准将的周围是他的外轮驱动式战船和蒸汽机护卫航。他命令慢慢转动大炮,

命令装弹。于是，聚集在码头上，惊叹地欣赏着正威胁着他们的这四艘奇特船舰的日本水手和渔民，被当成了靶子。美国人开炮。日本人屈服。”

(同上: 85)

这是一场美国对他国的侵略战争，它使江户城一片混乱，日本在战败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神奈川条约》，从此美国打开了日本的大门。根据道家思想中的“因果轮回”，美国之后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小说第四章，作者又用短短几行字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害。“那是发生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188架轰炸机飞临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炸毁了美军357架飞机，炸沉了18艘军舰，炸死了2403人，那些惊呆了的人手不能动，脚不能移。他们说不出话来。”(同上: 12)珍珠港事件对美国是一次沉重打击，军事上的损失和人们心灵的创伤都是无法抹平的。

2001年的“911事件”也是如此。那一年，两架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了美国纽约世贸大楼，造成了2996人死亡(含19名恐怖分子)，这是发生在美国本土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是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一次冲突，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一些国家认为此次恐怖袭击与美国对于中东的政策有关，美国一直在控制中东国家，企图控制石油供应，尤其是通过控制中东而控制整个欧洲和东亚。美国的这种强权政治引起了中东国家的不满，激发了矛盾冲突。但最后造成的结局是两败俱伤。正如作者所说：“捕食者死了，猎物死了，捕食活动死了，在视觉的瞬间一切都死了。”(同上: 80)

道家思想强调人不能被物质欲望所束缚，否则会更加痛苦。应该注重精神享受。基内亚尔认为：“正是修道院拯救了西方。人类应该更多地感谢阅读，而不是武器。在印度也是这样。在日本也是这样。在冰岛也是这样。在中国，书面文字的阅读还建立了文明。倘若哪一天所有的人都停止阅读，文学就重新变成被定了价的东西了。”(同上: 139)在他看来，阅读是拯救人类的唯一方式，使人无欲无求，提升道德情操，增强文明程度，从而推动世界和平。

“越来越同质的、文明化的、集体化的家庭内部生活、语言生活：异质性不是人类的命运。文化的、历史的同质性，这就是人类的命运。”

(同上: 59)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国家间文化交流的逐步增强，全球一体化已逐步形成，各国相互依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需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从这点来说，基内亚尔是一位有政治眼光和国际视野的作家。

3 作者无为之境界

中国的玄学家也推崇“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这种人生哲学，在行为方式上更追求摒弃外在形相，忘我忘物，自然适意，返璞归真的精神境界。解读基内亚尔的文学创作，我们似乎读到了作者太多直觉式、体悟式的浮想与反思，那些储存在作家意识中的意象、情感、哲理、思辨，朦胧深刻，富有寓意，乱纷纷地向我们涌来。《易传》说，“言不尽意”，须“立象以尽意”。今天也有学者认为“象亦有限”。基内亚尔对中国的这一美学思想似有较深的理解。他的作品有象有意，但也往往曲折隐晦，有时更以静默写意，这倒应了栾栋先生的一个判断：“物语者，物话也。物语是无声之声。”（栾栋：2017）《游荡的影子》无论在其审美内涵还是审美表达上，都让人体悟到中国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某些特点。

“无为”是道家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即“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与世无争，顺其自然。老子认为：“不争而善胜。”因此，他坚持的人生观是“柔弱、守雌、虚静、无为”。（老子，2015）在老子的著作中，无为被提及二十多次。道家思想的无为并非是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而是要让人们少点欲望，多点忍耐，采取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老子的遁世思想，从超脱尘世，寓居安静到“道隐无名”，抱璞守拙，在“静好无为”的世界中顺应“自然”。

小说《游荡的影子》常常在不经意间透视着这些思想。首先小说的名字寓意深刻，作者希望自己成为影子，自由自在地在书海中游荡。他渴望恬静的田园生活，向往世外桃源。

基内亚尔所崇尚的也是一种无为之境界。他曾辞掉所有的职务，远离尘世纷扰，隐居起来。他无法理解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他是孤独的，但很享受。他说：

“我总是会蔑视这样的人，当他处于享受中时，他总是说我们享受。倘若没有孤独，没有时间的考验，没有沉默的热情，没有整个身体的兴奋和克制，没有害怕中的身体摇晃，没有在某一个昏暗和不可见的东西中的游荡，没有动物性的记忆，没有忧愁，没有在忧愁中的孤独化，就没有快乐。”（帕斯卡·基内亚尔：《游荡的影子》）

这就是作者所体会到的快乐。“孤独”“沉默”“黑暗中游荡”“保持动物的记忆”，这些是人自然性的体现。人类在出现前，地球是一片混沌和黑暗，人类保存动物的记忆也是人的一种本质特征，人出生时无法言语，是沉默的，在黑暗中游荡，是作者所向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

小说《游荡的影子》从开始的德国姑娘，到之后的历史人物，他们都远离嘈杂的社会，默默地生活在世界的一角，享受着阅读的乐趣。基内亚尔说：

“生活在世界的一角中。在死角中——通过死角，可见之物对于视觉不再是可见的。”

(同上:55)

“死角”将作者与外界隔离，远离现实的喧嚣，成为一个不可见物，这个不可见物相对于可见物而言是不发光的，不会被人们所注意，他们生活在别处。在那里他们尽情地享受“孤独”而宁静生活的快乐。

在小说《秘密生活》中作者也阐述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他说：

“我并不喜欢舒坦的生活，我喜欢过自由自在、不为人知、隐蔽秘密的生活。我总是避免引人注目，不愿被人拉去听音乐会、看戏剧、听歌剧、看电影、参加天主教仪式或参加葬礼，这不仅是种负担，而且耗费时间，更不愿意迫于社交的 *do ut des*（礼节性的有来有往）而不得不牺牲周末和晚上的时间来应酬。稍有名气就引人注目，从而使自己的言行置于公众监督下，哪怕自己非常自律。一旦成名，就等于把自己全部的生活都公之于众，令自己无处遁形。渐渐地，个人的创作必须合乎社会的规范。因此，一旦要在公众场合发言，我自然就会喉咙发干，发不出声来：所谓的公众其实并不存在，是社会虚构出来的，社会为自己设定了种种规范，把自己囚禁于固定的模式之中，最后这种模式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

(帕斯卡·基内亚尔:《秘密生活》)

这就是基内亚尔的生活态度。他不喜欢受到约束，不喜欢喧嚣的氛围，不喜欢被人关注，也不喜欢各种社交，他只愿意安静地、自由自在地、秘密地生活在一处。他认为成名会让自己所有的行为暴露在公众面前，这样会让他无处遁形，并且慢慢地自己的创作也会受到社会的约束。通过这些，基内亚尔告诉了读者一种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这正是道家思想所要表达的内容。

现实生活中，物质世界让人们的欲望不断增加，这让人类的痛苦也逐渐加深。基内亚尔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归自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此，作者就全身心地投入了阅读中去。他说：“在读书中有一种不寻求达到目的的等待。读书就是漫步。阅读就是游荡。”(帕斯卡·基内亚尔:《游荡的影子》)阅读可以让人少点欲望，多些悠闲自在，享受到人生的快乐。

作者超脱凡尘的行为并不是无所作为。他力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批判现实生活的种种弊端，让人们铭记历史的教训，为人类面对的痛苦而大声疾呼，警醒当权者应遵循自然规律，顺应民心。他批判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抨击科技进步给地球造成的毁灭性破坏，蔑视美国的霸权主义。作为一位隐居者，他不是不问政治，而是从一位思想者的角度，从一位摒弃了趋炎附势的独立思想者的角度向社会敲响了警钟。基内亚尔说：“我只追寻那些战栗的思想。有那么一点红光，它属于心灵的深处。”(同上:5)他的写

作总是在披露人们不敢提及或者已被人类所忘记的东西。语言是作家反抗社会的武器。“只有语言结构本身才是它自身的第三者。作家和思想家一样，知道他们谁是真正的叙述者：表述。我所做的就是这个：语言的工作，一件沉重的工作，思考的工作，有倾向的工作，也是伤筋劳神的工作”。（同上：15）这是基内亚尔对于作家工作的界定，作家和思想家一样应该自由地表述事实，阐释自己的想法。但面对这样物欲横流，浮躁不安的社会，作家的工作是辛苦和艰难的，而且常常不为世人所理解。

4 作品中“老子”之传奇故事

在小说《游荡的影子》的第一章讲到了老子出生的传奇故事。作者说：“中国的古人说，老子在他母亲的子宫里等待了八十年，然后才决定来到气流和光线中。”（帕斯卡·基内亚尔：《游荡的影子》）关于老子的出生，一直是扑朔迷离、惊奇的神话故事。在民间，人们把他视作太上老君，道德真君。对于他的出生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在她母亲的腹中待了八十一年，也有说待了七十二年，但据《史记正义》中所叙为前者。传说他降生的那一天，他的母亲坐在李树下，忽然天上弦乐奏鸣，四周香风阵阵，他的母亲感觉一阵腹痛，然后就生出了一个白发童颜的孩子。他一生出来，就可以走路，也会讲话。他指着李树说那就是他的姓，而且由于他生下来就白发苍苍，因此就被尊称为“老子”。

作者通过老子出生的传奇故事来阐述他的时间观。他说：

“已经有一个生命在标志它开始的出生之前。

已经有一个世界在出现它的世界之前。

在 infans（拉丁语：婴儿）之前有一个 foetus（拉丁语：胚胎）。

在 puer（拉丁语：儿童）之前有一个 infans。

总有一个没有语言的前期物先于时间存在：这就是时间。

Foetus, infans, 在形成身份之前，两者都没有语言。”

（同上：7）

作者认为，在出生之前，人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这是现实生活的先前物，是不可见的。人类在拥有自我身份前，都是没有语言，沉默的。时间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过去被建立在前进的时间的每一个浪潮中”“被留在过去的喷射、倾斜、快速、倾吐之间的那个现在境况的中心游戏”（同上：37）。这种“过去与现在一样神经紧张、并不可预见地生活着，并不时在现在中探出它的面孔”（同上：36）。

基内亚尔从哲学角度分析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认为过去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现在的发展在更新。在每一个行为之前都有一个先前物，它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是与现实生活不同的，但“所有的场景都在没有语言的不可见物中获得起源的那个场景，是一

个非常活跃的现实活动”(同上:7)。

一直以来,西方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主导着整个世界。作者生活在法国,享受着西方发达社会带给人们的优越生活条件,但同时也目睹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由此,他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通过大量阅读中国古典哲学与文学著作,对东方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发现了东方文化深邃的思想意蕴,于是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达到两种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借鉴,也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异域特色。对于东方文化的接受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本国文化的自信及对他者文化的包容,这足以让读者敬佩。

基内亚尔创作深受东方文化影响,无论他引用中国道家思想、中国文学名著《金瓶梅》、历史人物秦始皇,还是表现日本文化及介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这都构成了作家的一种独特视角,包容的胸怀,而这些也只是作者写作过程中的一个驿站,不是终点,作者的目标是要在20世纪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背景下,通过异质文化间的对话、哲学思考来探讨人类存在之谜。异质文化包容共存作为基内亚尔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也给读者提供了多元解读或研究的契机。

参考文献:

- [1] 刘成富.论中国文化对20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J].青海社会科学,2002(2):7-15.
- [2] 帕斯卡·基内亚尔.秘密生活[M].王海洲,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95-193.
- [3] 帕斯卡·基内亚尔.游荡的影子[M].张新木,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7:6-158.
- [4] 栾栋.文学通化论[M].商务印书馆,2017:129.
- [5] 老子.道德经[M].陈默,译注.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5:121.

作者简介:

葛金玲,女,1978年生,陕西西安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研究。

空间批评视域下莫迪亚诺记忆书写中人物的居所^①

◎史焯婷

20世纪后半叶，理论 research 对空间（espace）的重视，使空间批评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宽广的理论视域。空间之于文学不再是简单的故事发生的场所和背景，而是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元素：巴什拉（Bachelard）先驱性地用现象学精神来阐释诗学，探索空间的人性价值，将文学空间视作人类意识的居所。列斐伏尔（Lefebvre）、索雅（Soja）等学者普遍认为空间本身既是一种由社会进程和人类干预形成的“产物”，又是一种能反过来影响、指导、限定人类行为的“力量”。空间因此具备了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更加复杂的文化内涵。

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对记忆的书写是在时间中游走，也是在空间中推进。对他而言，促使他写作的并非记忆本身，而是“记忆留下的痕迹”^②：如幼年时父亲带他去装饰华丽的高级酒店大堂，整个空间留给他古怪、神秘之感。莫迪亚诺热爱翻阅社交名录，浏览陌生的姓名和地址。某些特定的地址与作家的个人记忆相连，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入口。他笔下人物的居所充满临时感和偶然性，空旷、神秘、来路不明，却有着清晰的位置和地址。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总是并存着确切的地址和谜一般的人物，明确的场所和模糊的进出者，以及清楚定义的空间和人物未知的命运。场所（lieu）^③，作为空间批评的关键词之一，因此也成了我们探索、解读莫迪亚诺作品的一个切入点。作家在对某一特定场所进行描述、加工和想象的过程中，赋予它特定的意义，使之抽象化、立体化，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正如列斐伏尔（1991：154）所说：“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如果我

①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莫迪亚诺小说中的记忆书写研究”（20NDJC037YB），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莫迪亚诺小说中记忆的时空维度”（Y201839107）。受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支持。

② 参见纪录片：Bernard Pivot & Antoine de Meaux：Patrick Modiano Je me souviens de tout...，équipage/France 5，该纪录片于2007年播出，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15年出版。

③ 场所（lieu）与空间（espace）在本意上有所区别，前者侧重具体的地点，后者更具三维的立体概念。“场所”一词摆脱狭义的“地点”的含义进入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诺拉（Pierre Nora）在《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中基于场所的复数形式（lieux）提出了术语“记忆之场”。场所的复数形式，有场所、位置及身份等意思，比其原始意义宽泛、丰富得多。而“空间”也几经意义上的扩展，在列斐伏尔、詹姆逊、索雅等学者的观点中，成为蕴含意义、生产社会关系的特殊“容器”。

们聚焦小说中人物的居所这一具体的日常生活空间，将发现无论酒店房间、租住屋、朋友的房子、出生的公寓……在作家笔下联通了时间和空间，融合了多种感官维度，成为承载回忆和情感的容器，直达我们的内心深处，成为描摹记忆的重要元素。

1 酒店房间

酒店房间，在莫迪亚诺笔下，具备暗示人物命运漂泊的效果。《蜜月旅行》中，主人公认识巴黎周边的多家酒店，在离开妻子期间决定定期调换：多狄斯饭店、西蒙-玻利瓦尔大街的非艾福饭店、克里希门附近的古安酒店。他甚至在小纸条上列出了更多备选酒店。类似的酒店清单在小说中还出现过一次：那是二十年前主人公与妻子初识时，他列出了十一家酒店的名字，他与妻子经常出入其间。酒店房间具有随意性，住客时常更换，是最不带个人色彩的居住空间，能够完美隐匿踪迹、磨灭个性特点。

此外，作者在小说中还赋予这一居住空间某种心理内涵：酒店房间代表某种“出走”(fugue)，使小说主人公可以远离熟悉的巴黎市中心，回到城市的边缘地区，它们是“迈向奇遇和陌生世界的跳板”(莫迪亚诺, 2016: 91)，令人感到自在，获得逃离的快感。对逃离的快感的追寻始终贯穿莫迪亚诺的小说，逃离是他得以呼吸的方式。《小首饰》(*La Petite Bijou*)的主人公在里昂站旁边的终点酒店面前畅想，觉得如果在这个街区租个房间就会改变生活。因为住在火车站边上，我们总觉得自己是旅客。临时性，反倒给人心理上的安全感。

另外，酒店房间还能与一种莫迪亚诺文学世界里的独特“寻找”产生联系：《蜜月旅行》的主人公想从多狄斯酒店的房间给妻子打电话，但觉得与她联系不上，因为“联络可能因为这些年代的层层堆积而搅乱”(莫迪亚诺, 2016: 93)。时间仿佛与空间同质，具有物质性，成了阻隔他与妻子联系的障碍。莫迪亚诺在写作中不断将时间空间化，产生不真实的混沌效果，用以表达记忆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捉摸。记忆在时间和空间的共同作用下变得不确定，这种共同作用与列斐伏尔的观点不谋而合，列斐伏尔(1991: 180)在审视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坚持时间有别于空间，但是两者不能割裂：“时间本身是荒诞的；空间本身也是这样。相对性和绝对性都是相互映射的结果，每一方都常常涉及另一方；空间和时间亦复如是。”这种时空关联性在莫迪亚诺笔下的酒店房间里得到了体现，除了凸显记忆模糊、不确定的特点外，同时也为记忆寻找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期许：“我们总是在不同时间在相同的地方闲逛，尽管时隔多年后，我们终究会相遇”(莫迪亚诺, 2016: 111)。

2 租住、借住的房间

莫迪亚诺小说中的人物经常租住在一个单间(chambre)里，小而简陋的栖身之所，

几乎“家徒四壁”。让人联想到布列松在《扒手》(*Pickpocket*, 1959)中影像化的那个小房间。小说《缓刑》中,长大后二十多岁的“我”“住在布朗什广场附近库斯图街的一间房间里”(莫迪亚诺,2014:65),尝试写第一本书,之后还住过“格雷齐沃当广场一间很小的顶楼房间。盥洗盆靠着床”(莫迪亚诺,2014:78)。这些住处窄小、局促,与安定、温馨毫无关联。

莫迪亚诺笔下其他的居住空间,也同样有着荒凉的气息:没有家具,没有装饰,没有人气。居住者来去匆匆,无归属感。“他,三十六岁。她,二十二岁。诺伊利。底层公寓。没有家具。玻璃窗朝向布雷特威尔大道。没有车流。茶几上放着几本杂志”。(莫迪亚诺,2010:34)电报式短句,与公寓样貌风格统一。再如“没有必要再参观其他几个房间了。空荡荡的卧室。空空如也的壁橱。死一般的寂静,偶尔被一辆从布雷特威尔大道经过的汽车打破。这里的夜晚一定漫长得没有尽头”(莫迪亚诺,2014:37)。巴什拉(2017:55)曾在《空间的诗学》中评论作家博斯科(Henri Bosco)在小说《马利克鲁瓦》(*Malicroix*, 1948)中对家宅和空间的描写,赞同:寂静凸出空间的巨大。“没有什么比寂静更能表现无限空间的感受了……声响的缺席让空间变得纯粹,广阔、深邃、无限的感觉在寂静中把我们紧紧抓住。”莫迪亚诺同样很好地利用了空间与声音的这种关系,凸显环境的“空”、生活的“空”,以此暗示人物的命运无着。不同之处是在最后加了一笔时间维度的“夜漫长”,将房间的空、环境的静和时间的长三者巧妙联系在一起,从空间到时间进行联想,赋予读者多维度的感官体验,将人带入更加立体的文学世界。作者善于利用联通了的时间和空间,丰富文学描写的层次。在小说《来自遗忘的最深处》中,“我”在伦敦暂住的套间(切普斯陶别墅22号)也被赋予了类似的描写:“套间里一片寂静,林达的门缝没有透出一丝光线。我们半开着窗户,街上没有一点声音。正对面,在树荫下,一个红色的电话间里亮着灯,但没有人”(莫迪亚诺,2016:86)。无声、无光,连窗外也寂静无人。电话亭本该是沟通外界的钥匙,但依然无人,没有沟通的可能。作家描写的整个空间因此显得空旷寂静到不真实,套间如一枚时空胶囊,被封锁在生活之外。

除去声音层面,莫迪亚诺还对窗口透出的灯光有特别感受,那灯光像在给他发送信号:“一种房间里既有人又无人的感觉。玻璃窗后面,卧室是空的,但是有人留着那盏灯。对我而言,既没有现在,也没有过去,从来如此。”(莫迪亚诺,2015:44)巴什拉(2017:48)在现象学的范畴内讨论诗歌中家宅的灯光:“窗前的灯是家宅的眼睛……家宅在看,在守候,在监视,在等待。”家宅因此具有了人性,如黑夜中的眼睛,传递着孤独感。而莫迪亚诺对于这“目光”却更添丧失时间参照之感,把自身的孤独感从空间维度投射到时间维度。“有人”还是“无人”都不重要,窗口透出的灯光汇聚成某种永恒,无所谓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在透出灯光的空房间里幻化成永恒。

在小说《蜜月旅行》中,主人公英格丽特和里果几经辗转,到汝安雷班避难。他们住在高级的普罗旺斯饭店,后因动荡,在看门人的帮助下,安顿在一个别墅里,充当房屋看守。机缘巧合,这所别墅正是里果小时候妈妈常带他去的地方,这里曾给他留有阴

影,因为母亲经常整个下午把他丢在花园里,有一次甚至整晚把他忘在那里,自己独自回了戛纳。莫迪亚诺在小说中评论道:“战争恶意捉弄了他,强迫他又返回了童年这座他逃避了很久的监狱。”(莫迪亚诺,2016:74)这个别墅花园成为一个特殊的空间,联通了里果的童年。在别墅花园这个确切的空间里,过去与现在相遇,时间与空间被打通,使得这一特殊的空间具有了时间的意义。如果说巴赫金(1998:269)在谈论小说艺术中的“时空体”时,把人物的相遇看作是各自时间体系在同一空间的相遇,这个别墅花园则让人物里果在空间中看到纵向的个人历史时间,以及附着在这个空间的母子情感关系。因为母亲,里果的童年并不愉快,也无温暖。母亲与他维系的只有不幸回忆。小说中人物与母亲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衍生自莫迪亚诺的个人经历。童年时的莫迪亚诺也经常被母亲托付给朋友照看,或者在她演出时,在剧院附近闲逛,在剧院经理办公室写作业。当莫迪亚诺在安纳西上寄宿学校时,母亲打算动身去西班牙,并准备逗留很长一段时间,出发前她去看望儿子,但在莫迪亚诺看来“从她的眼神里,我没有发现慈悲的影子”(莫迪亚诺,2016:51)。

3 朋友的家

在《缓刑》中,年幼的“我”和弟弟一起寄居在母亲的几位女友在巴黎郊区一个村庄的家中。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坐落在一个宁静小村。学校、教堂、邮局、赶集的空地,甚至那个神秘的城堡都相距不远,构成一个方便的生活圈。父亲偶尔前来看望兄弟二人。这些朋友们的身份、职业模糊不明,却对“我”和弟弟照顾有加,令孩子们在情感上颇有归依感。作者曾在小说中借弟弟之口,称朋友们的住所为“家”:“我们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莫迪亚诺,2014:111)父亲曾对孩子们提及,离朋友家不远有一座路易十三风格的城堡。尽管对于孩子们来说,它的样貌有些阴森,令人害怕:“暮色中,城堡的正面和凸起的两座小楼显得阴森可怕,我和弟弟的心怦怦乱跳。”(莫迪亚诺,2014:27)但这座神秘的城堡还是不自觉地成就了孩子们与父亲之间的联系。“我们去看城堡?”成为父亲在每次午饭后说的话。城堡成了孩子们和父亲的一个共同话题、一个沟通的窗口和一种情感的维系。城堡是神秘的,有如父亲和父亲的行踪。去城堡是一种探险,接近父亲亦是如此。小说中“我”和弟弟决定夜探城堡,还幻想会遇见父亲神秘的朋友。两个孩子等其他入睡着后,提着鞋子悄悄走出房子,但每每半路折返,第二天再继续。如此每天多前进一些,但最终也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像父亲的世界,那也是孩子们永远无法企及的神秘领地。一处场所成为一种情感关系的象征:父亲所联系的空间在莫迪亚诺笔下从来不是安定、温馨、挡风避雨的家,而是朋友家附近的废弃城堡,被神秘、未知、无法接近的距离感笼罩。

莫迪亚诺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始终维持着这种神秘和遥不可及。《家谱》中描述的父亲同样是那么神秘:“关于我父亲的许多细节详情,我都没有掌握:那是个浑浊的世界,我父亲受世情事态的驱使,行走在地下和黑市之中。我母亲几乎一无所知。而我父亲带

着他的秘密走了。”（莫迪亚诺，2016：11）父子间亲密关系缺失的凭证，让作者感到单是写出父亲人生的谱系就有如“在空寂而混乱的房子里呼唤”（莫迪亚诺，2016：11），头晕目眩、呼吸急促。关于父亲的隐喻在莫迪亚诺的文学世界里汇聚成两个场所：一座神秘的城堡，令人害怕、不敢接近；一个空寂混乱的房间，使人感觉不适。

城堡与空房间隐喻缺乏温情和依恋的父子关系，带给人物的只有不适感。本应温暖治愈的片段却成了人物最想摆脱的记忆。莫迪亚诺小说中的人物一贯有着疏离的亲子关系，之所以漂泊，之所以缺乏身份认同感，之所以寻根，正是源自这种模式的亲子关系。当父母联系的不再是人物情感依归的家，而是空寂的别墅花园、神秘的城堡和空房间时，内心的流浪就此开始。

4 家 宅

相对于上文提到的临时居所，家这一固定住处在莫迪亚诺笔下同样异于常理。小说中的人物与家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蜜月旅行》中，英格丽特把“我”带到自己的住处，说：“您可以睡在我们家……”（莫迪亚诺，2016：32）但他们自己完全没有回家的感觉，当感到远处有人靠近时，他们要关闭平房里所有的灯，做出不在家的样子。大家待在黑暗中，等外面的人声走远。这显然不是他们的家。但作家对于自己出生的孔蒂河滨路15号，在《家谱》中，只被描述为“一个套间”（莫迪亚诺，2016：16）、“我父母一直住在那里”（莫迪亚诺，2016：22），客观、缺乏温度。

孔蒂河滨路15号是莫迪亚诺小说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地址。莫迪亚诺常说自己的故事并非开始于他出生的那一日，而应该是1942年6月的一天，日落时分，“一辆出租车停在孔蒂河滨路……一位年轻女子下了车：这就是她的母亲”（Commengé，2015：12）。莫迪亚诺在孔蒂河滨路15号出生，度过一部分青少年时期，在他十七岁最终回到巴黎时又与母亲同住在这里，也是在这里，他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当年作家的父母住在孔蒂河滨路15号的五楼和六楼，后来情势好的时候父亲又租下了四楼。作家记得母亲在孔蒂河滨路15号四楼的房间接待朋友们，“我”和弟弟在隔壁房间听见他们咯咯地笑。这里与母亲息息相关，但却无法在情感上勾连作家与他的母亲。由于母亲经常长时间出门，莫迪亚诺几乎没有描写过母亲与孩子们在这里度过的时间和所做的事。莫迪亚诺的父亲在孔蒂河滨路15号忙碌，打长时间的工作电话，有生意上往来的人出入套间。父亲常坐在办公桌前，叫莫迪亚诺“去马拉弗斯店里（chez Malafosse）给我买根雪茄”^①。“马拉弗斯店里”让他想起当时他喜爱的一首歌曲《当波莱尔店里的舞会》^②，两者联系在一起，在他的记忆里没有缘由地清晰。与母亲一样，父

① 参见纪录片：Bernard Pivot & Antoine de Meaux : Patrick Modiano Je me souviens de tout ..., équipage/France 5, 该纪录片于2007年播出，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15年出版。

② *Bal chez Temporel*, 1957年由Guy Béart创作的歌曲，灵感源自André Hardellet的诗。

亲与孩子们的情感联系也很少发生在家里。

科斯纳尔(2011:14)在《进入莫迪亚诺》一书中提及“孔蒂河滨路15号是莫迪亚诺长久以来一直寻觅的‘固定点’之一”。莫迪亚诺真的在写作中寻觅“固定点”吗?作家与这间公寓唯一的情感维系大约只有弟弟,这里存留着关于弟弟吕迪的所有记忆。1957年,弟弟去世。父亲在一个星期天,从寄宿学校接他回去的路上告诉了他这一不幸的消息。他立即想到的是“上个星期天,我还和弟弟在孔蒂河滨路我们的房间,一起度过了下午的时光。我们一起整理收集的邮票”(莫迪亚诺,2016:32)。这无疑是莫迪亚诺生活和记忆中的一道裂痕,一个篇章的终结。很显然,弟弟吕迪是“被父母忽略的少年莫迪亚诺心中少数几位感觉亲近的人之一”(Cosnard,2011:14)。与弟弟相伴的种种愉快记忆很多发生在家里。作家直至1975、1976年都说自己出生于1947年,表达自己对弟弟深切的怀念。作家描述道:“我认为除了我弟弟吕迪,他的死亡,我这里讲述的一切,再也没有什么能深深牵动我的心。我一页一页写下来,就像在做一个笔录,或者写一份简历,例行公事,无疑是要了解一种不是我本人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也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对于内省和扪心自问,我毫无兴趣。”(莫迪亚诺,2016:32)

这段经历和失去弟弟的心路历程在他的虚构作品中一再出现。《废墟的花朵》中,他说:“二十岁的时候,我穿过艺术桥,从塞纳河左岸来到右岸时,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脱……也许是逃避我和我弟弟都很熟悉的那个街区。没有他,那个街区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莫迪亚诺,2017:77)多年以后的一声“终于释怀”是一生最深的记忆。整个街区都因为没有弟弟而变得不同,每一个场所都带有人的印迹和气息,成了一个独特的、关乎记忆的空间。每一个场所终究还是因为人而与众不同。除弟弟吕迪外,孔蒂河滨路15号虽然如人生的参照点般时常出现在他的写作中,但却并未拥有作家任何的温情描述,有时这个地方甚至是他想要逃离的。科芒热(2015:15)也有同样感受,在书中比喻“孔蒂河滨路15号是一个我们不停想要远离的码头”。莫迪亚诺的家——孔蒂河滨路15号——维系了他矛盾的情感,它神秘莫测,让人想要逃离,却无法被忘却,成为作家人生中,也是他笔下的文学世界里最为特殊的一个地址。与其说是他要寻找的“固定点”,不如说是他试图逃离的“出发点”,他人生所有“逃逸线”^①的发出端。关于这个人生最初的参照点,作者借助小说描述过那里曾经出入过、短暂居住过的人们。他们身份模糊,在孩子眼里充满神秘感。巴什拉(2017:24)说:“家宅是我们最初的宇宙。”仿佛从一开始,生活对于莫迪亚诺就满是谜团,神秘、不可知。

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存在着各种类型不同的居住空间。无论酒店房间、租住的房间、借住的公寓、朋友家还是自己的家都有着矛盾的特征:一方面这些居所的地址和位置极其精确;另一方面居所的所有者、进出这些空间的人物始终被谜团笼罩,无从追究他们的行迹和真实身份。真实、确切的空间是莫迪亚诺写作的重要动机之一,作家的艺

^① 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千高原》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完全脱离质量线,由破裂到断裂,主体在难以控制的流变多样中成为碎片,是我们的解放之线。莫迪亚诺喜欢在小说中使用这一概念。如在《地平线》中,他将条条街道比作通向未来和地平线的逃逸线。

术正是在于凭借他所需要的这份精确和真实去描绘虚无缥缈的记忆和人类情感。

莫迪亚诺对人物居住空间的描绘基于空间而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维度并置、叠加，使两者同质化，以便于人物在记忆中随意穿梭，无所谓过去、现在或是将来，一切都被统合在当下的空间中，形成自己的“时空体”。此外，莫迪亚诺的空间还与人的感官维度关联密切，声音、光线，都能赋予空间更为丰富、深层的内涵。

巴什拉（2017：17）在进行空间分析和探索时注重挖掘“空间的人性价值”，被想象力把握的空间不再是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客观空间，而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莫迪亚诺的文学书写实践正是强调了被想象力丰富了的空间的人性价值。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和内心感受在诸如家宅、暂住地、租住房间等本应安定舒适的居住空间中，却体现出孤独感、漂泊感和安全感的缺失。莫迪亚诺笔下的种种居所几乎没有获得人物任何情感上的牵挂，主人公的寻找因此也时常停留在一个个具体的地址上，找到地址却找不到记忆中的那个人。居住空间与居住者的高度分离成就了莫迪亚诺小说迷的氛围和寻找的主题。居住空间承载了跨越时空藩篱的迷失和某种意义上的寻找，仅存于记忆和想象中，却成就了对某种人类情感的真实描摹。作家基于个人经验的写作、追忆和内心世界的探索使其笔下人物与居住空间产生分离和反差，使逃离成为人物的必然诉求。空间与情感的反常态对应体现了莫迪亚诺小说中某种“流浪灵魂”的基调。人物内心的自在和舒适对应的外在空间何在？需另外撰文分析说明。

参考文献：

- [1] Bachelard Gaston. *La poétique de l'espace*[M]. Paris: PUF, 2017.
- [2] Commeng é , B é atrice. *Le Paris de Modiano*[M]. Paris: Alexandrines, 2015.
- [3] Cosnard Denis. *Dans la peau de Patrick Modiano*[M]. Paris: Fayard, 2011.
- [4]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 [5]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三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6]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青春咖啡馆[M]. 金龙格,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7]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缓刑[M]. 严胜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 [8]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夜的草[M]. 金龙格, 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5.
- [9]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家谱[M]. 李玉民,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 [10]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来自遗忘的最深处[M]. 冯寿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 [11]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蜜月旅行[M]. 唐珍,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 [12]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废墟的花朵[M]. 胡小跃,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作者简介：

史焯婷，女，1983年6月生，浙江杭州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高级讲师，主要从事法国当代文学、法国文学与电影研究。

论女性意识的缺失与觉醒

——以《祝福》和《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主人公命运为例

◎魏蔚

鲁迅的《祝福》和劳拉·埃斯基韦尔的《恰似水之于巧克力》呈现了传统中国和墨西哥两种不同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社会底层妇女对命运遭际不同程度的反抗。本文以作品中祥林嫂和蒂塔为例，探析同样是在风云变幻的革命背景下，女性在封建传统的压迫、生理与心理的压抑及婚姻与爱情不幸的处境下，通过各自的抉择体现出的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进而探析造成她们不同命运的深层缘由。虽然是两部不同长度、不同语境的小说，选取的两位女主人公出自不同年代、不同国度，但是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用女性来传达对社会的看法，两部小说的主题也具有相似性，都从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塑造人物，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揭示了在人物命运的发展过程中渗透着的救赎观念。祥林嫂和蒂塔二人虽同是社会生活的弱者、被侮辱者与被迫害者，然而有着相似命运遭际的两人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从总体上看，在人物的命运结局上，祥林嫂的命运要比蒂塔悲惨得多，而在对这两人命运的比较过程中，可以发现二者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对个人悲剧命运的身份定位、反抗方式以及救赎观等方面。

1 封建礼教桎梏下激起对命运反抗的共同性

祥林嫂和蒂塔都是活在底层的农村妇女，她们淳朴、善良、勤劳。然而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都失去了享受婚姻自由的权利。

祥林嫂有过两次婚姻，都很不幸。第一次嫁给了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夭折了。对于这段婚姻鲁迅先生这样描述：“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仅仅几句话，就可以知道祥林嫂的第一段婚姻并不幸福。试想祥林嫂初到鲁四老爷家打工也就二十六七岁的样子，此时丈夫已经过世了，那么嫁到祥林家，面对十多岁的丈夫，祥林嫂能享受到丈夫多少的关爱和体贴？恐怕更多的是给丈夫家添了个劳动力而已。加之有厉害的婆婆要服侍，下有年幼的小叔子要照顾，祥林嫂的重担可想而知。而祥林嫂的第二次婚姻是婆婆将她像牲口一样卖给了深山里的贺老六，是为了给小儿子换聘礼钱。尽管祥林嫂拼死反抗，但最终还

是向命运妥协了。很快祥林嫂有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有力气会做活，本以为人物命运就此改变，谁知夫死儿亡的双重打击再次降临到这个不幸女人的身上。

在墨西哥农村一个没落的家族中，母亲艾莱娜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长。她掌管着家族内一切大小事务。这个家族秉承着许多封建陋习，其中有一条规定，最小的女儿蒂塔要伺候老人直到归天，此前不得出嫁。因为艾莱娜的独断专行，蒂塔三姐妹从小就完全处于母亲的控制下，蒂塔早已习惯了逆来顺受。在婚姻问题上，尽管蒂塔深爱着青梅竹马佩德罗，但是由于母亲执意遵循封建习俗，断送了自己本该享有的幸福生活。蒂塔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将自己的姐姐嫁给了爱人佩德罗，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拱手让给别人。婚后的大姐罗萨乌拉和姐夫佩德罗仍住在母亲家里，这让蒂塔承受着心理上的痛楚和精神上的折磨。好在小外甥罗伯特的出生给蒂塔带来了一丝心灵的慰藉。蒂塔将全部的爱给予了这个小生命并担当了他的乳母。当发现蒂塔和佩德罗私下仍有接触，母亲艾莱娜断然将罗萨乌拉一家送往美国，避免蒂塔与佩德罗旧情复燃，这间接导致后来罗伯特的死亡。当得知小外甥夭折的消息，蒂塔十分绝望，也彻底被激怒了，决心反抗。

2 自我救赎中女性意识的缺失与觉醒的差异性

2.1 “意识缺失”的祥林嫂反抗注定失败

祥林嫂的一生一共进行过四次对命运的反抗。第一次是在丈夫祥林死后，因为不愿意被婆家卖掉所以偷偷跑出来，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女工。应该说祥林嫂第一次的反抗出自本能，是大胆而进步的。旧社会的女性即便是丈夫没了，按照传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观念，守寡的媳妇也只能听从夫家安排，任人鱼肉。但是祥林嫂并未屈从，她逃了出来，到鲁镇做工，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获得一份温饱，得到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当鲁四老爷得知她是一个寡妇的时候，“立刻皱起了眉头”，可见人心之冷淡，这个封建守旧派不但没有怜悯之心，反而嫌弃祥林嫂的出身，好在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勤劳本分留了下来。

然而，很快祥林嫂的婆婆追到了鲁镇，将祥林嫂带回卖给深山里的贺老六。“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祥林嫂第二次的反抗更加激烈，以死相拼。这一次的反抗，祥林嫂简直豁出了性命，无论是肢体还是言语都进行了激烈的抗争。然而这次反抗最根本的原因并非祥林嫂为了自身的婚姻自由而反抗，而是维护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数千年的强加于女性的所谓“贞洁”观。“烈女不侍二夫”，这种封建伦理道德根深蒂固地扎在祥林嫂的思想里，是她再嫁时拼死反抗的根本原因，而并非是女性意识作用下对婚姻自由的渴望。然而，身为女子，祥林嫂本就是弱小的，

无能为力的，最终只能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再婚后的祥林嫂有了自己的儿子，刚刚过上平静的生活，谁知命运再次捉弄这个可怜的女人，丈夫死了，儿子被狼叼走了，大伯把房子收了回去。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只能再次回到鲁镇帮工。

再次回到鲁四老爷家的祥林嫂不似先前，变化很大。“我真傻，真的……”祥林嫂一遍遍地向鲁镇的人们讲着自己的悲惨遭遇，重复着儿子被狼叼走的故事，言语中充满了自责和忏悔。然而在鲁镇，人们虽然对祥林嫂的自责与忏悔表示一点同情，但也止于听一听她的倾诉，而更多人把它作为无聊生活的一种调剂，“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世态的凉薄使祥林嫂无法自我救赎。

祥林嫂的第三次反抗应当是捐门槛。她听信了柳妈的话：“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所以，祥林嫂辛苦攒了一年的工钱去土地庙捐了门槛，以为这样就可以在死后改变命运，免得被锯成两半。可以说这是祥林嫂的再次自我救赎，也是在历尽人间疾苦和世间冷眼后重燃对生活的一点希望。在捐完门槛以后，祥林嫂以为洗清了罪过，和普通人一样，当她在冬至祭祖时节，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却被四婶喝令放下时，“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祥林嫂以为通过这种迷信的方式能够救赎自己，而现实却将“不祥之人”的烙印永远刻在她的身上。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思想早就被封建礼教所奴化，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祥林嫂通过勤恳劳动辛苦攒了一年的工钱，想通过捐门槛为自己“赎罪”，摆脱“不洁”“不祥”之人的命运，而四婶的一声喝令断送了她希望。

祥林嫂最后一次对命运的挣扎是在遇到“我”时，她对世上是否有灵魂和地狱提出了质问，她想知道自己死后的命运是怎样的，她在临死前还是要和命运做斗争。她以为“我”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她以为“我”可以拯救她，可是最终她的抗争都是徒劳。就这样，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旧社会，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祥林嫂进行了四次命运的反抗却没能实现自我救赎，最终走向了人生末路。

2.2 “意识觉醒”的蒂塔抗争终获胜利

相比之下，蒂塔在一步步向命运反抗的过程中唤醒了女性意识，从而迈向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什么是女性意识？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 and 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

小说中蒂塔由一个没有自我意识，处在母亲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被异化了的人，发展成萌发了反抗意识，试图摆脱母亲的控制，寻求自身独立，努力追求真爱，具有斗争精神的女性。

最初，蒂塔一直以“他者”的身份生活。对于母亲的专制逆来顺受，她习惯了压抑自我。但是当艾莱娜拒绝了青梅竹马佩德罗对自己的求婚的时候，蒂塔萌生了反抗的念头。她不顾母亲的警告，反复提起与佩德罗的婚事，试图通过与母亲的沟通来挽救将

被扼杀的爱情。与母亲产生言语冲撞是蒂塔的第一次反抗行为，尽管最终蒂塔向母亲妥协，但反抗意识已在蒂塔心中悄然萌芽。

小外甥罗伯特的死彻底激怒了蒂塔，这让她对母亲的憎恨到达了极点。蒂塔觉得母亲是导致罗伯特死亡的罪魁祸首。多年积累的愤恨一下子如洪水般爆发，因为罗伯特的死，母女俩发生激烈的争吵。为此，蒂塔遭到母亲残忍的毒打，她爬到鸽子房里将自己关起来，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一方面是对母亲野蛮行为的反抗，同时反映出蒂塔希望寻求自我独立。直到布朗医生赶到，将她从那个牢笼一般的家里救出来。即便蒂塔知道艾莱娜要求布朗医生把她送进疯人院，她也毫无抗拒地跟着布朗医生离开了那个家。可以看出，蒂塔已经迫切期望摆脱家的束缚，摆脱母亲艾莱娜的控制，渴望自身的独立。

对于布朗医生的求婚，蒂塔没有征求母亲的同意，没有受制于“不能结婚”的规定，自己答应了这门婚事。这一方面说明蒂塔努力摆脱母亲的控制，一方面表明蒂塔要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艾莱娜的死消除了蒂塔与佩德罗之间最大的障碍。但是每当蒂塔和佩德罗有进一步接触的时候，母亲的幽灵就会出来警告蒂塔，阻止将要发生的事情。面对死了的艾莱娜变作幽灵还要来控制自己，蒂塔无法忍受。她反对母亲所谓的“正派女人”的定义，对人生有着自己的认识，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认为我就是我！一个有一切权利过她觉得最快乐生活的人。”这番话证明了蒂塔不再是个没有自我意识、任人支配、失去主观人格的人，对人生、对生活她有着自己的理解。当姐姐罗萨乌拉用家庭传统来制约蒂塔，迫使她断绝与佩德罗的交往，蒂塔也并没有妥协。她反驳道：“只要这种可恶的传统轻视我，我需要违背多少次就违背多少次。我和你一样有结婚的权利，你却没有权力在两个深深相爱的人中间插足。”此时的蒂塔不仅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要追求自己作为女人获得婚姻幸福的权利和自由。她蔑视封建传统，憎恨那些没有人性的规定，她坚持并努力争取自己的爱情，维护属于自己的权益，她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决定过快乐的生活。伴随着成长，蒂塔的女性意识由最初的萌芽到发展直至走向了成熟。不仅如此，蒂塔还帮助外甥女反抗命运。罗萨乌拉生前曾要求自己唯一的女儿埃斯佩兰莎不许结婚服侍自己直至终老，并且认为女孩没必要去读书，是蒂塔对姐姐的不懈斗争终于说服了她让外甥女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她努力劝说罗萨乌拉消除愚昧的封建观念，不要剥夺女儿的婚姻自由。终于，在佩德罗与蒂塔共同努力下，埃斯佩兰莎获得了自己的幸福。对于真爱的坚持，蒂塔最终放弃了与布朗医生结婚，而是选择和佩德罗在一起。就在埃斯佩兰莎婚礼的当天，蒂塔和佩德罗终于等到了盼望已久的时刻。他们再也不用害怕母亲的监视，不用顾忌罗萨乌拉的猜忌，不用理会世俗的眼光，大胆地结合在一起。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激情的燃烧将他们融为一体永远不再分开。

3 揭示女性意识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3.1 社会价值评判体系标准影响个体的救赎观

在封建伦理道德奴化人们思想数千年的旧中国,社会对个人的价值评判要远远超过个体的自身价值评判,个体的行为标准必须符合当时社会认同的封建文化体系,否则就会被孤立,被排斥。祥林嫂始终将遵循封建礼教的传统凌驾于个人反抗的一切行为基础之上,实际最根本的目的是回到社会群体中,不愿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和习俗。失去自我的祥林嫂意识不到命运对她的不公,习惯了接受与顺从,无法认识到自身悲剧的根源是封建传统的压迫,更难以激发作为独立个体追求自身权益的意识觉醒。同时周围人的自私和冷漠也进一步摧残了祥林嫂的个人意识。

初到鲁四老爷家,“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鲁四老爷作为一个封建男权体系下的卫道士,他不可能同情祥林嫂这样一个丧夫的寡妇,在他眼里,祥林嫂只是一个佣人、一个伤风败俗的“谬种”,她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物件”而已。这也进一步加深了祥林嫂的心理暗示,认为自己是个不祥的人。

在丈夫祥林死后,婆婆为了给小儿子换聘礼钱,强行逼婚,不顾祥林嫂的拼死反抗,把她卖给了贺老六。正是婆婆的这一举措使得祥林嫂日后背上了“不洁”的罪名。

还有柳妈,名义上是在帮祥林嫂,实际将她进一步推向了鬼门关。她劝祥林嫂“捐门槛”,曾给了这个可怜女人一丝希望,却在希望破灭后彻底绝望。

重回鲁镇的祥林嫂不停地重复着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以这种方式来忏悔。但那时的社会,人们的同情心是有限的,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祥林嫂的悲剧只是他们生活的调味剂,是茶余饭后的闲话,听的遍数多了,祥林嫂的悲哀与忏悔就成了“渣滓”。

包括文章中的“我”,当祥林嫂对世上是否有魂灵和地狱提出了质问,她想知道自己死后的命运是怎样的,她以为“我”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她以为“我”可以拯救她,但是“我”似有可无的回答或许断绝了她最后一点希望。而“我”唯恐惹了麻烦,避而远之。虽然对祥林嫂有过一丝怜悯,却也和鲁镇的人们一样“爱莫能助”。

反观蒂塔不同的命运结局,不难发现,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并推动蒂塔女性意识的觉醒。因为一条没有人性的封建家规而剥夺了两个年轻人的婚姻幸福,这是导致蒂塔开始反抗的根本原因。由于生长在一个浓厚封建色彩的家庭中,加之当时整个社会的保守落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及先进思想的熏陶,蒂塔不可能自发地意识觉醒。当封建传统束缚了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否定个人价值、使人的精神受到压抑,就会本能地激发出内在的反抗意识。而只有敢于和封建传统反抗,才会萌发“人”作为一个个体要求自身独立的意识,再到作为一个女人要求自我权益的实现和对人生意义的全新认识,最终将意识的觉醒转化为实际行动。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价值观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与祥林嫂所处的群体价值观不同，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是西方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个体都有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意愿和权利。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引领下，蒂塔从个体利益出发，从追求自我幸福出发，认识到封建传统阻碍婚姻自由，必须要违背传统，反抗不公正的待遇，开始对自身作为女性在独立、自主、寻求自由、追求真爱等方面提出要求，使得蒂塔的女性意识在反抗中逐渐成熟。相比之下，蒂塔的反抗成功还来自周围朋友家人鼓励帮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首先，二姐赫特鲁迪斯从家里成功逃走并获得幸福的例子对于蒂塔是极大的鼓舞。小说中的赫特鲁迪斯是个叛逆少女的形象。她赤身裸体地跑到草原上被一个军人虏走，而后被卖到妓院，之后又参军打仗成了将领并且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使得母亲艾莱娜为了维护家族的名誉对外宣布“她的二女儿死了”。但是在蒂塔眼里，二姐逃离了母亲的控制，大胆地追求到了爱情并且后来衣锦还乡，真是风光无比。同时，赫特鲁迪斯还以自己为例不断地鼓励蒂塔勇敢地追求真爱。二姐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蒂塔。

促使蒂塔打破封建陋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外甥和外甥女的不幸遭遇。因为难产做了手术，罗萨乌拉不再有生育能力，刚出生的埃斯佩兰莎成为佩德罗和罗萨乌拉唯一的女儿。这就注定了她将和她姨娘有一样的命运，服侍她的母亲直到寿终正寝。之前由于母亲的自私导致外甥罗伯特无人照顾而死，这让蒂塔痛心不已，因此她对这个外甥女更是疼爱有加，不忍心看着她重蹈自己的覆辙，于是她试图说服姐姐放弃愚蠢的想法。但是迂腐的罗萨乌拉继承了母亲的冷漠、自私和封建思想，执意要遵照家庭传统。这激怒了蒂塔，她不允许这种毫无人性的传统继续残存危害更多的人。蒂塔对于维护女性权益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她不仅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奋斗，而且为一切受害女性的权益而斗争。于是在两姐妹之间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争吵。最终以罗萨乌拉的死结束了这场战争。

还有布朗医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及照顾，让蒂塔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坚定了对爱情的信念，这些对蒂塔坚持追寻幸福而不懈努力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2 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下对个体主义身份建构产生不同的影响

作为社会底层的祥林嫂，对封建礼教为她带来的种种不幸，有着出自本能的摆脱、甚至反抗的欲望，但同时，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习惯力量往往又使她不自觉地恪守着这种礼教。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里，群体价值才是社会的主体，相反，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如果纳入不到群体的价值系统，就毫无地位可言。祥林嫂极力渴望得到社会群体的承认和肯定，对封建思想的毒害浑然不觉。她从未想过社会的不公平，反而承认社会对待自己的合理性，并自觉用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味地忍受和顺从，自以为自己是一个有罪之人。所以，她的反抗是以遵循封建礼教为女性所制定的规范为基础、为目的的。可以说祥林嫂为维护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贞洁名声而反抗，为得不到别人对自己贞洁的认同而绝望。祥林嫂的悲剧体现的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

的湮灭了个人主体性的“他者”文化，祥林嫂的抗婚、捐门槛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可以说祥林嫂的死是由于无法挽回别人对她的承认，使她丧失了回到大众中去的希望造成的。祥林嫂的死是丧失了希望的痛苦的死。从祥林嫂的悲剧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蒂塔的悲剧同样来自封建传统的束缚，失去了婚姻自由。但是在与命运反抗的过程中，正值墨西哥民主革命时期，受民主洪流思想的洗礼，蒂塔由“他者”的生活状态逐渐地自我意识苏醒，认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作为独立个体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为女性，蒂塔对爱情的追求是忠贞的，执着的，她不顾一切阻碍，勇敢地和代表封建礼教维护者的母亲、姐姐进行着一系列的反抗斗争。女性意识觉醒下的蒂塔有着明确的斗争目的，以“自我”为中心，她敢于打破传统，敢于轻视陋习，敢于同一切阻碍女性获得自由和幸福的势力斗争。更值得称道的是蒂塔在女性意识唤醒之后，不仅为自己的权益反抗，还帮助了和她有相似遭遇的其他女性，成为女性反抗压迫获得解自由的典范。

4 结 语

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之下，在社会上处于受压制地位的妇女想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现状是非常困难的，想要获得爱情及婚姻自由更是难上加难。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价值观对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或是泯灭有一定的催化剂作用，自我意识的苏醒与否甚至改变了女人一生的命运走向。或许起初的祥林嫂是有一定自我意识的，但是命运多舛、社会的冷漠使她变得麻木，而当时社会的不公使得女性群体处于弱势，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早已侵蚀了人的灵魂，失去自我的祥林嫂仅仅出自本能地反抗随之屈服。而蒂塔所处的墨西哥大革命时代，民主的洪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扫清封建腐朽的残余，而蒂塔本身也是极具反抗意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促使她不断地为自己的爱情努力奋斗。她渴望爱情，渴望自由，渴望平等，反对以母亲和大姐为代表的封建保守势力对自己权利的扼杀，蒂塔没有因为母亲的淫威而屈服，更没有失去自我，她记得自己想要什么并试图去争取得到。应该说这两位女性所体现的自我意识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相当关联。

通过这两位女性人物的反抗及命运遭际的比较，启示人们只有在民主、开放、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才有更多的自由展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而无论身处怎样的社会和时代，女性自我的独立和解放是思想自由的基础，女性在潮流中对自我的把握是极其关键的。社会对女性有着种种偏见和既成约束，如果只是顺应这种性别歧视和任由自我性情的发展是无利于女性地位和正常权利的保证的。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小说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
- [2] 郭和英.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思——透析安娜悲剧及对现代女性启示 [J]. 科教文汇 (上旬刊), 2008(1): 157-158.
- [3] 劳拉·埃斯基韦尔. 恰似水之于巧克力 [M]. 朱景冬, 译. 广西: 接力出版社, 2007.
- [4] 胡华珍. 救赎与求索——祥林嫂人物形象及意义新探的两个关键词 [J]. 语文教学之友, 2007(8): 35-37.
- [5] 刘自宇. 祥林嫂人物形象的心理分析 [J]. 北方文学, 2011(9): 40-41.
- [6] 马秀丽, 孙颖. 不同文化中女性的悲歌: 祥林嫂和苔丝命运比较 [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4): 637-640.
- [7] 许琪. 相似的遭际不同的反抗——海斯特与祥林嫂的命运悲剧比较 [J].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4): 49-51.
- [8] 翁菊芳. 论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男性文本女性意识的意义 [J]. 黑河学刊, 2009(4): 142-144.

作者简介:

魏蔚, 女, 1989年1月出生, 江苏淮安人, 硕士研究生,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教师, 讲师, 主要从事西班牙及拉美文学研究。

外语教育教学研究

从“学科德育”到“课程思政”

——高校《经贸西班牙语》课程中的德育创新与路径研究^①

◎耿璐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精神，促进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育人，近几年来国内关于“课程思政”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高燕（2017）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学生的思想教育主要还是落在思政类课程上；另一方面我国高校普遍存在专业课与思政课各自为战的现象，课程思政化改革在推行中遇到的阻力与困惑很多，这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全国高校大力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遵循以德树人，实现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水平本科教育全过程，将课程的价值导向与知识导向相融合，明确每一门课程的德育功能，强化每一位教师的育人意识，完善每一节课堂的评价标准，抓好每一门课的教育实效。陆道坤（2018）认为，作为语言类高校教师，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做好本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积极推动教学改革，充分发挥各学科、各专业课程的思想价值引领和育人功能，以发挥专业课应有的思政教育作用。以具体的《经贸西班牙语》专业课程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探讨其蕴含的德育元素及思政教育开展路径，切实履行培育兼具“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的经贸西班牙语人才的社会责任。

1 “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从“育人”的本质要求出发，进一步强化对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坚持和运用，从而使各类课程与思政理论课同向而行，形成协同效用。“课程思政”不是一门独立的课程，其实质是一种创新性的教学理念和思维方式，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和改革，实施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一种探索，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与发展，有利于发挥专业课程的德育功能，提炼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从而实现知识的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相统一，进一步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

^①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2018年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经贸西班牙语》（项目编号：SZ1808）的研究成果。

2 “大思政”背景下《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2.1 课程教学目标要求

《经贸西班牙语》为西班牙语专业经贸方向选修课,开设在第6学期,每周2学时,共34学时,2学分,本课程主要针对西班牙语高年级学生授课,是人才培养与地区区域经济结合的实践性课程。本课程是在学生具备一定西班牙语语言基础之后,有方向性地进行了知识的拓展以及实践运用,突出培养学生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及相关专业的西班牙语交流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将来就业需求。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搭建专业西班牙语经贸教学平台,通过多样化、多层次的立体课程体系,扩充学生经贸西班牙语知识,熟悉国际商务环境,培养学生商务协作等交际能力和商务口语笔译能力,加强对未来经贸方向就业所需“关键能力”的培养,为学生从事商务工作打下初步基础。此外,通过导学,使学生了解该课程安排以及开设的目的,认识到作为一名涉外商务工作者应具有的高素质品质。最后,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也为“经贸西班牙语口译”“经贸文章选读”“商务谈判”和高年级的其他翻译课程,如“西班牙语高级翻译”“实用商务西班牙语”等打下良好基础。

2.2 课程德育目标要求

《经贸西班牙语》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的专业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商务文化素养的形成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从而最终成为高素质应用型复合西班牙语人才。因此,若要在此课程中实行课程思政改革,须将思政教育和经贸西语课堂结合起来,在课堂传授经贸西语知识的同时,适当并合理地进行思政教育,而又避免让西语课堂变成思政课堂。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把立德树人作为重要指导思想,在课堂授课、学习讨论、课外交流、成果展示等教学环节中将思政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融入渗透,以真正实现道德育人、过程育人。本课程的德育目标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培养学生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培养学生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爱国情怀和高尚的政治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兼具中国情怀与全球化视野;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操守;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团结协作意识和竞争意识;具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3 《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

以具体的《经贸西班牙语》专业课程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探讨其蕴含的德育元素及思政教育开展路径，其意义在于：

3.1 立足新时代，深入贯彻落实高校思政教育理念，满足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需求

《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是人才培养与地区区域经济结合的实践性课程，因此在思政育人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石书臣（2018）认为，教师可以精心设计融入思政教育元素的教学内容，进行多元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更好地将大学生思政教育自然融入课堂；进行教学评价方式改革，增加对学生品质、道德、素质等方面的考核，使学生在课堂上不知不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进而实践文化育人、专业育人的大思政教育理念。本课程的建设是积极响应和落实党中央提出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切实表现。

3.2 丰富《经贸西班牙语》教育教学理念，助力人才培养方案的实现，提高教学质量

《经贸西班牙语》课程为西班牙语专业经贸方向教学核心课程之一，主要针对西班牙语高年级学生授课，是人才培养与地区区域经济结合的实践性课程。经贸西班牙语是一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在实践应用的经贸方向的核心课程。其课程内容大多与学生未来从事商务工作的内容及方式息息相关，涉及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经贸西班牙语技能的培养、文化教育、思想教育、未来就业发展规划等，从而达到“外语+商务知识”复合型人才培养目的。因此开展教学时特别注重学生各类经贸知识层面的拓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充分结合口笔译进行国际商务知识的灌输。该课程寓人文关怀教育于专业教学过程之中，是一门兼顾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素养和人文素质的实践性课程，对经贸西班牙语人才的培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于《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教学中融入德育元素，是和经贸西班牙语教育目的相一致的，并且也是对该课程教学目标的贯彻落实。

3.3 探索构建具有本校特色的《经贸西班牙语》课程实践教学体系，从而使经贸西班牙语人才既能满足当下行业需求，更具有后续上升空间和可持续发展力

《经贸西班牙语》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的专业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搭建专业西班牙语经贸教学平台，通过多样化、多层次的立体课程体系，扩充学生经贸西班牙语知识，熟悉国际商务环境，培养学生商务协作等交际能力和商务口笔译能力，加强对学生未来经贸方向就业所需“关键能力”的培养，为学生从事商务工作打下初步基础。因此通过本项目的研究，有助于学生商务文化素养的

形成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从而最终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西班牙语人才,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4 《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分析

新形势下,与专业课相结合的课程思政是各大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发展途径。近年来《经贸西班牙语》课程的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基本符合各高校转型和上升发展阶段的教学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该课程从“思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的路径尚不成熟,具体表现在:

4.1 课程体系不完善,无法满足德育目标和人才培养要求

以《经贸西班牙语》课程为例,缺乏较完整的课程思政的整体教学设计和规划,且目前多数《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思政在教学大纲中缺乏对价值观培养目标的重视,仅有的情感目标则是围绕培养经贸西语专业意识而展开,忽视了对其他隐性思政元素的关注。具体表现为教师在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都缺乏对“价值观引领”的重视,使得学生把视野普遍局限在生活周边,对西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缺乏敏感度。

4.2 教材资源相对匮乏,无法适应“大思政”背景下社会发展的需求

教材方面,目前绝大多数院校使用的教材都为《经贸西班牙语》系列教材。但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无论是教材内容或是更新速度都难以与经济保持同步,无法及时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没有体现出更多的兴趣,教学任务设置与教学产出不平衡。

4.3 教学模式相对传统单一,不能把脉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当前,“90后”大学生具有思想活跃且善于表达、追求平等和个性、网络信息和知识丰富、娱乐精神浓厚、有较强的好奇心和上进心等鲜明特点。这些个性特点和学习方式,既蕴含了创新精神,具有不墨守成规、奇异、求变的优势,也对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出新要求。因此,迫切需要顺应学生的时代特点,探索更多体验式、互动式的手段与方法,真正唤醒学生的价值认同感。

4.4 教学方法、教学评估、师资队伍建设等整体性问题仍然存在,未能与思政课程形成教育合力

《经贸西班牙语》作为经贸西语教育的主阵地,科学完善的教育教学体系的建立不是一日之功,因此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在学生专业素养养成中形成教育合力,形成协同效应都需要坚持不懈的探索。

5 《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内容

《经贸西班牙语》涵盖了商务和贸易的方方面面，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内容根据其教育教学规律和课程思政的现实状况，系统地从课程思政目标、课程思政元素、课程思政载体、课程思政手段与方法、课程思政评价等多个角度展开：（1）多轨对接，修订教学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人才培养大纲，教学大纲必须要详细，且要体现出经贸西语课程思政教育的知识点以及育人的相关教学环节；（2）尊重学科知识的特点，完善课程体系与评价模式，明确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充分挖掘经贸西语教材里的德育元素，并将思政教育贯穿课堂教学；（3）积极转变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多渠道创新课程设计，以此来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比如将《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思政教育有效结合 MOOC、雨课堂、微课、微信等网络平台，形成线上线下多平台联动的混合式教学，彰显“外语+”课程思政特色；（4）创新思政学习平台与资源，融汇关联的德育资源，使教学更关注生活实际，巧妙在教学中创设思政建设情境，以营造良好的高校思政氛围，为学生开拓课堂空间；（5）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提升教师德育水平，明确团队教师的选拔要求和育人责任，建立团队教师的培养机制，参与课程思政的推进、交流活动，开展相关教研活动；（6）加强课程督导与交流，组织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与相关专家共同听课、集体备课，对课程内容、形式、效果等加强探讨研究，实现全过程指导，不断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鼓励教师投入更多时间精力研究课程思政，将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纳入评教指标，注重运用课程思政建设成果，落实育人价值导向，形成全员育人有效机制。

此外，在“核心素养”的导向下，《经贸西班牙语》课程应充分考虑不同阶段的学生培养目标，确立科学的课程思政考核模式与评价模式评价。邱伟光（2017）认为，课程的评价方式应该从结果性评价转向过程性评价，立足于经贸西班牙语核心素养培养的价值取向，坚持“基础适度、重视能力、强化素养”的指导，在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评价主体、评价手段等方面给予教师和学生更多的主动权，向多元化、多维度的方向发展，为培养应用型复合人才创造途径。此外，王涵（2017）认为，其一，要激励教师的“教”，丰富评价标准。教师在进行《经贸西班牙语》课堂教学时，应丰富课堂教学内容，通过开展融汇了德育资源的课堂活动使学生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的思政氛围。教师不仅要关注教学任务的完成，更应该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专业能力的培养和德育意识的养成。此外，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不应仅仅依靠其卷面成绩，还应将该学生课堂发言、参与度、实践活动等作为参考项，并适当增加其比重，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观的树立，以促进全面发展。其二，要改善学生的“学”，选择适应的评价内容。引导学生通过新的评价方式认识到经贸西班牙语学习上的不足之处，建立勇于进行经贸西语活动探究、深化经贸西语知识理解和谋求深入学习的自信，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其三，要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最大化实现

教、学、评一体化的高度适配。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配合、默契程度越高，一体化越高，教学效果也就越好，此外要注重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的有机结合。其四，要创新评价手段和评价方法，引入多元主体评价机制。需要准确收集课堂内外学生的各方面数据，并及时做到反馈，多采用观察法、问卷调查法等评价方法。

6 《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探索

6.1 实施思路

首先，根据《经贸西班牙语》课程的内容特点，梳理该课程中蕴含的德育元素；其次，将思政元素融入实际授课教学环节中，在课程思政建设“核心素养”的指导下对每周的课程进行设计，具体包括教案设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表、“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随记；最后，实施本课程思政教育改革，并分析其效果。

6.2 实施过程

首先，在西班牙语专业三年级某班进行一学期的《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思政建设先导研究，组织学生建立思政教学案例库，分析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及时调整建设模式；其次，在两个班级进行为期两个学期的《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教学，对课程整体效果、教学活动评价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对个案进行追踪；最后，整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表、“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随记，进一步完善思政教学案例库的建设。

6.3 实施路径

要在《经贸西班牙语》专业教学中融入德育元素，田鸿芬、付宏（2018）认为，首先要把课堂教学重心下移，全面关注学生的发展需求，在完成课堂知识传授和培养学生能力的基础上，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培养其成为高素质应用型复合西班牙语人才。《经贸西班牙语》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需要不断地挖掘，在遵循授课计划、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下表列举了该课程部分思政元素的融入路径。

表1 《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设计

专题知识点	可切入的课程内容	思政元素的映射与融入
专题1： “一带一路” 倡议与西语国 家	“一带一路”倡议；“一 带一路”倡议下西语 国家发展新机遇	以“一带一路”为教学切入点，为学生们更好地认识这个倡议下中国和西语国家的发展合作新契机提供各种详实的经济数据，以增强西语专业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和义务意识。

专题知识点	可切入的课程内容	思政元素的映射与融入
专题 2： 中国与西语国家关系新时代	中国与西班牙外交关系发展史与前景；中国与拉美地区外交关系发展史与前景	以 2018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西班牙、阿根廷和巴拿马的国事访问，以及中国与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外交关系的正式确立为教学切入点，让学生们切身体会到国家政治、文化、外交的发展前景和经贸的发展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从而培养学生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爱国情怀和较高的政治素养，兼具中国情怀与全球化视野。
专题 3： 中国梦与拉美梦	“拉美陷阱”；中国梦助力拉美梦	以“拉美陷阱”为切入点分析拉美国家贫富不均、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等现象，并以此为前车之鉴让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并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更加广阔的胸怀、在更宽领域上推动中拉关系的共同发展。
专题 4： 国际货币与金融政策	中西双边贸易发展现状；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纠纷	以中西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切入点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通过商务谈判实例分析、国际贸易纠纷案例分析，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职业素质和道德修养。
专题 5： 公司发展与诚信经营	组织结构；西班牙中小企业；跨国公司	以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为融入点，充分利用口笔译进行国际商务知识的灌输，培养学生今后无论是在创业者、投资者、外贸从业者、商务口笔译或是其他职业角色上，都要具有对自己、对社会、对人类良好的价值观、良好的职业操守、良好的质量信誉和服务信誉，以及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珍贵品质。
专题 6： 西班牙与拉美地区青年就业现状	经济危机；失业率高、劳动力市场疲软	以西班牙和拉美地区青年高失业率为切入点，分析其原因，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较强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全的人格、坚强的意志、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正确面对、理解社会正当竞争。
专题 7： 西班牙旅游业	旅游资源概述；旅游案例分析	结合旅游宣传视频及导游词的讲解，充分利用口笔译进行旅游知识的灌输，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导游应具备的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协作意识和灵活应变能力，培养学生具备优质的职业素养。
专题 8： 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全球化	孔子学院；塞万提斯学院	以孔子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分别在中西文化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为切入点，加强学生跨文化平等交流意识，积极寻求市场合作，挖掘中国文化感召力，树立文化品牌意识，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专题 9： 商务礼仪	中西见面礼仪；饮食礼仪；服饰礼仪；拜访礼仪；相关禁忌	通过中西商务礼仪和社会风尚的介绍，培养学生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品质，培养学生在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过程中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
专题 10： 出国留学	西班牙及拉美地区留学机制；留学就业前景；名校介绍	通过西语国家留学背景、留学机制等信息的介绍，加上一些名校的吸引，激励学生加强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促进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因为只有专业能力、工作能力提升了，目标才能实现。

6.4 实施效果

《经贸西班牙语》的授课对象为西班牙语专业大三学生,经过几轮的课程思政实践教学研究后,课题组成员通过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等方法对授课班级的教学效果进行了调研,根据教学反馈和教学评价,学生们对经贸西语课程每个专题的思政教育接受度、好感度都较高,具体表现在课前准备、课堂互动、课堂展示、课后作业等多个教学环节都能较为高效地完成,课堂授课效果明显,这对于学生文化素养的形成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及日后《经贸西班牙语》思政课程的进一步完善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经贸西班牙语》在线公开课程学习平台的建设,有利于浙江省建设外贸大省及商务强省,加深对西班牙、拉美等国家的贸易合作深度,为包括义乌、宁波在内的外贸口岸输出大批西语商务人才。此外,也为教师实际商务工作积累许多经验,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带给全体学习成员系统性的实用技能和最新资讯。

7 结 语

《经贸西班牙语》课程思政教育对高校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他们拥有较高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高校西班牙语教师要努力提升自身德育素养,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充分利用好课堂实践,除培养学生西班牙语语言技能素养之外,做好学生的思政教育,全面提升立德树人实效,以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从而最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 [1] 高燕.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问题与解决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17(8):11-15.
- [2] 陆道坤.课程思政推行中若干核心问题及解决思路——基于专业课程思政的探讨[J].思想理论教育,2018(3):64-69.
- [3] 石书臣.正确把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2018(11):57-61.
- [4] 邱伟光.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生成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17(7):10-14.
- [5] 王涵.高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反思[J].管理观察,2017(30):138-140.
- [6] 田鸿芬,付宏.课程思政:高校专业课教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J].教育与人才,2018(4):99-103.

作者简介:

耿璐,女,1991年11月生,安徽宣城人,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研究。

基于 SPOC 的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混合式 教学实证研究^①

◎楼凌玲

一直以来，传统课堂多采取“填鸭式”的满堂灌教学模式，忽略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厌倦情绪日益滋长；另一方面，授课教师往往面临学时有限及专业课系统知识繁杂的矛盾，不得不重理论而轻实践，难以使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因此，长期以来，传统教学模式一直饱受诟病。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也为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随着国内外各类 MOOC 平台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 MOOC 学习中。MOOC 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创新学习过程为学习者带来了全新的学习体验，但因呈现方式单调、针对性指导缺失、在线参与度不足、不能满足个性化学习等原因导致学习者难以进入深度学习状态。（蒋梦娇、邹霞，2014：37）再加上 MOOC 建设及后期维护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每个高校都一窝蜂不顾自身实际情况投身于 MOOC 建设显然不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亦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因此，各大高校特别是地方民办高校迫切需要寻找另一种更为有效、经济的教学模式。在此背景下，SPOC 教学模式应运而生。

SPOC 来源于 MOOC，是将 MOOC 本土化的一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林晓凡 等，2015：53）SPOC 即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也被称为私播课，相对于 MOOC 的大规模开放性，SPOC 将大量优质教学资源与小规模准入课堂相结合，是一种结合了 MOOC 与传统课堂优点的教学方式。

1 基于 SPOC 的地方民办高校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其一，通过智能互联实现教育资源共享顺应国家“互联网+教育”战略。“互联网+教育”是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科技与教育领域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互联网具有高效、快捷、方便传播的特点，在大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但能帮助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启迪智慧，更能有效刺激

^① 本论文系 2018 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课题——“基于 SPOC 的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以《语言学导论》课程为例”（N2018022）以及绍兴市教育科学 2019 年规划课题“基于 SPOC 的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以《语言学导论》课程为例”（SGJ19054）研究成果。

学生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培养其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良好行为习惯。因此,将互联网与教育相结合,在传统课堂中融入智能互联,采取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二,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法改革符合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教学实际需求。本研究在混合式教学设计原则方法的指导下开发出基于 SPOC 环境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并将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到《语言学导论》的课程教学实践中,在实践中检验该模式的教学效果,这极大地契合了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发展的时代需求。目前,大多数地方民办高校存在师资队伍梯队建设不够合理,专业带头人及骨干教师数量不足等问题,教学质量与国内一流大学存在较大差距。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法的运用,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网上现有的海量 MOOC 资源,拉近地方民办高校与知名大学的距离,使学生有机会聆听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的授课,并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更有目的的高效学习;另一方面,地方民办高校的教师也可以在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向名师学习,向先进教学方法学习,更多地了解本专业最新发展动态,以教促学,教学相长。

其三,SPOC 教学符合地方民办高校学生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新特点。地方民办高校学生文化基础相对较薄弱,主动学习能力不强,自控力不够,但这一代学生从小接触网络智能设备,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更强。因此,这些学生既无法满足于传统课堂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又对大规模开放的网上 MOOC 课程缺乏独自完成的自控力。(冯远征,2018:60)而 SPOC 则完美地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学生在利用网络媒体应用先进教学方法接受本课程的最新知识的同时,也通过教师的实时监督有效解决了单纯 MOOC 学习过程中的低完课率问题。此外,在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教师与学生线上线下互动频繁,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得到及时解决及针对性指导,从而提高学生的知识内化率。

综上所述,在教学中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一种符合“十三五”发展规划、适合当代大学生的教学模式,对改善目前普遍存在的教师授课形式化、学生考前突击化、课堂教学效率低下化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我国目前教育信息化的工作重点是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李春燕,2018:98)

2 基于 SPOC 的《语言学导论》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

为验证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可行性,笔者拟以本校英语系专业课《英语语言学导论》课程为例,开展教学实践。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利用原始班和实验班开展对照实验,收集分析实验数据进行比对,以此验证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可行性。

在研究对象方面,笔者在本校 2016 级英语专业学生中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研究

对象。实验组学生中,男生3名,女生27名,上学期高级英语1平均成绩为75.8分;对照组学生中,男生4名,女生26名,上学期高级英语1平均成绩为76.1分,将两组学生性别组成、学业成绩等一般变量进行统计学分析,计算出P值为0.99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教学实施方面,本课程授课教材为戴炜栋教授的《新编简明语言学教程》,两组学生均由同一教师执教。对照组学生采取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而实验组学生则采取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其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步,选定MOOC资源,完成课程注册。本次混合式教学改革利用的MOOC资源为“学堂在线”平台上天津外国语大学项成东教授的《英语语言学》在线开放课程。在选择混合式教学中所用MOOC资源时,名校名师因素固然重要,但更应侧重考虑所选MOOC资源的整体质量以及与自身授课计划的相关度。在对各大网络平台上的语言学相关MOOC课程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后,本教学团队一致同意选择项成东教授的课程作为本次教改的MOOC资源依托。选定MOOC资源后,实验组30名学生全部按要求完成“学堂在线”平台的注册以及指定MOOC课程的报名工作。

第二步,利用学校UMOOC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为便于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授课教师将实验组学生名单在学期初全部导入UMOOC平台。在UMOOC平台的基本信息板块,明确本课程教学目的,教学形式,并上传详细的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使每个学生对本课程有清晰的认识。在单元学习板块,每个单元按照知识点分成5~10个知识小节,每个知识小节链接“学堂在线”平台项成东教授的《英语语言学》微课视频。学生不管是通过手机端还是电脑端登录学校UMOOC平台,都可以无缝链接到指定MOOC资源,完成MOOC学习。在课程资源板块,上传了本课程组在教学过程中积累的大量PPT、案例分析、相关视频、拓展阅读等,配套每单元微课视频进行拓展学习。在课程活动板块,主要集结了讨论答疑、课程作业、在线测试及课程问卷等功能,使学生能够及时答疑解惑,并检测每个单元的知识掌握情况。学生的线上学习情况都将在网络平台上得到客观记录。为详细阐述具体授课过程,接下来笔者将以第二单元第一次课为例详细阐述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具体流程。

课前,教师发布任务清单,学生完成自主学习。每次课前,授课教师按照既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在平台上发布相应的本单元课前教学资源及每单元学习任务清单,使学生明确本节课学习内容及自主学习拟达成目标,学生按照学习任务清单进行自主学习。以第二单元第一次课为例,学生首先需要完成微课视频2.1~2.2的学习,并下载UMOOC教学平台上授课教师上传的案例及拓展阅读材料,认真研读,查询文献,做好课上分组讨论准备。在整个自主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将遇到的问题在讨论答疑区进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另外,在每一章节结束后,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参加UMOOC平台上的在线测试,检查自己对本章节的知识掌握情况。每一章节的章测试由5道选择题加五道判断题组成,学生完成测试后,系统将自动给出评分,并进行记录。教师全程从后台监督学生学习情况,并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在线测试得分情况以及在线讨论中提

出的疑难问题,针对性准备授课内容。

课中,教师重点讲述本课重难点知识,学生通过分组讨论内化知识。课堂教学是整个混合式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面对面的课堂学习弥补了在线学习虽然可以利用碎片时间灵活学习,却无法做到持续深入学习的缺陷,更好地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的内化。在第二单元第一次课的课堂教学中,首先,教师针对全班同学的自主学习情况进行本单元学习内容重点难点——音的分类以及宽式标音、严式标音的区分的集中讲解,有了前期的自主在线学习,可以有效节省介绍基础概念的时间,为深入讲解以及案例分析预留了充分的时间。其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针对前期研读的拓展阅读材料,结合本课所学知识,进行小组讨论。另外,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其他在线讨论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也需要提交小组讨论。讨论环节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适当引导及答疑。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师生讨论、组际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集体讨论环节,教师通过观察,总结归纳每一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根据每组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针对性指导,实现个性化教学。再次,每组派一名成员进行小组展示,总结本次课主要学习成果,并提出小组讨论后仍未获得解决的问题。最后,教师总结和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回答疑问,并对学生没有提到的但又很重要的知识点进行补充说明。

课后,学生完成相应作业,巩固学习成果。课后阶段是学习效果检验和知识巩固阶段,为及时了解学生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及学生是否达到下一单元学习要求,教师根据本单元知识点特别是重难点部分布置相应的在线作业进行检验。学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在线作业,并就本单元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做成学习笔记,上传 UMOOC 平台。通过练习和总结,完成知识的巩固。教师在线对作业及学习笔记进行批改打分,分数自动由 UMOOC 平台进行记录归档。

第三步,多重叠加,全方位科学考核。在教学评价方面,本门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两者分别占比 50%。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习评价作为 SPOC 混合式学习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学习的整个过程。在本课程的考核上,平时成绩占比 50%,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50%。平时成绩方面,视频学习时长占比 15%,平时作业成绩占比 20%,章测试占比 30%,课堂讨论环节表现占比 15%(由小组成员按课堂讨论过程贡献率进行分配),在线讨论占比 10%(按参与讨论次数及发言质量进行给分),学习笔记占比 10%。由于大部分学习过程在 UMOOC 平台完成,教师可在平台上实时导出各项数据,如视频学习时长、平时作业成绩、单元测试成绩等,因此过程性考核数据更加客观,过程更加简便。

但由于两个班级在过程性评价环节评价方式及内容有所差别,若是直接比较两者的总评成绩作为教学效果评价依据则不够客观。因此,本次实验中笔者将以教学过程中的六次单元测试及最终的期末考试成绩来对比两种模式的教学效果。此外,课程结束后,笔者利用 UMOOC 平台的课程问卷功能对实验组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以此了解学生对线上学习的满意度、课堂活动的满意度以及对该教学模式的整体满意度。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首先是测试结果的分析。实验组及对照组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及课程结束后将分别接受内容相同的6次单元测试及一次期末测试,以量化数据比较两组学生不同教学模式下的学习效果差异。为使结果更加客观、科学、全面,所有数据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实验过程中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进行均数比较,以 $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测试结果如下:实验组学生的前六次单元测试平均分分别为87.2、86.4、89.8、80.2、81.6、89.0,期末测试平均分为73.7,对照组学生的前六次单元测试平均分分别为77.6、81.3、85.1、75.5、74.5、80.2,期末测试平均分为68.5。从数据可见,历次测试中,实验组学生平均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分值差最小为3.1分,最大分值差达到9.6分。将数据输入SPSS 20.0软件进行T检验,得出P等于0.023031,小于0.05,表示两组平均分有显著性差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本次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对提高学生的语言学课程学习成绩效果明显。

其次是调查问卷的分析。课程结束后,笔者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调查实验班学生对新教学模式的满意度。本次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三大块,依次了解学生对线上学习的满意度、课堂活动的满意度以及对该教学模式的整体满意度。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30份,收回有效问卷30份。具体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在在线学习的满意度方面,笔者设置了五个问题。题目1“你能够熟练使用UMOOC平台开展课程学习”,选择非常同意的学生为8位,选择同意的为11位。说明超过63.3%的学生能够较熟练地使用UMOOC平台开展课程学习。当然还有大约36.7%的同学选择了一般、不同意以及非常不同意,这说明这部分同学在平台操作使用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后续需给予一定的个性化指导。题目2“你认为UMOOC平台上提供的单元学习视频质量较高”,8位学生选择了非常同意,16位学生选择了同意,说明高达80%的学生高度认可授课教师所选择的MOOC资源。当然,仍有20%的学生选择了一般、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这说明网上现有MOOC视频仍然在某些方面未能完全达到本校学生自主学习需求,授课教师之后需要在详细了解学生的真实需求后自制相关视频进行补充。题目3“你认为UMOOC平台上提供的课程拓展学习资源对该课程的学习很有帮助”,超过93.3%的学生选择了非常同意(19位)或者同意(9位),说明大部分学生高度认可授课教师提供的课外拓展学习资料并认为这些资料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该课程。题目4“你认为UMOOC平台上的答疑讨论能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惑”,15位学生选择了非常同意,9位学生选择了同意,5位同学选择了一般,另外1位同学选择了不同意。可见大部分同学认为通过UMOOC平台上的答疑讨论板块与同学老师互动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解答疑惑。题目5“UMOOC平台的学习能帮助你更好地掌握各章节知识要点”,21位同学选择了非常同意,7位学生选择了同意,剩余2位学生选择了一

般。从以上数据可见,学生对于通过 UMOOC 平台进行在线学习的认可度普遍较高,认为 UMOOC 平台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

在课堂活动的满意度方面,笔者同样设置了 5 个问题。问题 6 主要考查学生对课堂小组合作的满意度,结果显示,86.7% 的学生选择满意或非常满意,10% 的学生选择了一般,仅有 3.3% 的学生选择不满意。问题 7 主要了解课堂上教师能否较好解决学生课前线上学习遗留的困惑,22 位学生选择了非常满意,5 位学生选择了满意,这说明 90%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困惑在课堂上得到了有效解决。问题 8 “通过在课堂上的问题讨论和分析,你对所学知识掌握得更全面、更深入”,30% 的学生选择了非常同意,40% 的学生选择了同意,仅有 16.6% 的学生选择了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这说明学生认为生生讨论、师生讨论的方式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内化吸收知识。问题 9 “你认为课堂上的小组呈现环节能增强团体合作,促进与同学的交流与共同进步”,对该问题,仅有 3 名学生持否定态度,这说明大部分学生认为小组呈现有利于培养团队协作能力。而问题 10 则主要考查学生对课堂活动整体情况的满意度,14 名学生选择了满意,14 名学生选择了非常满意,1 名学生选择了一般,剩余 1 名学生选择了不满意。从上述统计结果可见,绝大部分同学对课堂活动满意度较高,他们高度认可课上的小组合作形式,认为通过小组合作能够帮助他们更深入地掌握所学知识,促进共同进步。另外,由于授课教师在课前已经通过 MOOC 平台的讨论板块以及在线测试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以及主要的难点,因此在课上能够更好地进行针对性的辅导。

在对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整体满意度上,笔者设置了 4 个选择题加 1 个开放式问题。针对问题 11 “你喜欢该课程所使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70% (8 位同学选择十分同意,13 位同学选择同意) 的同学表示了对新型教学模式的认可。问题 12 “你认为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有效促进本课程的学习”,18 位学生选择了非常同意,8 位学生选择了同意,说明高达 86.7% 的同学认可该教学模式对课程学习的促进作用;问题 13 “你认为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提高你的自主学习能力”,73.3% 的同学选择了非常同意或者同意,说明通过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大部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一定提高;问题 14 “你认为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更好促进知识的理解和深化”,仅 16.7% 的学生选择了不同意或者非常不同意,这说明大部分学生认可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对知识理解的促进作用。最后一题为开放性问题,“在基于 SPOC 的混合式学习模式下,影响你学习的因素有哪些”,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时间不充裕、平台操作不熟练以及团队合作意识欠佳。这也从侧面反映教师在未来教学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还要引领学生会时间管理、平台操作以及团队合作。当然,笔者相信,这些问题会随着混合式教改的进一步深入推广得到有效解决。

根据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发现,学生对在线学习、课堂活动安排以及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并认为这种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授课方式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知识理解知识。

结合之前的测试结果分析,笔者有理由得出结论: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地方民办高校学生的专业课学习成绩,增强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及学习效果。

4 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的优势与不足

通过前期调研、亲身授课以及各项实验数据,笔者认为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地方民办高校专业课教学中优势明显。

第一,碎片化移动学习,符合当代“90后”“00后”大学生学习习惯。目前的在校大学生多为“95后”及“00后”,这一代大学生从小习惯使用电子设备,习惯使用手机或电脑解决问题。因此,把学习任务搬到手机电脑上,让学生利用碎片时间通过观看 MOOC 视频完成自主学习,效果要远远优于对着书本预习。此外,每个学生的知识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以往传统课堂上,教师只讲授一遍,部分学生难以当堂消化吸收,又羞于当面向老师提问,久而久之,疑难点越积越多,最终导致无法按要求完成课程学习任务;而在利用 MOOC 视频进行自主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对疑难知识点进行反复多次观看,仍然存疑的知识点也可以在在线答疑以及小组讨论环节提出来,这极大地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第二,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极大地弥补 MOOC 在线学习中学生后期学习热情下降、完课率低、无法得到有效针对性指导的缺陷。在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生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到网上的优秀学习资源,了解本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课堂得到针对性的指导及督促。问卷调查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学生对课堂教学环节满意度较高,认为课堂教学能帮助他们有效地内化知识,增强团队协作能力。

第三,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改善目前民办高校教学资源匮乏、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地方民办高校由于办学历史等原因,教师队伍中青年教师占比较高,一方面,青年教师思维活跃,有更大的热情参与教学改革,给地方民办高校的教学改革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这也是地方民办高校进行混合式教学改革的有力保障;但另一方面,青年教师教学经验较为欠缺,亟须有经验的教授进行帮扶带教。因此,在地方民办高校进行混合式教学实践,青年教师通过向线上名师学习,扩展知识面,教师的业务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

第四,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有效促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师师互动,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在线上线下学习过程中,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始终贯穿其中。一方面所有互动的设置都是围绕某一项任务展开,使学生感受到参与的乐趣,从而引导学生不断深入思考,深入学习。学生的学习由过往的单打独斗转化为团队合作,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另一方面,在整个混合式教学过程中,课程组教师也需要进行频繁互动,集体备课,集体教研,大幅度提高教师整体授课质量。

当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学生在线上完成单元学习后,需进行在线测试知识的掌握情况,但由于在线测试为学生课前自主完成,教师无法进行有效监督,保证每次测试均由学生本人独立完

成,因此测试成绩的真实性有待考量。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恰恰说明线下课堂同步存在的极大必要性。教师通过线下课堂,可以再次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保证学生完成既定学习任务。

其二,由于本次混合式教改实验中的微课视频基本上完全采用了网上现有 MOOC 视频,授课教师仅提供了一些 PPT、案例、拓展阅读材料以及其他视频做补充教学,导致个别视频未能完全满足我校学生的实际需求。因此,在接下来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推广环节,笔者将根据每单元实际情况,录制一些补充视频,以更好地满足教学实际需求。

其三,个别学生在线上学习过程中抱怨平台不够稳定,导致出现作业上传后数据丢失、视频学习后观看时长未得到保留等情况。当然,笔者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肯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总之,在信息互联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教师应该积极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合理利用教育资源,努力满足学生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以实现教学质量及个人能力的双提高。

参考文献:

- [1] 冯远征.基于 MOOC 和 SPOC 的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8(34):59-62.
- [2] 蒋梦娇,邹霞.基于 MOOCs 环境的深度学习研究[J].软件导刊,2014(7):37-38.
- [3] 李春燕.国内高校中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的探讨[J].高教学刊,2017(8):97-98.
- [4] 林晓凡,胡钦太,邓彩玲.基于 SPOC 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5(10):53-57.

作者简介:

楼凌玲,女,1985年3月生,浙江省诸暨市人,硕士学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英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自动作文评阅系统评分效度验证及教学启示^①

◎王 建 张藤耀

1 引 言

写作是英语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写作评估费时费力，尤其在中国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教学环境下，大学公共外语教师一学期所教学生数量可多达数百名。限于时间和精力，教师们不得不减少学生的写作练习，以减轻作文评阅的繁重工作，结果导致学生写作训练机会减少，获得及时和详细反馈的机会减少，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近年来，为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教育技术开发商基于文本分类技术、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和潜在语义分析的，在自动作文评分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如 PEGTM, Intelligent Essay Assessor, IntelliMetric, Electronic Essay Rater 等) 引擎发展的基础上，研发出作文自动评价 (Automated Writing Evaluation, 简称 AWE) 系统 (Deane, 2013)。国外著名的 AWE 系统如 Criterion, MY Access! 及 WriteToLearn 已被广泛运用于写作教学中，不但增加了学生练习的机会，而且还在内容、组织结构、词汇和语法等方面提供及时、详细的反馈和指导，从而将系统的功用从纯粹的评分引擎转变为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工具 (Ranalli, 2018 ; Sarré et al., 2019)。

中国 AWE 系统的研发相对较晚，但是近十年来，商业性的系统如批改网、iWrite、冰果智能评阅系统等已广泛运用在中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如开发商所言，机器评阅在及时性、高效性和客观性等方面具有优势，学生可利用系统提供的“支架性 (scaffolding)”反馈激活相关的英语知识，从而促进学生二语的发展，教师亦可在最近发展区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理论指导下，引导学生进行同伴反馈。(张珊珊、徐锦芬, 2019)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机器评分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仍然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一些教师完全依赖系统对学生的书面产品进行评分，并将机器分数直接纳入形成性评估中，这极有可能导致公平性问题。此外，为了获取高的分数，学生倾向于迎合机器的评价标准欺骗系统，然而这些标准可能与人工评阅者的标准大相径庭，或与写作构念 (writing construct) 毫无关联。(Powers et al. 2002)

^① 本文系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立项课题“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民办高校英语专业写作教学有效性研究 (MBXH19YB016)”及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其有效性研究 (2019JX0014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尽管国内开发者高度评价系统的可靠性,声称自动写作评阅系统能够实现语言、内容、篇章结构及技术规范四个维度的智能评阅,但这些系统打出的分数是否真实有效,机器分数与人工分数是否高度一致,尚未广泛引起研究者及英语教师的注意。因此,本研究对国内某写作评阅系统的评分有效性进行初步研究,并探讨相关的教学启示。

2 相关研究

2.1 AWE 效度研究框架

效度是心理测量学中的一个广义术语。效度最早反映的是测试所要测量的构念是否被测到一定的程度(Kelly 1927),后来该术语指测量工具或手段的有效性,即能够准确测出所需要测量的事物的程度。目前国内有关 AWE 系统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自动系统对课堂教学辅助作用,如自动反馈对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作用、学生利用系统反馈的情况或学生对系统使用的认知,鲜有研究者从事 AWE 的效度研究,这是国内研究不足之处,因为在投入使用任何工具之前,使用者一般都希望知悉该工具的可靠性及有效性。相比,国外对 AWE 系统的效度研究较多,涉及的范围也较全面。影响较大的是 Kane 构建的自动评分系统效度论证(validity argument)框架,包括四个维度:评分(scoring)、泛化(generalization)、外推(extrapolation)和影响(implication)。(Kane, 2013; Elliot and Williamson, 2013)效度论证的具体方面较广,从人机评分的一致性、机器评分的稳定性、机器分数带来的影响到机器评分带来的后拨效应(wash-back effect)不等,详细的论证框架见表 1。

表 1 AWE 系统效度论证框架

效度论证维度	主要研究问题
评分	1. AWE 系统与人工评阅者所衡量的文章特征是否相同? 2. 作文的系统分数与人工分数是否一致?
泛化	1. 系统提供的写作任务是否充分表征写作构念? 2. 学生在完成类似的写作任务时,系统给出的分数是否相似?
外推	作文的系统分数与其他写作任务(如多项选择题等)的分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影响	1. 作文的系统分数能否充分预测课程表现并用于入学分级(placement)? 2. 对于具有同等写作水平但不同背景的学生产生的文章,系统是否给出相似分数? 3. 考生是否利用与写作构念无关的策略来获得更高的系统分数? 4. 对于相似类型的写作任务,系统给出的分数是否不受时间影响而保持一致?

表 1 中的效度论证框架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国外自动作文评分系统效度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总体来说,系统的评分效度受到研究人员更多的关注。

2.2 国内外 AWE 评分效度研究

有关 AWE 的评分效度研究始于 20 世纪末, 至今依旧受到国外研究人员广泛关注。国外研究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讨论人机评分是否相匹配。例如, Deane (2013) 报告称, AWE 系统注重文章的结构、语言结构等浅层特征, 鲜有提供关于文章论证或修辞有效性的直接证据, 这与人工评阅者差异很大。在现有文献中, 研究者检验 AWE 评分有效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比较自动评分和人工评分是否一致, 且普遍采用量化指标, 如相邻吻合一致率 (exact-plus-adjacent agreement rate) 以及皮尔逊相关系数 r 。不同于国内写作考试 (如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国外写作考试 (如雅思、托福考试) 写作分数一般低于 10 分, 人机评分相差 1 分则相差一个等级, 因此相邻吻合一致率主要计算系统评分和人工评分的分数差小于等于 1 分的文章比例。皮尔逊相关系数用于统计人机评分的相关程度, 系数越大说明两者的分数越趋向一致。由于分制的原因, 国外研究报道的相邻吻合一致率和相关系数普遍较高, 如有研究报道 IntelliMetric 的相邻吻合一致率高达 97%, 相关系数为 0.83。(Rudner et al., 2006)

尽管国外研究大多报道 AWE 系统效度、信度均较高, 但由于多数结果由开发者提供, 鲜有独立的学者给出, 因此结果的真实性的真实性不得而知。国内某系统开发者也验证了其开发的 AWE 系统的评分效度, 比较了 1456 篇 15 分制作文的机器分和人工分的结果, 发现 92.03% 的作文的分数差在 3 分以内, 换言之, 其相邻吻合一致性在 90% 以上。但这一结果亦是开发者提供, 真实情况如何, 有待独立研究的进一步证实。

国内大型考试中作文模块的评阅工作仍由人工评阅者完成, 因此大多数研究者对系统的评分效度关注不多, 更多探讨系统反馈对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作用。国内文献中只有为数不多的独立研究人员进行了此领域的探索。万鹏杰 (2005) 对某 AWE 系统的研究结果显示人机间的相关系数为 0.324, 远远低于开发者提供的系数。何旭良 (2013) 对句酷批改网的评分效度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系统分数显著高于人工分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两个研究的样本均太小, 前者为 85 篇文章, 后者仅为 30 篇, 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难以保证。此外,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日积月累地发展, AWE 系统的评分效度也有可能随之提高, 万鹏杰及何旭良的研究可能会低估机器的能力。而且两项研究都没有揭示人机评分差异的分布情况及相邻吻合一致性, 因而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存在不足。李艳玲、田夏春 (2018) 以“国际人才英语考试”的 645 篇实考作文为研究样本对 iWrite 2.0 的评分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皮尔逊相关系数 (五分打分公式人机分数 $r=0.566$)、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0.721)、完全吻合率 (38.45%)、完全及相邻吻合率 (97.98%) 和卡帕系数 (0.3518) 都较高, 据此得出结论 iWrite 2.0 评分较为理想。然而, 白丽芳、王建 (2018) 对某作文评分系统的评分有效性进行了详细研究, 除了收集人机相关系数、完全及相邻吻合一致性, 还使用了最大分数差, 指出系统无法可靠地评阅大学英语考试作文, 容易误判人工高分作文。为解释人机评分差异成因, 该研究还收集了研究语料在词汇、句法、篇章及错误等方面的量化特征并分别对人

工、机器分数建立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系统评分效度低可能是因其内部缺陷所致,机器评分主要依据浅层文本特征,不能像人工评阅那样分析深层文本特征,机器无法真正阅读、欣赏和判断文章,并且在分析深层句型结构或词汇搭配方面的能力不足。

国内 AWE 系统开发者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系统在英语作文评阅方面十分可靠,因此大部分高校都将此类系统融入写作教学中。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这些自动系统打出的分数与人工评阅者给出的分数是否真的高度一致?现有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因此本研究将对国内某 AWE 系统的评分效度进行验证,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并探讨研究结果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旨在回答:

- (1) 作文机器评分与人工评分是否一致;
- (2) AWE 系统是否会误判特定类型的作文。

3.2 研究样本

本研究通过分层取样的方法,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hinese Learner English Corpus)”中抽取 150 篇大学英语四级作文作为研究样本,所有作文均有人工原始分,分数从 6 分至 15 分不等。因语料库中 1 到 5 分作文量较少,本研究不予抽取,选取的各分数段的作文数量比例与整个语料库相当(表 2)。抽取四级作文为研究样本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为高风险考试,人工评阅者在阅卷前须详细解读评分标准并接受打分训练,评分过程会受到监督,因此人工分数相对客观、权威。四级作文评分标准将考生作文划分为 5 个档次:2 分档、5 分档、8 分档、11 分档、14 分档,每档之间相差三分。

表 2 四级样本作文各分数段分布

分数	6	7	8	9	10	11	12	13	14、15	总数
占比	12%	17%	20%	20%	14%	7%	6%	3%	1%	100%
数量	18	25	30	30	21	10	9	5	2	150

3.3 数据收集及分析

将从语料库中抽取的 150 篇文章按序排列(4001 至 4150),并提交系统进行自动

打分。目前该 AWE 系统的打分公式可人为选择, 为充分保证人机评分的可比性, 本研究选择四级打分公式 (即满分为 15 分) 作为该系统的评分依据。然后将机器打出的分数输入 excel 表格, 利用 excel 及 SPSS18.0 计算三大指标: 最大分数差指人机分数差绝对值的最大值; 相邻吻合一致率指人机评分差绝对值小于等于 3 的文章数量与文章总量之比 (四级作文每个档次相差三分); 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人机评分的相关性。前者值越大, 机器评分效度越低; 后两者值越高, 机器评分效度越高。有关人工、机器评分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也由 SPSS18.0 算出, 显著性设为 $p < .05$ 。

4 结果和讨论

4.1 作文人机评分的一致性程度

表 3 显示, 该自动评阅系统给出的最高分和最低分均低于人工分。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机器分显著低于人工分 ($p = .000 < .01$)。150 篇样本作文的机器平均分为 8.049, 显著低于人工平均分 8.77 分 ($p = .000 < .01$)。

表 3 人机平均分比较 (n=150)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分	标准差	t 值	显著性 (双侧)
人工分	6	15	8.77	1.95	3.601	.000
机器分	5.1	12	8.049	1.72		

表 4 列出了人机分数差及相邻吻合一致率的分布。所有作文样本中, 人机分数差为零的作文数量只有 3 篇, 即完全一致率仅为 2%, 人机分数完全匹配度 (exact agreement) 较低; 117 篇文章的人机分数差小于等于 3 分, 即人机评分相邻吻合一致率为 78%。国外研究指出自动评分系统与人工评阅间的相邻吻合一致性基本上要达到 75%~80% 这个水平 (Burstein et al., 2004), 按照这一标准, 机器评分满足了这一要求。其余 33 篇的人机分数差均超过 3 分, 这些文章极有可能被机器误判。国外大部分研究结果的相邻吻合一致率较高, 甚至高达 90%, 完全一致性在 48% 到 58% 甚至达到 80% (Ramineni and Williamson, 2013), 而本研究得出的结果偏低, 究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样本量或者作文分数档存在一定差异, 国外研究的样本量更大, 而且作文通常为 1 分一档, 而四级作文为 3 分一档。研究表明, 分制的不同可能会导致这一差异, 分制越低, 相邻吻合一致率往往会越高。(Ramineni and Williamson, 2013) 比如以 3 分制进行评分时, 若人工评阅者给出的分数为 2 分, 机器给的 1 分、2 分和 3 分都与人工分相邻吻合, 所以人机间理论上可以达到 100% 一致。

此外, 本研究与国内多数 AWE 系统的人机一致性研究结果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

有可能是由于样本的差异以及所研究的系统之间存在的不同导致的。比如目前各个系统具体的评分过程、评分标准并不透明,也未见详细说明,各个系统是否采用同样的评分方式不得而知,这些方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表4 人机分数差及相邻吻合一致率分布

分数差范围	0	0~0.5	0.5~1	1~1.5	1.5~2	2~2.5	2.5~3	3~3.5	3.5~4	4~4.5	4.5~7	相邻吻合一致性
作文总数	3	26	20	21	21	12	14	5	8	5	15	117
占比(%)	2	17.33	13.33	14	14	8	9.33	3.33	5.33	3.33	10	78

人机分数差异较大的是编号为4048、4110和4127三篇人工高分作文,分数差分别为6.4分、7分和4.6分。值得一提的是,四级作文的满分为15分,最大分数差如此之大,可见该自动评阅系统评分可信度需要引起使用者的注意。

本研究利用SPSS18.0对人机分数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人机分数不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仅为0.122($p=.136>.05$,见表5),而国外相关领域研究通常将相关系数设为0.7(Ramineni and Williamson, 2013),本研究结果远未达到这一起点值。研究结果的差异同样可能受分制的影响,也有研究表明不同分制的情况下,皮尔逊相关系数存在差异,分制越低,r值越高。(Shermis, 2014)然而,分制与系数的关系尚不明确,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

表5 人机分数相关性

	相关性		
	样本总数	r值	显著性(双侧)
四级作文	150	.122	.136

总的来说,该AWE系统的评分效度不尽如人意。描述性统计数据及三大效度指标都表明人机评分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就警示AWE系统开发者应着力提高机器的评分效度,同时教师应谨慎使用机器分数作为学业评估的一部分。

4.2 人机评分差异较大的作文类型及其成因

为进一步分析分数差的分布情况,本研究按照样本作文的人工分数将作文分为低(1~6分)、中(7~9分)、高(10~15分)三类,统计分析显示三类作文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p<.01$),然后分别比较其相邻吻合一致性和平均分数差(见表6)。结果表明,人机分数相邻吻合一致性在6~8分数段较高,为92.85%;在9~11分数段为

中等, 为 81.37%; 12 ~ 15 分数段较低, 仅为 36.95%。人机分数差的均值也随分数段的上升而上升, 单因素方差 (One-way ANOVA) 分析显示, 三类作文的分数差存在显著差异 ($p=.000$)。事后多重比较分析 (Post hoc Turkey's test) 表明: 低、中档作文的分数差不存在显著差异 ($p>.05$), 但均与高分档作文存在显著差异 ($p<.05$)。不同等级作文平均分数差分布情况表明, 该作文评阅系统有可能误判了人工判定的高分作文。

表 6 作文各分数段评分的一致性

分数段	低: 6 ~ 8 分 (n=73)	中: 9 ~ 11 分 (n=61)	高: 12 ~ 15 分 (n=16)
相邻吻合一致性	92.85%	81.37%	37.5%
人机分数差均值	1.43 ^a	1.88 ^a	4.11 ^b

注: 人机分数差均值上标字母 (如 a, b, c) 相同表示不存在显著差异 ($p>.05$), 不同则表示存在显著差异 ($p<.05$)。

国内外文献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如有研究比较了 E-rater (以 6 分制评分) 和人工评分的一致性, 发现在 5 分和 6 分两个高分档自动评分与人工评分的差异最大。(Burststein et al., 1998) 也有研究指出 Criterion (以 6 分制评分) 打出的低分比较可靠, 打出的高分问题较大, 并不能反映学生写作的真实水平。(Li et al., 2014) 同样的现象在葛诗利、陈潇潇 (2007) 的研究中也有提及。

AWE 系统能够较为准确评价人工低分作文, 可能主要是因为这类文章的语言和内容质量都较差。机器可以基于浅层的可量化的特征或语言错误给出客观的分数。在评价低质量的文章时, 评分过程可以依靠可量化的特征或错误, 但是在评分高质量的文章时, 必须考虑文章的内容。由于机器无法理解一篇文章, 它无法对文章的逻辑和思想做出任何判断, 只能依靠一些可量化的特征来评估文章质量, 而这些特征可能与一篇好文章毫无关联。(Condon, 2013) 因此这些量化特征可能不利于机器评分, 进而导致对人工高分作文的误判。本研究语料来自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作文, 大学四级考试为高风险考试, 在构建篇章时考生通常会选择简单的单词或常见的表达方式, 少使用低频词或表达以避免出现错误, 而这类文章有虽在词汇的复杂性方面较低, 但文章的结构、逻辑、思想表达、语言的流畅度等方面可能做得很到位, 人工评阅者在评阅作文时考虑的因素可能更为全面, 不仅看词汇等浅层指标, 还要考虑逻辑、内容等, 但这些都是机器无法欣赏的, 故有可能误判此类文章。限于文章篇幅, 本研究并未对文章的量化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未来的研究可以利用语料分析软件收集样本作文在词汇、句法、篇章、错误等方面的量化特征, 深入分析文本量化特征对人工评分及机器评分的影响及解释二者存在的差异。

4.3 研究结果对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

不可否认的是, 自动评阅系统可以为广大师生带来诸多便利。教师不用将大量时间用于评阅学生习作, 而用于精心备课。AWE 系统打破了时空的限制, 学生可以获得及时的写作反馈, 学习自主性也可以提高。但是,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发现人机评分差异较大: 机器分显著低于人工分, 所有定量指标都不尽如人意; 在无法理解文章内

容的情况下,机器极有可能误判人工高分作文。这与之前白丽芳、王建(2018)报道的系统评分效度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究其原因,目前用于机器评分的技术无法完全欣赏文章的逻辑、结构及修辞特征等方面。此外,目前机器仍无法与人工评阅者相比,人机评分所关注的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且评阅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存在何种差异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因此,大学英语教师在使用机器分数时需要考虑到系统目前仍存在的种种缺陷。

必须指出的是,多数大学英语教师限于写作评估的压力将平时作文仅交由机器评阅,将机器分纳入学生最终的成绩中,但此时学生可能会质疑:机器分数是否真的可靠?仅利用自动反馈(缺乏教师反馈)是否真的有利于写作水平的提升?若学生作文仅由机器评阅,学生的写作热情无疑会受到影响。众所周知,目前机器还无法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人的思维,还无法真正实现人机互动。最重要的是,目前自动系统评分的效度尚不明确,也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如果机器分被纳入期末成绩中,有可能导致公平性的问题,因为机器可能会低估学生的写作能力,甚至误判高质量的作文。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各教师应合理运用机器评阅,可以采用人机结合的评阅方式,吸收二者评阅作文的优势。比如,限于技术的限制,目前机器评阅可以仅限于拼写、标点、大小写等技术规范方面,识别基本的语法错误(如主谓一致、冠词使用等);教师应将写作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交流,需要阅读学生写作的内容、结构、搭配、修辞等机器不太擅长的方面,给予学生写作建设性的反馈,给出适当合理的分数;教师还可以利用写作平台分配同侪协作的写作任务,相互给予深层次的交流与反馈,提高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及写作兴趣。

总之,大学英语教师应顺应时代潮流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但又不可完全依赖现代教育技术,不可完全忽视传统写作教学的作用,应在二者间寻求平衡。

5 结 语

本研究报道了国内某 AWE 系统的评分效度,结果表明该系统的评分效度相对较低,可能需要开发者进一步验证并不断提高。我们建议教育技术人员应与大学英语教师通力合作,进一步完善系统的评分机制,因为由于目前技术等方面的局限,教师还无法完全依赖机器。我们认为该领域需要引起国内更多独立研究者和使用者的注意。

本研究只是初步探讨了该系统的评分效度,还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较之国外同类研究,本研究样本数量相对较小;其次,未探讨人机在不同文本特征方面(词汇、句法、篇章等)对文章的评阅是否存在差异,因此对人机评分差异的解释深度不够;最后,未分析人机分数差大于三分的文章的特征,也未进一步研究可能被机器误判的人工高分作文在词汇、句法、篇章、错误等方面的特征。这些问题是未来 AWE 系统开发者和研究人员可以关注和解决的方向。但值得肯定的是,本研究对于写作教学融入 AWE 系统以及将机器分数纳入学生最终成绩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Burstein J, Braden-Harder L, Chodorow M, et al. Computer analysis of essay content for automated score prediction: A Prototype automated scoring system for GMAT analytical writing assessment essays [J]. *ETS Research Report Series*, 1998(1) : 1-67.
- [2] Burstein J, Chodorow M, Leacock C. Automated essay evaluation: The Criterion online writing service [J]. *AI Magazine*, 2004, 25(3) : 27-36.
- [3] Condon W. Large-scale assessment, locally-developed measures, and automated scoring of essays: Fishing for red herrings? [J]. *Assessing Writing*, 2013 , 18(1) : 100-108.
- [4] Deane P.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and modern views of the writing construct [J]. *Assessing Writing*, 2013, 18(1) : 7-24.
- [5] Elliot N, Williamson D M. Assessing Writing special issue: Assessing writing with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J]. *Assessing Writing*, 2013 , 18(1) : 1-6.
- [6] Kane M T. Validating score interpretations and use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2013, 50(1) : 1-73.
- [7] Kelly T L. *Interpretation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s* [M]. Yonkers, New York: World Book Company, 1927.
- [8] Li Z, Link S, Ma H, et al. The role of automated writing evaluation holistic scores in the ESL classroom [J]. *System* , 2014 , 44 : 66-78.
- [9] Powers D E, Burstein J, Chodorow M, et al. Comparing the validity of automated and human scoring of essay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2002 , 26(4) : 407-425.
- [10] Ramineni, Williamson D M.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Psychometric guidelines and practices [J]. *Assessing Writing*, 2013 , 18(1) : 25-39.
- [11] Ranalli J. Automated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how well can students make use of it?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 2018(1):1-22.
- [12] Rudner L, Garcia V, Welch C. An evaluation of IntelliMetric™ essay scoring system [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2006, 4(4) : 3-21.
- [13] Sarré C, Grosbois & M, Brudermann C. Fostering accuracy in L2 writing: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rrective feedback in an experimental blended learning EFL course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19(7):1-23.
- [14] Shermis M D. State-of-the-art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Competition, resul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rom a United States demonstration [J]. *Assessing Writing*, 2014 (20) : 213-246.
- [15] 白丽芳, 王建. 人工和机器评分差异比较及成因分析 [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8(3) : 44-54.
- [16] 葛诗利, 陈潇潇. 中国 EFL 学习者自动作文评分探索 [J]. *外语界*, 2007(5) : 43-50.
- [17] 何旭良. 句酷批改网英语作文评分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J]. *现代教育技术*, 2013(5) : 64-67.
- [18] 李艳玲, 田夏春. iWrite 2.0 在线英语作文评分信度研究 [J]. *现代教育技术*, 2018(2) : 75-80.
- [19] 万鹏杰. 电子软件评估系统测试大学英语写作的研究报告 [J]. *外语电化教学*, 2005(3) : 11-13,31.

[20] 张珊珊, 徐锦芬. ZDP 视角下在线自动反馈对英语不同水平学习者写作的影响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9(5): 30-39,148.

作者简介:

王建, 男, 1989年11月生, 四川成都人,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英语写作的研究。

张藤耀, 男, 1986年12月生, 河南周口人,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商丘学院, 主要从事二语习得研究。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基于句法—形态接口的英语功能语类 T 习得研究

◎ 傅燎雁

1 引言

二语功能语类 T 习得是二语习得者的普遍困扰之一。他们掌握的语法知识中有相应的屈折形态变化规则，但他们输出的表层句法功能词缀出现变异现象。可变性主要体现在中介语中功能语类 T 屈折形态标记的缺失、误用或使用错误等。相对于英语而言，汉语为形态贫瘠语言。功能语类 T 的特征在英语句法表层表征中有具体的屈折形态体现，但在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具体形态实现方式。是否此类特征无法被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分析 UG 是否对二语学习者可及。而且从微观角度，接口理论下，对二语习得中二语句法—形态映射和特征重组问题的探讨也是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将通过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中功能语类 T 相关特征的标记情况，分析受试掌握语功能语类 T 知识的情况，探讨影响习得的因素。

2 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语言习得研究者一直在关注二语习得与一语习得的本质区别：尽管成人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第二语言，但其效果还是无法与母语者水平相当。相比较之下，儿童习得自己母语的过程就轻松得多。这个区别引发了生成语言学理论下关于二语习得普遍失败原因的研究。从宏观角度出发的研究探讨 Chomsky 的 UG 在二语语法中是否可及，二语习得者是否能成功地重新设置参数。20 世纪 90 年代，Chomsky (1995) 在最简方案中提出功能语类及其特征是语言间变化（参数变化）的根源，二语习得实际上变为特征值重新设置的过程。近些年来，在特征理论指引下，二语习得逐渐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以语言中微观参数（各类特征）的重设来解释可变性的现象成为研究热点。

2.1 特征理论

随着最简方案的发展，根据 Chomsky (2008)，语言由词库和运算系统组成，词库包括实义语类和功能语类，形式特征被视为语言结构的最基本单位。尽管特征集被认为

是通用的,但是并非所有语言都以相同的方式激活或组织特征,由此造成了语言间的差异。Chomsky(2004)提出语言获取涉及两个过程:特征选择和特征组装。一门语言的习得不一定选择UG特征库中的所有特征,而是根据语言输入,选择构建词汇项所必需的适当特征形成特征集。如功能语类T的特征,有时态、数、性和格等,其值有强有弱。所选的特征重新组装在特定词项上,把句法结构映射在词项形态上,最后推导出意义与形式匹配的等级结构表征。(Lardiere, 2009)这样语言之间的参数差异将源于特征选择以及特征的组装方式。由此,研究人员就有关二语损伤的原因出现了分歧,形成特征选择失败和特征组装失败两大观点。

2.2 特征选择

“表征缺陷假说”认为二语损伤是由于参数化特征选择失败而引起的,母语中未被选择的二语特征在关键期后无法被习得。(Hawkins and Casillas, 2008)也就是说,如果母语中的特征没有二语中对应特征的形态变化,那么二语习得者便无法选择此特征,继而无法准确进行参数重置。比如汉语时态标记,是非时态语言,没有定式和非定式之分(Hu et al, 2001),时态体现在时间副词或助词的使用上,如“过去”“正在”“了”等。按照此假说,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得动词形态特征时将存在困难,因为他们无法区分英语定式句与非定式句,英语功能语类T的[finite]或[tense]特征处于无值状态,不能被选择,无法形成符合语法的二语句法心理表征。

2.3 特征组装

Lardiere(2008)认为将特征选择作为参数设置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化”,尤其是把屈折形态的体现与功能语类特征值的习得等同起来的观点值得质疑。她认为屈折形态的习得独立于句法能力的习得。特征重组假说认为即使学习者目标特征的知识没有损伤,二语语法也可能会出现偏差,这表明二语习得问题的根源可能位于其他地方,即“特征组装”。学习者需要把母语的特征组合拆分,然后按照二语的特征组装方式重组,最后映射在二语具体词项上。而且习得难易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征类型的复杂性和特征组装方式的多样性。

部分学者基于特征重组假说进行了实证研究。Song(2015)的研究说明二语中[plural]和[count]特征能被韩国英语学习者成功组装;Mai and Yuan(2016)以英语的it-cleft结构和对应地汉语“是……的”结构为切入点,分析了英语为母语的成人学习者习得汉语特征成败的问题,调查显示受试能够成功映射对应结构,但是[past]和[telic]特征重组发展阶段情况有差异。这两个研究都得出二语习得者能够成功习得某一特征或结构,证实了特征组装假说,但是没有从反面进一步解释二语习得失败的原因。但我们认为找到二语习得失败的原因更能说明假说的解释力,而且两者都不是以汉语本族语者为研究对象,尤其前者的受试只是高级英语学习者,并且采用的任务单一,这样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相对全面性和普遍性。

国内语言研究者也在此假说框架下，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二语的情况，如刘艾娟等（2013）探讨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冠词习得因素，提出特征的复杂度会影响特征重组，给学习造成困难，但是没有考虑任务中语言输出需要处理的信息量等因素。李芝等（2019）关注了中国英语学习者时体语类的习得，研究表明受试对进行体的掌握较弱，而且特征习得难度与特征重组的复杂性相关。但是这个研究采用了偏好选择任务，并用等级量表来测量受试的偏好程度，此测量方法容易让受试有猜测和惰性心理，使得结果偏离研究初衷。前人研究较多集中在特定句法和词项的习得上。鉴于此，我们考虑采取不同的测试任务，考察不同水平的受试使用功能语类 T 的情况，来检测前人研究结果，也进一步探讨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因素。虽然景佳惠、唐承贤（2015）以中学生为对象研究了他们使用 do 屈折形式的情况，但只停留在分析中介语语法是否受损的问题，缺乏对造成问题的影响因素的深入探讨。

3 实证研究

我们的研究将以特征重组为视角，通过考察不同英语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功能类别 T 的 [±finite] 特征，EPP 特征，Φ-特征和 [±tense] 特征的标记情况，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 a. 受试是否能习得英语功能语类 T 的相关句法特征；
- b. 在特征组装过程中，重组的复杂性如何影响受试对功能语类 T 的习得，除了特征复杂程度，是否有其他影响因素。

3.1 研究对象和工具

本研究受试是来自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非英语专业学习者，他们被要求完成两种书面语法测试。我们根据大学英语四六级语言水平测试分数，把受试分为三组不同英语水平组。第一组 25 位四级分数低于 400 分的学生为初级组，第二组 25 位四级分数 450 ~ 480 分的学生为中级组，第三组为 25 位六级分数在 450 分以上学生为高级组。所有受试均是在中国英语学习环境下小学三年级开始英语学习。

本研究的测试任务是要求受试在 45 分钟内完成 10 句汉译英和 30 题语法判断，测试题参考了张俊梅（2012）和朱秀杰的设计（2012）。汉译英主要考察受试使用动词的屈折变化（-s/es, -d/ed, 不规则变化）和动词在非定式句中的形态变化情况，来分析功能类别 T 的 [finite]、[tense]、F 特征和 Φ-特征一致性标记。语法判断测试题试图考察受试关于英语主题动词相对于否定词或 VP-副词的位置直觉，来分析受试是否掌握了功能语类 T 的弱 F 特征的知识，也就是题元动词在句法推导过程不能移出 VP。另外，判断题也考察了受试的时态标记和一致性标记。

对于语法判断题，如果受试认为句子合乎语法的，则打勾，否则打叉。如果不确定句子是否符合要求，则画圈。此外，他们需要改正认为不合语法的句子。如果判断和更

正都为准确,得3分。如果判断为错误,则为0。如果判断准确但更正为错误,也为0。如果判断是准确的,但给出的校正不完全准确,则得2分。如果不确定,则标记为1。

3.2 研究结果

测试完毕后收回全部测试卷75份,均为有效卷。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软件是SPSS21。

3.2.1 动词屈折形态标记

相比于汉语,英语为形态丰富语言,只要主句或从句是定式句,动词就有屈折形态变化。表1是在翻译试题中有定环境下三组受试准确使用屈折词缀得分、应该使用得分和两者的百分比。我们用组1、组2、组3分别代表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

表1 翻译题中定式句句法一时态一致性标记情况

小组	-s	-ed	总数
1	57/195 (29.23%)	207/333 (62.16%)	264/528 (50%)
2	154/196 (78.57%)	248/320 (77.5%)	402/516 (77.91%)
3	146/161 (90.68%)	326/343 (95.04%)	472/504 (93.65%)

表1显示,初级组在一般现在时和过去时定式句中,屈折形态的准确标记率分别为29.23%和62.16%,中级组为78.57%和77.5%,高级组的准确标记率明显高于前两组。以上数据反映除了中级组,初级组和高级组的过去时定式句动词屈折形态词缀的准确使用率要高于现在时形态准确率,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英语水平较高的受试比英语水平低的受试更好地标记了动词形态。

为了充分利用数据,深入研究结果,本研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了三组受试在翻译题中有定情况下动词句法一形态一致标记准确率。表2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在一般现在时动词形态变化准确率上,组间存在显著差异($F=142.387, p=.000<0.05$)。

表2 翻译题中一般现在时句法一时态一致性标记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5.168	2	2.584	142.387	.000
组内	1.307	72	.018		
总数	6.474	74			

我们进一步对受试正确使用动词屈折形态-s/es的数据进行LSD多重比较,得出的结果显示各组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这说明更高的英语水平能让受试降低动词现在时形态屈折标记的错误率。

依据同样的方法，我们对翻译中定式句动词过去时句法—形态标记准确率进行分析。

表3 翻译题中一般过去时句法—时态一致性标记单因素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1.402	2	.701	51.147	.000
组内	.987	72	.014		
总数	2.389	74			

表3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三组受试间过去时句法—形态标记准确率存在显著差异 ($F=51.147$, $p=.000<0.05$), 且多重比较结果表明三组两两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p=.000<0.05$)。(傅燎雁, 2019) 这表明高级组学生准确使用动词过去时时态上远好于其他两组学生。

总体而言, 通过考察受试在翻译任务中对定式句子中动词屈折词缀标记情况可以得出, 初级组最容易出现句法—形态不一致的标记情况, 但随着语法水平的提高, 受试对动词屈折词缀的标记准确率逐渐提升。从测试结果可以推断出, 无论高级组还是初级组, 其实已经掌握了二语的一般现在时和过去时的语法规则, 只是缺乏动词的句法规则反映到词汇形态上的知识, 结果导致动词未能显现正确的屈折形态。由此可见, 导致形态变异的问题出现在句法—形态接口上。但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 受试能更熟练地根据二语语法知识在深层句法演算过程中选择并组装功能语类 T 的句法—时态一致性特征项, 他们的中介语浅层句法表现也越接近二语句法运算结果。总而言之, 二语特征组装方式的掌握程度随着语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3.2.2 非定式句中不定式动词的使用

汉语句法没有定式和不定式之分, 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是否无法选择英语功能语类 T 的 [finite] 特征? 表4显示了三组受试在翻译题中的动词分别在情态动词、助动词和 to 后使用准确得分和应该得分以及准确率。

表4 翻译题中非定式句中不定式动词的使用情况 (傅燎雁, 2019)

小组	情态动词 +	助动词 +	不定式 to+
1	112/121 (92.5%)	38/38 (100%)	132/137 (96.3%)
2	117/123 (95.1%)	34/34 (100%)	142/149 (95.3%)
3	112/114 (98.2%)	41/41 (100%)	173/176 (98.3%)

表4的数据显示在非定式句中受试在三种情况下使用动词的得分率都较高, 尤其是助动词后动词形态的准确率, 三组受试都达到了100%, 这基本能说明他们已经较好

地区分英语定式句与非定式句,且掌握了非定式句中不定式动词准确使用的知识。我们对三个小组未得满分两个项目数据进行了卡方检验,发现三组的情态动词+不定式动词使用没有显著差异(Pearson卡方值为0.102, $p=0.950$); to+不定式动词使用也没有显著差异(Pearson卡方值为0.040, $p=0.980$)。此分析可以说明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定式和非定式语境是可区分的,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都不会随意在非定式句中使用定式动词。可以推断出二语学习者已经充分掌握了相关知识,能够成功选择功能语类T的[finite]特征,并把它映射到词项上。

3.2.3 定式句题元动词的相关位置

英语功能语类T的F特征不仅要求英语中必须有显性主语,而且还要求题元动词必须留在VP内。为了观察在受试的中介语中功能语类T的F特征标记情况,我们分析了语法判断题中受试的表现,主要针对定式句中判断题元动词与副词、否定词的位置关系和问句中的变位。

表5 语法判断题得分

小组	否定词+动词	动词+否定词	副词+动词	动词+副词	动词原位	动词提升
1	5.92	1.08	5.08	0.92	0.80	3.20
2	6.18	0.82	5.84	0.16	0.68	3.32
3	6.68	0.32	5.88	0.12	0.32	3.68

表5数据显示题元动词与否定词、动词以及问句中准确与错误的位置摆放情况,得分差异明显。具体来讲,受试能够较准确地掌握题元动词在定式环境中的位置关系,准确率远高于错误率。这足以反映英语学习者已经较好掌握二语功能语类T的F特征知识,不会随意进行题元动词移位。

根据“特征选择假说”,英语功能语类T的F特征要求句子必须有显性主语,但是空主语在汉语中是允许的,所以推测中国英语学习者会特征选择失败,在中介语定式环境下核准空主语。为了检测这个猜测是否正确,我们统计了翻译题中人称代词做主语的情况(主宾格一体的you不计在内),发现主格均出现在定式句指定位置,甚至主格it准确填入到汉语核准空主语的句子中。这表明受试已经完全选择并重新组装设置功能语类T的F特征。

4 讨 论

4.1 二语功能语类T特征的习得成败

受试是否能够习得英语功能语类T的相关句法特征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通

过应用翻译题和语法判断题对受试进行有关英语功能语类 T 的各个特征标识的检测, 结果可以看出, 除了初级组对功能语类 T 的特征组合 [+tense]、[+ 3rd person]、[+number]、[+EPP] 掌握欠佳外, 其他特征的句法表征形式都能够在受试的中介语中较好体现。而且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 学习者对特征的掌握程度也越好, 说明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法水平能够遵循二语句法运算机制, 选择恰当特征, 重组并映射到形态上, 逐渐接近二语句法的心理表征, 准确输出二语句法形态。所以, 学习者中介语语言发展呈现渐进式的发展趋势, 受试对功能语类 T 特征的标记准确度, 随着语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提高。

4.2 影响二语功能语类 T 习得的因素

第二个研究问题是有关功能语类 T 习得的影响因素。我们的研究是否能印证文献中特征重组复杂性与习得的关系? 除了受特征复杂度的影响, 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本研究结果支持特征重组假设, 认为特征的复杂性会使特征组装多样化, 也会增加习得难度。

根据最简方案 (Chomsky, 1995), 作为一种核心语类, 功能语类 T 带有 [finite]、[tense]、[EPP], 以及 [person]、[number]、 Φ -特征等。其中 [finite] 或 [tense] 特征是可解特征, 而 Φ -特征和 [EPP] 是不可解特征, T 和 v 之间必须进行特征的一致核查。可解读特征对 v 的不可解读特征通过赋值进行删除。中国英语学习者需要将已按照汉语方式习得的形式特征表征方式进行拆分, 选择英语功能语类 T 形式特征, 按照二语的运算要求进行重组, 并重新映射至题元动词或助动词之上。如 TP 的指示语位置为第三人称单数时, 学习者需要通过提升 v 至 T 或 [present] 位置与指示语进行一致性核查, 删除 Φ -特征。如果学习者能把该深层句法特征成功反映到具体词项上, 也就是句法表层定式动词显性标记为 -s/es。但汉语定式子句中的原形动词与时间副词组合来表达不同时间概念, 没有选择以上特征。所以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功能语类 T 时, 必须要掌握其相关特征以及它们的可解读性, 才能够对相关特征按照英语的要求进行重组或提升操作。

同一个特征与不同特征结合, 会使词项体现不同的形态。如英语功能语类 T 的 [number : singular] 特征, 与 [+present] 和 [+ 3rd person] 特征结合时, 具体动词词项才具有显性形态词缀, 但与 [+past] 特征结合时, 映射到形态上没有屈折变化。因此, 学习者在习得英语功能语类 T 一般现在时要比过去时选择更多特征, 组装特征的复杂性也因此增大, 致使习得变得更加困难。这个结论也能较好解释表 1 中现在时和过去式两种时态下, 受试对前者动词标记情况要劣于后者标记的情况。根据研究结果, 我们得出二语功能语类 T 的习得难度与形式特征重组复杂性成正比。(戴曼纯, 2014)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 在翻译测试题中, 受试有时不能完美地实现表层形态屈折变化, 如把 drove 写成 drived, bought 写成 buyed 等。这些屈折形态缺失或错误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学习者二语句法系统损伤。相反, 这些错误恰好显示受试已经掌握了 [past] 特征, 很有可能是因为学习者没有把抽象的句法特征与具体的词汇形态联系, 句法没有完美地映射到词项上, 问题出在句法—形态接口上。但是根据研究数据, 随着学

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掌握程度也在提高。说明特征重组是渐进式的,句法—形态的映射能力会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提升而增强,与李芝等(2019)有关时体语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虽然我们根据前人研究推测语际差异会影响功能语类 T 的习得,语际差异越大,影响越大,但有趣的是汉语和英语在定式形式的区分上语际差异明显,受试却能近乎完美地区分并在两项任务中准确使用。最有说服力的是,受试在汉语允许主语缺失的情况下,没有丢掉目标语句中的主语,相反他们会填入虚主语 it。所以从不定式动词的使用和定式句题元动词位置的研究结果来看,语际差异比特征复杂度对习得的影响要弱得多。

通过比较受试在两个测试任务中动词屈折形态词缀的使用情况,发现不同语言水平组在语法判断题上形态标识情况均超过他们在翻译题上的表现。如受试在翻译题中会写: He give up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this university。但他却识别了 Ellis give a paper to his teacher yesterday 中的错误,并把 give 改成该语境下的准确形态 gave。就不规则动词的形态而言,语法判断题中准确率高于翻译题。这说明处理任务时的信息量会影响句法—形态映射环节。受试在做翻译时需要考虑母语和目标语间语义、句法、语用等多种差异,已经远远超出句法判断中受试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当受试在翻译时因为任务的繁重,考虑因素的多样化,他们在词汇形态输出的最后环节出现错误,使得他们会出现翻译题与语法判断题中不相符的表现。由此任务的信息量与处理压力都会干扰句法—形态间的映射,学习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错误,会偏向采用动词原形这种默认形式。

5 结 语

本研究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功能语类 T 的掌握情况,发现学习者能成功习得功能语类 T 的知识,形态变异源于句法—形态接口环节的映射问题。受试在题元动词具体形态实现上的不均衡性说明他们对特征组装类型的掌握程度存在差异,特征多样化导致重组复杂,也由此干扰句法—形态之间的映射。但是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中介语中屈折词缀的标记情况得到改善。这反映出学习者特征重组的能力能渐进式地提升,句法—形态映射也会随之完美,句法形态的实现方式也会趋向目标语。

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语际差异会影响形态的准确输出,但是其影响力远不如重组的复杂性。此外,在学习者已经习得二语功能语类 T 知识的情况下,信息处理量以及任务难度也会影响形态的完美映射。

参考文献:

- [1]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 [2] Chomsky N. On phase[C]//Feidin R, Otero C, Zubizarreta M.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Cambridge : MIT Press, 2008.
- [3] Chomsky N.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 [C]//Belletti A.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4] Hawkins R,Casillas G,et al.The semantic effects of verb raising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grammars [C]//Liceras J,Zob H, Goodluck H.*The Role of Featur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8.
- [5] Hu J H,Pan H H,Xu L J .Is there a finite vs. non–finite distinction in Chinese?[J].*Linguistics* , 2001 , 39(6) : 1117–1148.
- [6] Lardiere D. Feature assembl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 Liceras J,Zobl H,Goodluck H.*The Role of Formal Featur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8.
- [7] Lardiere D.Some thoughts on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featur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9 , 25(2) : 173–227.
- [8] Ma Z Y,Yuan B P.Uneven reassembly of tense, telicity and discourse features in L2 Acquisition of the Chinese “shi...de” cleft construction by adult English speakers [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16 , 32(2) : 247–276.
- [9] Song Y.L2 processing of plural inflection in English [J]. *Language Learning* , 2015 , 65(2) : 233–267.
- [10] 戴曼纯 . 语言接口与二语接口的习得 [J]. 外国语 , 2014(1) : 72–82.
- [11] 傅燎雁 . 特征重组模式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功能语类 T 习得研究 [J]. 海外英语 , 2019(11) : 221–222.
- [12] 景佳惠,唐承贤 . 中国学生对英语功能语类 T 的习得研究——基于中学生英语 do 的屈折形式使用的调查 [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 2015(8) : 55–59.
- [13] 李芝,戴曼纯,刘艾娟 . 句法—形态接口视角下二语时体语类习得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 2019(4) : 111–120.
- [14] 刘艾娟,戴曼纯,李芝 . 特征组装视角的英语冠词习得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13(3) : 385–392.
- [15] 张俊梅 . 中国英语学习者习得功能语类 T 的研究 [D]. 郑州: 河南师范大学 , 2012 : 53–55.
- [16] 朱秀杰 . 中国学生对英语功能语类 T 的习得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 2012(1) : 31–34.

作者简介:

傅燎雁,女,1982年10月生,浙江诸暨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二语习得和英语教学研究。

英语修辞格 Metonymy 和 Synecdoche 的对比分析

◎钱建萍

1 国内外述评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对于要不要区分 metonymy（以下简称 M）和 synecdoche（以下简称 S）这两个修辞格，国内外不同的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如蓝纯在他的《修辞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就把 M 和 S 同时包括在意义类修辞格“借代”这个条目下。他说：我们这里讨论的借代包括 S 和 M 两种情况。在实际使用中，S 和 M 之间的区别不大，早在 18 世纪，苏格兰修辞学家 George Campbell 就质疑过区分这两个修辞格的必要性。本书中我们将 S 和 M 统称为“借代”。（蓝纯，2010）

而更多的语言学家倾向于区分 M 和 S。如李树德和冯奇在《英语修辞简明教程》一书中指出：提喻是英语中的一种修辞格，经常与另一种类似的修辞格相混淆，即转喻。一些英语修辞学书籍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加上一些专家学者对这两种修辞格的想法不一致，使初学者更加困惑。（李树德、冯奇，2003）

冯翠华在《英语修辞大全》一书中也做了如下阐述：提喻经常与转喻混淆，有时甚至被当作同义词对待。这并不奇怪，因为两种修辞都涉及替代。（冯翠华，1995）

张秀国在《英语修辞学》一书中说：转喻和提喻都涉及替代。许多语言学家认为提喻是转喻的一种亚型。转喻和提喻是两种语言的混淆，人们很难区分它们。但这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张秀国，2005）

胡曙中在他的著作《现代英语修辞学》一书中同样指出：转喻（metonymy）和提喻（synecdoche）是非常相似的辞格，以至于 18 世纪英国修辞学坎贝尔（George Campbell）不知道是否应该加以区分。不过，现在不少修辞学家还是倾向于把它们区分开来。（胡曙中，2004）

黄衡田更是把 metonymy 和 synecdoche 直接编进了他的《英语易混修辞格》一书中，并对 metonymy 和 synecdoche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黄衡田，2001）

在谢祖钧编著的《英语修辞》一书中，他指出：与转喻相似，提喻也存在于英语修辞中。转喻和提喻相当于中文中的借代。（谢祖钧，1988）

在李鑫华的《英语修辞格详论》一书中，明确指出：既然提喻所涉及的也是一种指

代的关系，那么，它就容易与借代相混淆。所以学习提喻辞格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能把提喻与借代区分开。凡研究过这两个辞格的人都知道这两种辞格很难区分开来。但是，很难区分并非不能区分。（李鑫华，2000）

由上可见，国内外各语言学家对这两个修辞格的区分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那么到底这两个修辞格要不要区分、如何区分呢？下面我们就从定义、特点、理论基础等角度出发对这两个修辞格做一全面的对比和分析。

2 Metonymy 的定义和特点

2.1 定义

关于英语的 metonymy（中文通常被译为转喻、借喻、借代），*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是这样解释的：Metonymy 是一种修辞手法，即用一个事物的名称代替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的名称。换句话说，“metonymy”是一个事物代替另一个事物的名字，当然这个事物是和另一个事物相关的。这个解释基本上符合希腊语中“名字的改变”的原意。

Microsoft Encarta Dictionary（2007）对 metonymy 的定义是：“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an attribute of something is used to stand for the thing itself, e. g. 'Laurels' when it stands for 'glory' or 'brass' when it stands for 'military officers'。”意思是说，metonymy 这种修辞手法是某物的属性被用来代表该物本身，例如当它代表“荣耀”时称为“laurels 桂冠”，当它代表“军官”时称为“brass 铜”。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解释为：Metonymy 是一种修辞手法，用一个事物的名字、它的一个属性的名字或者一个密切相关的事物的名字来代替它的名字。

黄衡田（2001）在《英语易混修辞格》一书中指出：M 是事物甲的名字，而不是事物乙的名字，事物甲和事物乙在某些方面密切相关，但没有相似之处。当你想到甲的时候，也就是你想到乙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用与甲密切相关的乙来代替甲。

除此之外，*Lee's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对 metonymy 的定义如下：转喻是一种修辞手法，用来表达所说的事物和所指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以这种方式，提到一个就暗示了另一个。也就是说，转喻表达的是所说的事物与联想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有着由此及彼的紧密关系。

冯翠华（1995）在她所编著的《英语修辞大全》一书中解释如下：转喻这种修辞手法是用一个事物的名字代替另一个事物的名字。被替代的名称可能是另一个名称的属性，或者与另一个名称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它包括一个“名字的改变”，代替的名字暗示了这个指代的东西。

郭霞、尚秀叶（2008）在《大学英语写作与修辞》一书中说：metonymy 源于希腊语，意为“a change of name”。转喻是通过相近的联想，借喻体代替本体，也就是说，转喻

不仅仅是比喻，它不是说原始的东西，而是直接使用比喻的东西代替原始的东西。

胡曙中(2004)在《现代英语修辞学》一书中也提道：转喻是用一个属性或隐含义词来代替它所表示的事物或人。如：用 crown 代表 royalty，用 mitre 代表 bishop，用 wealth 代表 rich people，用 brass 代表 military officers，用 bottle 代表 wine，用 pen 代表 writers。

张秀国(2005)在《英语修辞学》一书中更是详细阐述了 metonymy 的定义：“转喻”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 metonymia，意思是“改变名字”。就像隐喻一样，它是语言的一种比喻用法，包括用一个事物的名称代替另一个事物的名称。例如，一个指称对象(被引用的东西)的名字被一个以某种语义方式相关的属性或实体的名字所代替，或者被空间上的接近或其他原因所代替。

综上所述，M 是一种修辞格，其中所说的事物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与之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事物来表达的，即相似事物之间的类比，这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而是一个近似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紧密联系，相互依赖。M 强调的不是相似性，而是联想。为了给读者或听众留下深刻印象，不仅要联想到正在写的东西，而且要联想到正在说的东西的特点，如 White House 指的是美国总统府，而 No.10 Downing Street 则指的是英国首相官邸。

M 是英语中最常见和最广泛使用的修辞格，对争论、解释，以及对人、事物、对象等的描述中都是有用的。它的基本功能是使事物或人物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使人们能够看到、感受和理解，从而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具有具体化、形象化、含蓄化、幽默化、讽刺化等功能。

2.2 特点

M 包含本体和喻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借代关系。如：What is learned in the cradle is carried to the grave. (从摇篮里学到的东西会一直带到坟墓里。) cradle 和 grave 都是喻体，相对应的本体是孩提时代和死亡。指称对象(喻体)与隐含事物(本体)之间存在着多种借代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下列几种方式进行表达：

(1) 以典型的人体组织、器官或部位代指人的抽象行为或能力。

You have a green thumb. 你具有园艺技能。这里的 green thumb 表示园艺技能。

(2) 以作家名代替作品或观念。

Have you read Mark Twain? 你读过马克·吐温的著作吗？

(3) 以局部地名代整体名，或以产地名代产品名。

Would you like a glass of Huangshan Maofeng?

(4) 以资料或工具代替事物的名称。

When the war was over, he laid down the sword and took up the pen. sword 指的是武器，pen 指的是写作事业。

(5) 以容器、房舍借代内含之物。

The kettle (=the water in the kettle) is boiling.

(6) 以商标代产品。

Our Sony worked well. 我们的索尼很好。Sony 指索尼牌收录机。

(7) 以典型的特征代替特征的所有者或物。

The red hair walked into the classroom. 红头发走进了教室。

(8) 以地名指政府、组织机构或企业名称。

Kremli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Westminster—British Parliament

Wall Street —U.S. financial center

Madison Avenue —American advertising industry

(9) 以人名指国家或人们。

Uncle Sa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ohn Bull — England, or the English people

Ivan— The Russian people

(10) 以动物名指国家或政府。

British Lion —England o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the bear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or the Soviet government

(11) 以事物指职业。

the bar — the legal profession

He has been called to the bar.

the bench — position or office of judge or magistrate

(12) 以鸟兽鱼虫指人。

Mrs Smith is nice but her husband is such a bear that nobody likes him.

She is a social butterfly.

He has been appointed to the bench.

(13) 以穿着代替人。

Are we boys going to be beaten by a bunch of skirts (=girls in skirts) ?

下面是几种比较典型的借代性联系：

(1) 借象征代替事物的名称或者通过讲特征或特定的环境，让人联想到具有该特征的或该环境下的人，例如：

The field was won after two hours of bloody fighting. 这里的 the field 实际上指的是 the battle。经过两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战斗取得了胜利。用战斗场地指代战斗。

(2) 原因和结果相代

He (fish) desperately takes the death. 它(鱼)不顾死活地吞下致命的鱼钩。句中 the death (死亡) 指 hook (鱼钩)。鱼吞下鱼钩，便会落入渔人之手，必然是死路一条。这样 death 代替了引起死亡的原因 (hook)。

(3)用感情的称谓代替感情所施加的对象。

She is coming, my life, my fate. (Tennyson)她来啦,我的生命,我的命运。句中用称谓作者对她的感情的 life(生命), fate(命运)代替她(she)。

另外,一些禁忌语也属于M范畴,例如美英对厕所一词创造了不少代用词: women, men, retiring room, washroom, ladies, gents, public comfort station等。对女厕所的名称更多: powder room, rest room, dressing room, cloak room, lavatory等。

3 Synecdoche 的定义和特点

3.1 定义

S有时被译成提喻,这个词源自希腊语,本义是“共同担起”(taking up together)。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对S的定义是:提喻是以部分代替整体或以整体代替部分;以类属代替其中一种或以一种代替其所在的类属;以原料代替用该原料制成的东西。(蓝纯,2010)该辞格中的两事物只是相关,并没有相似之处。(黄衡田,2001)

提喻应该算是借代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借代侧重于某些方面的一种表现形式。提喻侧重的方面在哪里?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在解释S时说得很清楚:提喻这种修辞格是用一个部分代表一个整体,用一个个体代表一个类别,用一种材料代表一事物,反之亦然(例如:面包替食物,军队替士兵,铜币替便士)。(李鑫华,2000)

郭霞、尚秀叶(2008)在《大学英语写作与修辞》一书中说:提喻这种修辞格中只有一个事物,但事物的原始名称并没有给出,而是借用了另一个名称。代换的方式有人与物的代换、部分与整体的代换、单数与复数的代换、抽象代替具体、具体代替抽象等。

张秀国(2005)在《英语修辞学》一书中如此说:“synecdoche”这个词来自希腊语“syneckdoche”,意思是“一起接受”。根据牛津词典,提喻法是“一种用更全面的术语表示不太全面的术语或反之亦然的术语;作为整体或部分表示整体,作为种类表示属类,作为属类表示种类,等等。”

谢祖钧(1988)在《英语修辞》一书中说道:与转喻相似,还有一个S(提喻),与转喻一起,相当于汉语中的借代。提喻也是英语中一种比较常用的修辞格,它与转喻一样在使用时只出现喻体,本体隐藏在喻体之中。提喻一般是指用小的代替大的,或者反过来以大代小等等。

总而言之,提喻是英语中一种重要的修辞格。这种修辞格应该选择事物最突出和最明显的特征来代替事物的名称。提喻可以恰当地运用,突出事物的特点,使语言生动形象。同时,提喻内涵丰富,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情感。提喻运用得当,能使语言表达简洁、生动、具体、形象,避免重复、多余,并给人以新鲜感。

3.2 特点

英语的提喻有以下几种表达方式：

(1) 部分和全体互代。

He deserted to save his skin. 他当了逃兵以苟全性命。

(2) 用抽象代替具体或具体代替抽象。

I have his ear, of course. 当然，他听我的话。这里用 ear 来暗示他听我的话，具体代抽象，既形象，又生动。

He has a smooth tongue. 他有流利的口才。以具体的舌头代替抽象的口才，其义若汉语的“巧舌如簧”。

(3) 单数代替复数。

There is a mixture of the tiger and the ape in the character of a Frenchman. 这里的 tiger 和 ape 是单数代复数，指代虎类动物和猿猴类动物，这句话中的 tiger 和 ape 指的是法国人残暴和狡猾的性格特征。

(4) 用某个人代替与其相似的一类人。

通常在用某个人代其相似的一类人时，所借用的这个人要具有某种典型特征才能代指具有这种特征的一类人。这时专有名词变成了普通名词。如：

But there are few incipient Lambs and Beerbohms in college composition course. 句中作者以 Lamb 和 Beerbohm 代表象他们那样文思敏捷、才华横溢的青年。

He is the Newton of this century. 他是本世纪的牛顿。

(5) 种类互代。

用种代表类：用 vessel 代表 ship，用 weapon 代表 sword，用 creature 代表 man，用 arms 代表 rifles，用 vehicle 代表 bicycle。

用类代表种：用 bread 代表 food，用 cutthroat 代表 assassin。

(6) 用构成某东西的材料代表那样东西。

用 silver 代表 money，用 canvas 代表 sail，用 steel 代表 sword。

4 Metonymy 和 Synecdoche 的易混性

不可否认，要区分 M 和 S 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有些例句到底是借代还是提喻，甚至一些修辞学上的专家意见都很难统一。例如，冯翠华教授（1995）就认为：“The container for the thing contained or vice versa”属于提喻的范畴，并且还举了两个例子：

The kettle is boiling. (kettle = the water in the kettle)

Two beers please. (beers = two glasses of beer) (冯翠华, 1995 : 188)

而根据上文，以上两个例子应该属于 M 下的第 5 条：“以容器、房舍借代内含之物。”

He is fond of the bottle. 他喜欢喝酒。bottle 指酒。

The kettle (=the water in the kettle) is boiling.

另外,在某种情况下,一种说法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提喻,比如在“Cetewayo had ten thousand spears at his command.”和“Lord Roughbore was out on the moors with a party of guns.”这两个句子中,“spear”和“gun”从由工具想到人的角度来看,可以被认为是“warrior”和“sportsman”的转喻,但是,同样也可以从象征代替种类的角度来说它们是“warlike power”和“game shooting”的提喻。

那么,如何才能把提喻与借代区分开呢?

5 Metonymy 和 Synecdoche 的区分

李鑫华(2000)认为要区分这两个修辞格,最重要的是在判断本体和喻体之间是否是隶属与非隶属的关系,如果是隶属的关系的,就是提喻,如果是非隶属的关系的,就是借代。他在《英语修辞格详论》一书中是如此解释的:

尽管提喻与借代都是用A代替B,尽管可以把提喻看作借代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借代侧重于某些方面的一种表现方式,但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当两事物互相没有隶属关系但又关系很紧密,说到其中一样就使人很快联想起另一样来的是借代;两者之间有隶属关系或用局部代替全部或用全部代替局部的就是提喻。

如:Let's drink a cup or two. 中的cup是借代,指代wine或者其他的饮料,这是因为wine常置于cup之中,cup与wine关系密切,说的cup,人们便联想到wine。这就是借代的特点,借用与某事物关系密切的东西来表示该事物。即借用A来表示B,但前提条件是A必须与B关系密切。

但是在下面这句话中的hand却是提喻。They were short of hands. 他们缺乏人手。虽然hand和人关系同样密切,但之所以把hand看作提喻而不是借代,原因是说话人出发点的不同或侧重点不同,用cup代wine,cup与wine之间只是相依相存的关系,两者之间没有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hand代worker是局部代整体的关系,说“手”不够,指的是“人”不够。手是身体的一部分,人们的劳动主要靠手来操作,正是这一点,让人产生联想,说话人的侧重点正借此用“局部的手”来代替“全局的人”。

同样的词汇或相类似的词汇到底是借代还是提喻要看语境,寓意不同,则辞格迥异。如:She was to be sure a girl, who excited the emotions, but I was not one to let my heart rule my head. 中的heart和head是借代,而同样是这两个词在以下的句子中却是提喻:We had dinner at ten dollars a head. / Yet there were some stout heart who attempted resistance. 这是因为单词虽然一样,但由于寓意不同其分属的辞格也就不同。借代中的heart指的是emotion,head指的是thinking,互不隶属,符合借代的定义。而提喻辞格里的head借头指人,局部代全体;第二句heart也指的是人,亦是局部代全体。

以具体的一种东西代表类或以类代替具体的一种东西也是典型的提喻辞格,因为这实际上也还是以局部代替全体或全体代替局部。它们之间依然是隶属的关系。The world

is still ignorant of the fact. 此处 world 是用“世界”这个整体指代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包括政府、民间机构、宗教组织乃至所有的人等等。这是提喻的“整体指代所有组成部分”的特点。

The women here were all dressed in cottons. 此处棉花指棉花做成的棉质衣服，存在一种隶属关系。

6 Metonymy 和 Synecdoche 的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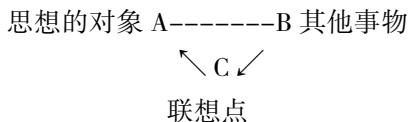
通过对两个辞格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两点。

6.1 借代是基于常规共存的由此及彼的联想

借代之所以能用不同于第一种的第二种事物取代第一种事物，是因为借代的语用基础是：第一种事物和第二种事物之间存在常规共存关系。由于 A 和 B 之间的长期密切关系，它们是共存的。正如列文森（Levinson）所说，“常规印象关系”（stereotype relationship）已经被社会的集体意识所接受，形成了当提到乙时自然与甲联系在一起（如提到十字架，教会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提到王冠，你就会想到王权或军权）。（李鑫华，2000）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借代的产生和形成取决于人们在常规共存的基础上的联想能力。借代的要义是取代，用一事物的名称取代另一事物，其构成的基础在于这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常规共存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常规共存，人们才能由乙事物联想到甲事物。而基于这种联想，才能用乙事物取代甲事物。（李鑫华，2000）借代只能作为句子中的载体来表达，既不能作为主体，也不能出现比喻词，这在公式中是很难表达的。对于借代来说，直接用 B 代替 A，然后是对 B 的描述，把 A 和 B 联系起来的任务留给接受者，也就是听者，所以从交际效果的角度来看，借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的参与，接受的效果直接决定了言语交际的成败。（李鑫华，2000）

借代有三个要素：思想的对象，其他事物，以及联想的点。例如，借代中的思想对象，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来表示。



另一方面，借代涉及一个基于经验或约定共存的联想性思维过程。这个联想思维过程有三个方面，从 B 到 C，最后到 A。

6.2 提喻可以从心理语言学句子计划与句子成分计划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句子计划中的主题结构（thematic structure）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主语谓语的问题，二是已知信息与新信息的问题，三是框架和嵌入的问题。一般来讲，句子有了

主语和谓语即向听者与读者提供了一个框架,提喻词如果是宾格词的话,其所完成的任务只是嵌入问题,而不会影响句子的整个框架,如 *They employ eighty hands.* 一句中,用 *hands* 或用 *workers* 都不影响句子的结构框架。甚至在主格上用提喻也不会影响句子的框架,如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一句中,用 *minds* 或 *men* 做主语,在框架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在句子的形式已确定的前提下,说话人考虑用哪些词来表达自己的命题要遵循效率原则 (*functional principle*)。这些原则包括:

6.2.1 涉及局部代替全体时:此局部往往是全体的要害之处

如 *I gave him a hand when he was in trouble.* 他困难的时候我帮了他一把。在表达“帮助”这一命题时,人们心理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手”。这样,以“手”代人,以“*hand*”代替“*person*”便是一语中的、击中要害式的以局部来代替全体。这既是提喻的心理基础,同时也是提喻这一辞格在句子计划与句子成分计划中的魅力所在。

6.2.2 涉及以全体代替局部时:总体的感觉大于或强于局部的感觉

如 *The taxi conked out.* 出租车出故障了。一般来讲,机动车出毛病多半出在发动机上,所以 *The taxi conked out.* = *The taxi's engine conked out.* 然后,当车子突然停下来的时候,人们的第一感觉就是车子故障的整体感觉,所以感觉因素是在表达语意和规划句子成时选择词语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6.2.3 涉及具体代替抽象或抽象代替具体时:着眼点在于表述的生动

如 *He is now left without a roof.* 一句中用 *roof* 就比用 *house* 要生动得多。

7 结 语

严格来说, *metonymy* 和 *synecdoche* 在本质上并没有很大的不同。这两个修辞格都是用一样东西代替另一样东西。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人为的规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从这两个辞格的定义、特点和理论角度出发,掌握它们在不同上下文中的意义,然后做出判断,避免混淆。

参考文献:

- [1] 冯翠华. 英语修辞大全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2] 郭霞, 尚秀叶. 大学英语写作与修辞 [M].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8.
- [3] 胡曙中. 现代英语修辞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4] 黄衡田. 英语易混修辞格 [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5] 蓝纯. 修辞学: 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 [6] 李树德, 冯奇. 英语修辞简明教程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7] 李鑫华. 英语修辞格详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8] 谢祖钧. 英语修辞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8.

[9] 张秀国. 英语修辞学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作者简介:

钱建萍, 女, 1973年7月生, 浙江绍兴人, 英语教学硕士,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语教育和英语教学研究。

青年学者园地

高校外籍教师招聘管理对策研究

——以越秀国际社区管理模式为例

◎陆海萍 张露露 祝世佳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外籍教师已成为高校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籍教师在高校师资队伍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一带一路”建设新契机之下，各高校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在科研平台建设、人文交流互动、人才培养体系、智库合作建设、国别政策研究等领域积极引进外籍教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来华工作的外籍专家、教师座谈交流时提到，中国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此战略思想的引领下，我们要实施更积极、更有效、更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让有志于来华工作、发展的外国人才来得了、待得住。我们要加快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人才制度建设，让国际人才用得好、流得动。习总书记的指示给高校引智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各高校紧抓时代契机，乘势而上，不断创新引领，广开渠道聘请不同语种、不同专业的外籍专家、教师来校工作。

外籍专家、教师的聘请与管理是一项错综复杂、涉及面广而又非常专业的工作，当前大部分高校面临着请不到外籍教师以及虽请到了但留不住的现象，影响了高校国际化进程的顺利开展。因此，分析高校外籍教师聘请管理两难的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与对策，对推进高校国际化工作办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高校引智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1.1 对外籍教师聘请问题的情况分析

当前，高校引进外籍教师总量不足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并存，引进的外籍教师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足以有效满足高校的国际化发展，高校尚未建立和健全适应外籍教师引进工作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一是外籍教师聘请需求逐年增加。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提高高校国际化办学水平，越来越多高校在课程与教学的国际化上加大投入，并聘用外籍教师作为主要的师资力量，旨在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提高整体外语应用水平。以浙江

省外语教学为例,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全省80%的高校已开设全外语或双语课程,其中宁波诺丁汉大学和温州肯恩大学所有课程均为外语或双语课程。与此同时,长短期来校外国专家所占教师比例已成为浙江省高校国际化排名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高校纷纷大力引进外国专家,力争在国际化工作中达标创优,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

2016年起,国家外国专家局对聘请外籍教师单位资格申报不做要求,这就意味着任何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都可以聘请外籍教师来华工作,因此越来越多的岗位需求出现在国际人力资源市场,国际学校、重点高中、培训机构也都不断扩大外籍教师招聘数量,充实师资力量,并将外籍教师作为招生宣传的亮点。外籍教师招聘已不再是只局限于高校之间的竞争。

二是来华优质外籍教师数量减少。在中国外语教学巨大的需求市场中,来华工作的优质外籍教师资源并不多,大部分高校都面临着找不到优质外教的窘境。各级政府虽然组织不同区域的供需见面会,但收效甚微,以2015~2017年深圳外国专家供需见面会为例,各高校提供了多个教学岗位,然而应聘者寥寥无几,三年里,应聘数与岗位数的比例分别为1:200,1:250和1:280,而且应聘者多以在华留学生为主,其中母语非英语的人员占70%。相关招聘组织也尝试组团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高校进行人才对接,拟招募高校毕业生来华任教,但成效并不明显;在权威的外教渠道拓展与聘请服务群里,通常中介机构发布一个优质外籍教师候选人,立刻会出现多个学校在群里争抢的局面。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拟受聘对象缺少对中国的了解与来华工作的热情;中国政府对来华任教人员的审批日益规范严格,对人员的要求也更具体、全面;大部分高校对高素质外籍教师的招聘没有很强的国际竞争优势。

三是外籍教师来华工作流动性较大。外籍教师来华初衷和动机多样,以英美国家人员为例,一部分是为了体验中国文化,学习中文,获得国外工作经历;一部分是出于研究中国教学管理的需要,另外还有一些属于个人换个工作环境、换个心情,以及丰富人生体验等的更短期的需要。因此,高校引进的外籍教师在办妥所有体检、保险以及居留等相关手续后马上离开的比例很高,外籍教师主动续签率非常低。因此,为满足教学需求,很多高校处于全年持续聘请的状态。高校外籍教师的迫切需求也加剧了外籍教师的流动性,他们之间相互攀比待遇,频繁跳槽。高校苦于迫切的教学需要,有时会出现外籍教师招聘“应急状态”“饥不择食”“滥竽充数”“假冒伪劣”等不良现象。

1.2 对外籍教师管理模式的综合分析

外籍教师引进、管理和服务的工作每一环节都必须合理合法,遵循外事无小事的原则。同时又要以人为本,专心研究,用心执行,耐心对待,做好每一件有关外籍教师的小事。

外籍教师具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会导致外籍教师不同的行为模式,这一特点体现在外籍教师的教学工作中。他们在从事外语教学时通常按照本国的

教学要求与思维方式来制定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却忽略了中国特色的教学环境和中国学生的基础教学特点。魏京京（2014）提出中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使外籍教师管理工作中的主客体双方都必须面对诸多文化差异和冲突，外籍教师管理人员应该具备对外籍教师文化背景的认知移情能力和交际移情能力，在沟通服务过程中保持耐心和细心。

外籍教师来自不同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外籍教师的语言文化、成长环境、专业领域以及教学观念、教学方法和组织模式等都与中国教师不同，他们在非母国工作时会因为需求的差异产生焦虑和矛盾，从而出现一些对他们来说难以克服的困难，个别外籍教师甚至选择不辞而别，让聘请高校非常被动。这些问题轻则给学校教学和管理带来一系列困扰，重则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宋雪洁（2015）对外籍教师受聘、上岗培训、教学服务和后勤保障四个方面进行了现状分析、问题剖析和对策探寻，指出高校在外籍教师管理中应该将规范管理和人文关怀相结合。

外籍教师受聘后面面对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外不同的管理和服务模式也是外籍教师来华后面面临的挑战之一，中国高校是以行政化管理为主，倾向于相对服从执行的模式，但对于来自不同文化的外籍教师，他们更多是在以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导向环境中成长的，这就导致双方对很多制度与管理有不同层面的摩擦。李倩（2011）提到外籍教师管理要淡化自己本位的权力和支配意识，要充分尊重、信任外籍教师的情绪，换位思考，以诚相待，友好合作。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外籍教师，学校每年聘请百余名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外籍教师，外籍教师需求数量较大，需求质量较高，但同时流动性也很大，聘请任务非常艰巨。同时成功引进的外籍教师到校后又有各种不适应，个别还会中途离校，提前结束合同。本研究采用抽样深度访谈法，样本为该校不同教育背景、年龄、性别和国籍的 20 名外籍教师。

2.2 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取向。相对量化研究法，质性研究法更能深刻描述和掌握在特定文化场合下的社会真实现象，结合本文拟探讨的问题，采用质性研究法更为合适。

设计深度访谈。Malhotra（马尔霍特拉，1996）认为深度访谈法是由访谈者与采访者直接接触，使用非结构性的、点对点的方式来发现受访者的基本想法、信念和态度等。访谈内容没有任何严格限制和要求，研究者事先拟定好访谈提纲，逐一提问，在实际访谈过程中也并不完全按照访谈提纲来进行，可根据谈话的情景和内容的延伸适当地追问和调整问题。

3 研究结果和对比

第一次深度访谈在2015年9月,主要目的是了解外籍教师来华工作后的各种需求,访谈对象为在校的20名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韩国、日本、西班牙、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外籍教师。通过面对面的沟通和畅谈,我们对外籍教师在华工作的相关需求做了梳理。

3.1 外籍教师个人需求的研究

一是外籍教师的基本需求,即良好、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的生理需求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包含吃、住、行等方面要求,这些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让个体面临生存危机,只有个体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其他方面需要才能成为新的需求和激励因素。外籍教师作为普通劳动者需要有基本的生活设施条件,当下我国高校提供外籍教师的居住条件已大幅度改善,但部分细节上还存在问题。

来自英国的Danny在访谈中表述他第一天到达学校,又累又饿,面对6层宿舍楼,当时非常受挫,由于没有电梯,他提着两个大行李箱爬到603室后,倒头就睡,可是一个晚上醒来了3次,脑子里都是回去的念头。他提到宿舍通常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想维修,但他不会中文,每次都要先找合作老师预约,等待很长时间后才来处理。这些情况他一直不好意思提及,现在他要离开了,觉得还是要反映一下。

外籍教师来华高校工作生活期待和谐、宽松的社会氛围。这一需求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友情的需求,即个体都期待伙伴之间、同学同事之间关系融洽,相互间保持忠诚的态度和真挚的友谊,个体都会爱别人,也希望被爱。二是对归属的需求,即个体都有一种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感情需求,希望自己成为这个群体中被关注的一员,并且能够相互关心,彼此照应。情感需求比生理需求更细致和具体,与个体的生理特征、生活经历、教育背景都有关系。外籍教师来自不同国家,在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价值观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环境,会有诸多的不适。

来自西班牙的Iukas在访谈中提到,他离开家乡后感到很孤独,虽然有合作教师会告知他很多关于教学的信息,但生活上总是缺少很多东西,他也不不好意思经常为一些小事去麻烦合作教师,可又不知道去找谁倾诉和沟通。

二是外籍教师的职业需求,即尊重和认可。普通人都希望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让自己的工作和能力得到服务对象和社会的认同。尊重需求可分为内部与外部。内部尊重通常指个体希望在不同的工作情境中有足够信心去完成工作,能独立开展工作,获得个人的自尊。而外部尊重是指个体希望在工作中有威信、有地位,受到他人的尊重、信任和肯定评价。当尊重需求得到满足时,个体能使自己充满信心,充满热情,感受到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外籍教师来华任教的动机各种各样,但是体验国外工作经历和实现自

我价值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之一。

来自英国的教育学专业老师 Anthony 曾担任英语学院的外籍教师督导，他的工作职责之一是听其他外籍教师授课并做出评估。他在访谈中提到，接到任务时，他信心百倍，认真制定听课计划，严格落实督导职责，耐心地与每个被听课的外籍教师老师交流、反馈，并上交详细的评估报告。但是在外籍教师年度考核时，Anthony 老师的评估记录与最终的全体外籍教师考核结果差距很大，因此他对自己的工作效度质疑，对学校的评估体系不理解。虽然学院和外事处和他解释了外籍教师考核的指标体系，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表达了困惑和无奈，选择在合同期满后返回英国。

外籍教师同样希望参与教学项目，被同事信赖，被学校高度评价。他们希望将自己的生活和教学经历与中国师生分享，让学生了解语言与文化的魅力，提高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尝试不同的学习方法。他们希望与中国同事交流教学方法，促进相互间的理解与合作。马斯洛认为，人们会采取不同途径来满足自我实现需要，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外籍教师管理服务是否到位，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能否充分满足外籍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外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美国心理学家 W·James 的研究表明，普通人不被激励，其工作只能发挥个人潜能的 20% ~ 30%，而被激励后其潜能就会被发挥到 80% ~ 90%。

三是外籍教师的安全需求。对于外籍教师来说，安全需求是指保障其身心安全、摆脱各种风险隐患。在外籍教师的管理中，高校遵循国家外国专家局、省市出入境管理局的安全规定，落实好外籍教师的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同时让外籍教师了解相关的中国法律和交通规则，熟悉当地的环境。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外籍教师习惯于完整、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批判性思维，初到中国时，由于制度差异和语言障碍，他们会感到处处碰壁，沮丧无助，严重缺乏安全感。

外籍教师的来华工作签证和入境后的居留办理是外籍教师十分关心的一项工作。在访谈中，美国籍教师 Edward 提到他希望到校后可以立刻办理居留，虽然工作签证上说明到校后一个月内办理即可，他也理解学校通常要等外籍教师全部到达后一起办理。但是对于外籍教师来说，第一时间办好居留会比较安心，可以让他们真正安顿下来开展工作。

3.2 外籍教师个人需求的落实

基于第一次深度访谈的结果和外籍教师聘请难的问题，学校专题研究了提高外籍教师聘请效度及管理服务质量的对策，探讨了符合校情的外籍教师管理服务思路，提出了以建设越秀国际社区为平台的管理模式。法国社会学家 F·Tunis（1887）提出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主要以意识、地域、利益、行为为特征，包含了六个要素，即居住人群、所处地域、分工与互助、文化和特质、维持与发展和归属感。越秀国际社区的建立旨在提供一个专属于外籍教师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集中大家的需求，提供各种平

台和服务,创造和谐美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越秀国际社区具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分工。社区主任由外事处管理人员担任,负责总体部署协调,落实人、财物及安全的保障;社区总协调员由外籍教师志愿者担任,具体策划和落实年度工作,社区开设教研部、文艺部、生活部、外联部等部门,分别由不同的外籍教师志愿者负责。社区的宗旨是通过各种社区会议和活动来了解并落实外籍教师的各种需求。社区在每学期初召开学期工作计划会议与预算方案会议,聘请各职能部门的外籍教师志愿者并确定相关职责,在期中通报各项工作进展,最后在期末进行财务决算与社区建设的总结与反思,同时表彰优秀外籍教师志愿者,所有会议由担任总协调的外籍教师志愿者主持召开,并将会议备忘录(MEMO)发放到各社区成员。

国际社区正式运行一学期后,进行了第二次深度访谈,主要目的是了解外籍教师对社区化管理模式的评价。具体反馈综合如下:

3.2.1 社区营造了真实的生活环境,保障了外籍教师的基本需求

澳大利亚籍教师 Karina 谈到,越秀国际社区是她到达越秀的第一站,社区工作人员帮助她落实宿舍中的各项生活设施并且对各种设施的使用进行现场解说,社区学习中心还给她介绍了中国传统习俗和相关法律法规,学校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并具体介绍了国际社区的功能,让她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来自英国的 Nicholas 非常认可社区为他们开设的基础中文课程,老师在课上通过中文教学帮助他们适应中国文化和环境。社区准备的欢迎新外籍教师的“POTLUCK DINNER”也让他倍感温馨。他提到,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教师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他们来到陌生的国度、全新的环境有诸多不适,越秀国际社区给外籍教师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和保障。

年轻的美国妈妈 Candy 感触更深,她讲到社区的氛围很和谐,很温暖,大家互相串门,互帮互助。上个月她动了一个小手术,社区成员就自发地安排时间轮流帮她带孩子,陪伴她,持续了整整一周,医院的护士由衷感叹他们之间的互助友爱。

通过国际社区管理模式,我们发现社区建设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工作方法,是与外籍教师管理工作相匹配的一种工作方法。这种方法让我们合理配置了人力资源,营造了真实的生活环境。

3.2.2 社区创造了多元的社交平台,丰富了外籍教师的情感需求

外籍教师离开家人来到陌生的国家工作时会面临新的社会文化和工作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而国际社区通过各种活动培养社区成员的自觉、参与及合作的素质,形成了一种相互包容、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共享文化,这种文化是国际社区成员所熟悉和认可的。

来自美国的教师 Marjorie 是国际社区首任总协调员,她曾是美国一中学的行政副校长,退休后与先生 Lynn 来到越秀任教,并自告奋勇担任社区总协调员,她招募外籍教师志愿者并主持会议研讨社区工作,除了落实各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员,她牵头落实每个月的活动表并做成海报。她带领大家一起为社区成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欢迎

新外籍教师的百家宴（POTLUCK）、中外节日派对、外籍教师集体生日会、教学研讨会、ZUMBA 健身课程、7 天电影比赛、女士手工坊和外出文化体验活动等。她提出社区举办活动的宗旨就是创造多样性，帮助每一位外籍教师能更好地融入社区生活，安心在中国工作，发挥个人潜能，为越秀做贡献。

法国籍博士 Maria 在清华大学任教一年后来到了越秀，她说她很喜欢社区举办的活动，使她在教学工作以及与学生互动之余的时间变得更充实，尤其是去参加 ZUMBA 健身课程，大家一起运动，互相鼓励、互相督促，一起坚持下去，取得了很好的瘦身效果。她还非常喜欢手工坊的活动，手工坊负责人 Christi 心灵手巧，教会了她们做好多家居用品，大家还一起做了一些布娃娃去送给附近希望小学一年级的朋友。

社区活动的开展既发挥了外籍教师各自的特长，又满足了他们的社会交往需求，一些公益性活动的开展还延伸了他们在华生活的社会触角。与此同时，在活动的过程中，大家相互间的了解与信任也在不断加深，从而更增强了整个国际社区的凝聚力。

3.2.3 社区搭建了教学交流研究基地，满足了外籍教师的职业需求

来自乌克兰的 Alex 是外籍教师教学联络员，也是社区教学交流研讨会的召集人。他说，研讨会每个月举行一次，第一次会议上他会详细介绍学校的教学要求，无论外籍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与否，面对全新的教学体系要求和教学对象，都需要了解和学习。除此之外，研讨会的主要内容还包括大家互相交流分享各自国家的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资源，从而带给学生更多新的学习思路和方法。研讨会中他们还会进行新老外籍教师的结对指导，实行“教学导师制”（MENTOR），帮助新入职的外籍教师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教学环境，同时也能让教学经验丰富的外籍教师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研讨会还不时邀请中国教师一起参与，探讨本国语言教学的特点和各自工作的宝贵经验，并就在越秀教学工作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交流，中方教学负责人也积极参与互动，回应他们提出的问题。

社区外籍教师志愿者通过自己的付出传播社区精神与文化，带动全体外籍教师精神饱满地投入教学工作，在工作与互助中分享自己的成长与快乐。外籍教师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学校科研工作，开展外语实训活动，参与学生第二课堂建设，合力营造越秀园氛围。外籍教师作为越秀的特色名片，以其特有的优势代表学校做公益、献爱心，服务社会。2015 年以来，越秀外籍教师在学校和绍兴市各类大型活动中展示风采，不断获得上级领导与学生的好评，多位越秀外籍教师获浙江省“西湖友谊奖”、绍兴市“兰花友谊奖”、校级的越秀“SPT 优秀外籍教师”和越秀“我最喜爱的外籍教师”称号。

3.2.4 社区增进了团队凝聚力，形成了良好的外籍教师口碑

社区的各项特色活动成为校园亮丽的风景线，社区也成为大家口中相传的“TEAM”（together everyday amazing memory）。

美国籍教师 Derric 是志愿者之一，他非常乐意参与组织各项活动。在组织运动会工作时，他是学校运动会外教方阵的领队，方阵成员一起讨论设计表演的节目、服装和道

具, 30位队员都很用心, 在他的带领下, 大家用两周的晚上时间积极排练。在开幕式当天, 没有参加方阵队的外籍教师也都早早来到现场为他们的表演助阵, 最后外教方阵获得了开幕式创新奖, Derric说大家都为自己的团队感到非常自豪。

美国籍教师Katie在访谈中分享了她和她的几个朋友的故事。她在越秀任教的第一学期, 在武汉当教师的四个美国朋友来看她, 期间与她一起参与了社区举办的“7 DAYS FILM COMPETITION”(7天电影比赛)活动, 这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参与过程让他们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与和谐,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最终促成了他们在那一学期结束后离开武汉, 来越秀任教。Katie认为这就是外籍教师社区的神奇魔力。

对此, 英国博士John也深有感触。2015年3月, 福建一所高校邀请他去该校建设《批评性思维》这门课程, 这是他的强项, 也是他的梦想, 于是他离开了越秀。但是当他国庆期间回绍兴度假时, 看到校园的一草一木和社区的朋友们, 突然感觉越秀才是他的家, 在越秀工作才能让他产生归属感。最后, 在离开一年之后, 他选择又回到了越秀。

英国籍教师Edward和美国籍教师Christin的婚礼是国际社区最有意义的活动之一。谈到这场浪漫的校园婚礼, 新郎新娘非常感谢国际社区里的每一位同事和朋友。他们说, 他俩相识、相恋在越秀, 当时双方父母都无法来华, 他俩从领证、拍婚纱照、婚礼策划、主婚人落实、婚宴操办所有环节都是社区志愿者帮助完成的, 越秀国际社区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西班牙籍教师Antonio在越秀已经工作了十年, 每次看到很多老朋友返校, 他都会非常开心。加拿大的Tait夫妇是他的好朋友, 他们已是第六次回越秀任教了, Tait夫人还曾获得浙江省西湖友谊奖, 她说越秀是他们在中国的家, 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回来。另外, 很多他认识的在绍其他高校的外教也都慕名选择来越秀工作了, 他感觉越秀的外籍教师队伍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越秀的外籍教师在合同到期时, 通常因为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离开越秀回国, 但是没有外教是因为对越秀的不满离开转聘到其他国内高校。相反, 很多外籍教师在相隔一段时间后还会重返越秀任教, 再续彼此的缘分, 越秀的学生也会经常发微博感叹, 曾教过自己回国去的外籍教师还会经常出现在越秀校园。

4 结 语

社区管理模式满足了外籍教师的需求, 促进了外籍教师招聘工作的开展, 推动了学校师资国际化工作的进程。

首先, 社区满足了外籍教师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不同需求。作为个体, 他们有人类共同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作为集体, 他们在国籍、文化、年龄和层次各方面有差异性和多样性, 除了需要更多的关注, 也需要有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配套措施和环境。

其次, 社区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工作生活环境, 成为外籍教师非常认可的管理方式。

社区平台能有效管理外籍教师的日常行政事务，帮助需要特别照顾的外籍教师，开展各种文体公益活动，保障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使大家更好地交流、分享各自的文化生活，充分体现了各自的存在感和归属感。

最后，社区形成了特有的社区多元文化内涵，并发挥了其特有的功能。社区搭建了教学交流研究基地；创造了组织关怀的平台；营造了浓郁的国际化氛围，吸引了新外籍教师的积极加盟和已离校外籍教师的主动返校；促进了越秀外籍教师队伍的品牌建设，为提高越秀国际化办学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2017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年度报告[EB/OL]. (2017-06-29) [2018-06-27]. http://www.sohu.com/a/153052779_578963.
- [2] 魏京京. 高校外教管理问题、原因及对策探析[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4(6): 202-203.
- [3] 宋雪洁. 高校外籍教师招聘及管理的思考[J]. 高教学刊, 2015(17): 208-209+211.
- [4] 李倩. 高校外籍专家和教师的聘请及管理工作初探[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2011(5): 785-786.

作者简介：

陆海萍，女，1972年1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英语教育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张露露，女，1982年11月出生，浙江新昌人，法国鲁昂高等商学院金融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衍生品市场。

祝世佳，女，1999年2月出生，绍兴文理学院学生。

地方院校国别区域研究困境及解决路径研究

——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为例

◎徐 晨 魏潘潘

1 引 言

国别区域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学术领域，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特定国家与区域的政治、外交、历史、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等，具有多学科、跨领域的特点。国别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既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前者是对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深入的研究；后者则是对国际政治以及各行为主体之间关系进行的研究。如，营救被国外恐怖分子绑架的公民时，比起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更需要的是国别区域研究为其提供情报信息支持。也就是说，国别区域研究有其特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价值，其近年来在全国的兴起，无疑与其新时期的国家需求密不可分。

1.1 我国的和平崛起为国别区域研究带来了新方向

19世纪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扩张殖民地时期，为了巩固对殖民地的统治，更好地控制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原住民，英法等欧洲强国都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区域研究的雏形。（罗林、邵玉琢，2018：80）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最大的受益国，其军事力量走出本土，向欧洲、非洲、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扩张，为了加强对控制区和占领区的有效管理，美国加强了与高校的合作研究，促成了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崛起。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国际关系与国别研究也极度兴盛，直至今日俄罗斯在全球事务和国别研究领域具有难以企及的高度和远见。由此可见，国别区域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大国的崛起，也是世界性大国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从参与到引领全球治理的角色转变，亟待通过开展国别区域研究加强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认知和理解，为我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智力保障。

1.2 “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别区域研究带来了新课题。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截至2020年2月我国已与136个国

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95 份合作协议，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形势和问题，如部分地区社会存在不稳定性、一些经济走廊存在较严重的信任赤字、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协调难度大等，这些因素加大了我国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今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项目，政府需要学术研究机构积极对相关国别和区域，特别是研究“绝对缺乏”的国家和区域进行研究，为风险防控提供知识服务。

1.3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国别区域研究带来了新机遇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后，央广“中国之声”用了《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标题，开始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大变局在带来大变数的同时，也带来了大机遇。大变局之中，既有乱局之扰、困局之难，也是布局之时、破局之机。（王俊生、秦升，2019：17）只有大力发展国别区域研究，牢牢把握时代发展变化的趋势以及中外各国的发展优势、劣势，才能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窥见百年未有之大机遇。

如上所述，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各研究机构也摩拳擦掌，试图在这一“新”研究领域“建功立业”，但对如何进行国别区域研究各高校多都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就像近年各省都在建立智库，却鲜有知晓智库如何建立，甚至对智库的作用和评价指标等也一知半解。

对于很多地方院校而言，国别区域研究是新的研究领域，设立近三年来一直在摸索中前进，很多方面的关系还未厘清。目前，国内关于国别区域研究的成果较少，多集中于国别区域研究的范式、学科设置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通过个案分析进行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论文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为例，对其在发展国别区域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及解决路径进行分析，旨在提高地方院校国别区域研究的能力。

2 发展现状

2017 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获批成为教育部备案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由东方语言学院（主要为日语系、韩语系）牵头，以市重点研究基地——东亚文化研究院为依托，下设东北亚语言文化研究所、东北亚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社会发展动态研究所等机构，聘任了校内外从事东北亚经济、文化、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一流专家、学者，实现了对东北亚地区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的多学科、交叉性综合研究。

中心定位为，“依据多语种优势，推进内涵建设，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依托，以咨政服务为宗旨，全面服务浙江省乃至国家对外战略的需求，努力将东北亚研究中心打造成为‘定位明晰、特色鲜明、机制健全、效能优良’的东北亚区域态势研究智库”。

中心发展优势明显。第一，学校全力支持，资金、硬软件投入大。第二，团队结构

合理。整合国内外各方面研究力量,组建了一支包括日、韩等外籍专家在内的30余人的研究队伍,研究人员除掌握对象国语言外,还有经济、新闻、旅游、历史等领域的专业背景,可满足多学科、跨领域国别区域研究的需求。外聘专家利用其人脉广的优势,通过举办国际、国内大型学术会议,不断扩大学校与中心的影响力。第三,与《亚洲文化》等期刊合作,实现了研究成果的多元推广。第四,学校加强制度建设,并将咨政成果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在学科和专业建设、职称评定、岗位分类管理等方面都给予了明确的政策扶持。从制度层面保障和调动了教研人员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五,与省外办、商务厅、社科联等政府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咨政建言路径顺畅。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经过两年多的摸索,依托自身优势,已在国别区域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为省市政府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智力支持。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全球爆发期间,中心编纂的《世界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简报》《日本快报》《韩国快报》等获得省委和省政府以及省直机关的肯定和认可。

3 存在问题及解决路径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别区域研究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因起步较晚,至今仍有许多关系和矛盾尚未厘清。

3.1 地方院校与985、211等直属高校

3.1.1 存在问题

地方院校相较于985、211等直属高校来说,持续发展国别区域研究动力不足。2012年,教育部为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启动了区域和国别研究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基地遴选与培育建设工作。首批入选的37个研究基地基本为直属高校,有一定的经费支持。教育部对这些培育基地的定位是“力争将培育基地发展成能够为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的研究基地”。也就是说直属高校发展国别区域研究的首要动力就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这类大学的咨政建言不仅是要服务国家决策,甚至是要影响国家决策。

2017年,教育部扩大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规模,批准了397家备案研究中心,包括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在内的许多地方院校借着这一契机开始着手进行国别区域研究。这反映出,一方面,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原有研究基地难以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国家和地方需要是高校发展国别区域研究的原始动力,但对地方院校而言如何留住校内唯一或为数不多的教育部备案中心才是发展国别区域研究的直接动力。2019年12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的全国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年会上,与会的很多地方院校都十分关注2020年教育部对备案建设研究中心的评估问题。会上也有学者提出尽快把“备案建设”去掉,认为“备案建设”带有很多不确定性,限制了研究

中心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足以看出，地方院校对省部级科研平台的重视，或者说是平台效应的重视。试想，397个教育部备案建设研究中心批准之前，有多少院校在从事国别区域研究。据此，似乎不难想象未通过教育部验收的这些备案中心将何去何从？脱离这一平台的国别区域研究经费又该如何获得？仅仅是为了教育部评估、验收而推进的国别区域研究发展必定不会长远。

3.1.2 解决路径

地方院校应把服务国家对外战略作为发展国别区域研究的动力，但绝对不应是唯一动力，需要综合利用国家需求、地方需求、社会需求、高校自身的发展需求，甚至是考虑研究人员的个人需求等。地方院校受信息获取、成果上报渠道和研究实力等影响，研究成果较难满足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所以地方高校应多从社会需求、学校需求和个人需要上深挖发展动力。

地方院校相对于所在地方或服务区域，在智力资源、人才资源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显著优势，应通过强化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努力成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库”。同时，地方院校应多方论证省市级智库建设的要求和标准，争取入选，获得省市级部门经费的支持。地方院校发展国别区域研究动因多是响应国家号召，服务地方“走出去”。与企业深度合作可以为国别区域研究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可实现互利共赢。一方面，研究机构可以为“走出去”的企业规避风险提供智力保障；另一方面，企业可为研究机构提供经费支持，增加研究机构的造血功能。

青年学者作为国别区域研究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其研究热忱的提升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推动至关重要。影响职称评审的课题、论文等是影响青年学者研究热情的主要因素。引导青年学者向国际问题研究方向倾斜，加强对课题申报的指导和论证，有助于提高青年学者课题申报的成功率，抢占该领域的研究高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际问题研究都是区别于政治学，独立分类进行评审。该领域的研究基础较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还相对薄弱，许多难题尚待破解，青年学者发挥空间较大。另外，因国别区域研究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异于其他学科，因此教育部等部门应整合学术资源，创办或筛选一批质量较高的国别区域研究学术刊物，为青年学者研究提供高端学术交流平台。

3.2 国别区域研究与传统外语教学

3.2.1 存在问题

外语教学尚未涉及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列入“五类人才”加快培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目前还未将“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列为培养目标，国别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严重滞后。

国别区域研究与教学几乎完全脱钩。科研和教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教学是科研的基础，科研也必须为教学服务。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外语教学仍然是语言教学

为主,强调对学生听、说等应用能力的培养。较以前,为了迎合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实行了“外语+英语+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方向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学、翻译、贸易、教育等。但截至目前的研究成果未反哺,(因尚未进行国别区域研究特色人才培养的探索)也不能反哺教学,本科阶段国别区域人才培养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3.2.2 解决路径

加强本科阶段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第一,可像大学外语部一样,设立人文部,以公共课的形式进行国别区域相关课程的教学。这样做,一方面为可以培养一部分学生国别区域研究的意识,另一方面,为“科研反哺教学”提供学理支撑。第二,地方院校本科外语专业应尽快设置国别区域研究方向。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提高学生考研率,另一面,也可解决因直属高校只重视研究生阶段人才培养而造成的人才培养体系不完整的问题。

地方院校更应加强国别区域研究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这既是外语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是国别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要求。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已将国别和区域研究界定为外国语言类专业的学科基础之一。《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也明确提出,“外语类专业的学科基础包括外国语言、外国文学和区域与国别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同时,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2017:50)已正式把“国别与区域研究”设定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并将其定义为“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发展进程的理论与实践”。另外,AI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也对传统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上述背景,国别区域人才培养应成为今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一个新方向。当然,这需要通过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以为其提供理论支撑。目前,全国范围看,个别院校的阿拉伯语专业和英语专业已展开了对相关课题的研究。但总体看,本科阶段国别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尚不成熟、未成体系,国别区域研究特色人才培养探索之路仍然漫长。

3.3 基础理论与现实应用服务

3.3.1 存在问题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中心设立后近两年的时间,虽都在致力于研究特色的凝练,但研究成果还是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学等基础理论研究。2019年,浙江省内进行服务“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的遴选,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捷克研究中心、浙江万里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等7家入选。这7家入选的研究机构均研究特色鲜明,且在省内处于无可替代的地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当时也参与了申报,理论成果斐然,最后因为应用性研究成果少而落选。此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开始注重应用性研究,并且定下了几个研究方向,目前时间尚短,尚无体系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特色仍不明显。另

外，研究用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获得渠道单一，多为新闻报道等，也制约了研究特色的形成和资政建言水平的提升。

3.3.2 解决路径

在保持原有理论研究优势的同时，加强应用性研究。罗林、邵玉琢（2017：84）认为高校发展国别区域研究的“后发优势”就在于“冷门”和“空白”。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都是高校推动国别区域研究的成功案例，不仅产出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而且在谋划落实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汤（加）合作办学等具体工作上为国家外交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当然，随着研究机构的日益增多，原先的“冷门”和“空白”已难以探寻，所以对地方院校而言，不应只想着“出奇制胜”。地方院校今后可以从985、211等直属高校不愿意做的“累活”中寻找特色，从长期追踪、大量搜集的原始素材中凝练研究特色，明确资政服务的方向。

提升资政服务水平，凝练成果特色。与省外事等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创新智库—政府合作的新路径，如争取参加有关部门的会议，及时、全面了解政府议事决策进程，提高专报采用率。另外，利用外籍专家的人脉资源，加强与国外研究机构深度合作，拓展信息来源渠道，提高资政建言的质量和水平。

3.4 专职教席与兼职专家

3.4.1 存在问题

国别区域研究以当地语言书写的文字资料为研究素材，所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研究中心成立初期主要依托东方语言学院专任教师，但因专任教师教学压力大，外加很多的行政管理、科研等工作，中心研究工作承担力有限。学校为解决研究员不足问题，创新了研究员聘任制度，面向全校具有外语背景的专任教师进行了公开招募，收效明显，首次共聘任了34名特约研究员。这一举措确保了中心研究工作的推进，且许多教师除掌握外语外，还有经济、新闻、旅游、历史等领域的专业背景，提升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这一举措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因研究员来自多个单位、多个专业，团队融合困难，很难形成合力；第二，研究员目前多是承担研究资料的搜集和翻译，人才培养速度缓慢，梯队建设成效不大；第三，缺少激励机制，特约研究员本身没有酬劳，团队协作完成的研究报告科研业绩难计算，研究员积极性不高；第四，未将国别区域研究领域的重要期刊列为学校评职评定认可的刊物，研究人员研究动力不足。

目前，全国国别区域研究搞得红红火火，再加上该领域的专家本来就少，的确很难寻觅适宜人选。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从校外聘任了6名专家，包括1名日籍专家，专家的到来的确夯实了中心的研究成果，通过举办各类国际、国内大型学术会议，扩大了学校和中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但引入的外部专家也存在一定局限。第一，部分专家研究领域与国别区域研究相差甚远，几十年的研究方向和根基很难摒弃，国别区域研究视野难拓展；第二，引入专家均来自国内知名高校，无政府人员参与，制

约了研究成果转化为资政服务的效能;第三,外籍专家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研究多以“单打独斗”形式进行。

3.4.2 解决路径

加大研究员培养力度。因中心研究员多来自外语、经贸等方向,缺乏国别区域研究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支撑,中心应通过举行讲座、座谈会等,提高研究员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理性分析能力,进而提升研究成果产出质量;鼓励中青年教师参加国别区域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掌握国别区域研究的最新动态和趋势;组织专家根据中心定位打磨每位研究员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力争形成合力,产出系列性成果,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

拓展外聘专家的引入渠道,提升引入的实际效果。目前,我国学者和官员在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流动尚不顺畅。但可聘请退休或离任外交官参与国别区域研究,利用其实践经验、社会阅历以及影响力,为国别区域研究带来更“接地气”的课题并确定研究方向,这样做还可拓宽研究成果转化的渠道,为政府和社会发展提供操作性更强的决策建议。同时,应提升外籍专家引入的实际效果,外籍专家的加入不应只是“新成员”的加入,而应是“新知识”“新成果”“新思维”以及“新视角”的加入。

3.5 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

3.5.1 存在问题

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和研究人员因为语言、经历与知识结构的差异,形成了自己熟悉哪个国家或者语言,就会关注哪个国家的局面,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整个区域的总体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对日本、韩国、朝鲜或蒙古等单个国家的国别研究。东北亚这一区域生机和风险并存,历史与现实、区内与区外、双边与诸边等利益和矛盾相互粘连,相互交叉。离开区域的国别研究成果很难为双边,甚至是东北亚区域发展提供富于实际价值的预判和解决方案。

3.5.2 解决路径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持续推进,地方院校应克服研究人员掌握外语单一劣势,组建区域研究团队,加强区域研究。如新冠疫情暴发的当下,应在东北亚区域内深入研究“东北亚联防联供机制”“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的中日韩经济深化合作机制以及“中日韩企业家特许入境机制”等问题,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情报信息支撑。

4 结 语

目前,我国的国别区域研究虽然实现了“全覆盖”,但如何突破各个研究机构的发展瓶颈,最大限度发挥各个研究机构的智慧和优势,需要国别区域研究人员进行不断研究。现阶段,许多地方院校都遇到了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一样的困境,甚至问题更多,

这就要求地方院校从以下五方面努力，尽快摆脱困境、步入正轨，为服务国家和地方的对外战略提供强力的智力支撑。第一，明确定位，深挖国别区域研究持续发展的动力；第二，强调科研反哺教学，探索外语专业国别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新模式；第三，加强应用性研究，提高资政服务水平，凝练研究特色；第四，加强青年学者培养的同时，拓展外聘专家的引入渠道；第五，整合研究力量，大力发展区域研究。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 [2] 罗林, 邵玉琢. “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18(6): 79-87.
- [3] 王俊生, 秦升.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机遇 [J]. 红旗文稿, 2019(7): 14-17.

作者简介：

徐晨，女，1992年9月生，黑龙江大庆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日语系教师，主要从事日语教育、国别与区域研究等。

魏潘潘，男，1986年10月，山东巨野人，教育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处副处长、东方语言学院韩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韩国语教育、韩国舆情和国别与区域研究。

社会历史视域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

◎吴文艳 杨 晶

1 引言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开拓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事业。在新闻传播领域，他做出了特殊的理论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重新深入研究列宁新闻观的呼声越来越高，学者们先后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不能缺少对列宁的研究”（高金萍、王纪澎，2020）、“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不能分割列宁主义的作用与影响”（程曼丽，2019）。本文认为，对于列宁新闻观的研究要深入历史发展逻辑，理解其理论逻辑。列宁深刻辨析社会历史矛盾，发展新闻事业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工作及其规律的理论特质。

2 发展东方社会形态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创立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更加全面地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其研究发生了空间转向。他们将视野投向了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他们看到，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其内部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西欧社会，并且正处于“革命的前夜”。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探索事业，他认识到俄国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异常严重，人民大众“由于本能、感情和热望，都同情反对资本家的革命”（列宁，1917）。但是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使革命主体性受到严重制约，人民群众在精神上缺乏革命的韧性，“批判的武器”无法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人的发展程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程度，俄国民众阶级意识上的落后阻碍俄国的革命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推进了历史进程，创造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私有制使劳动者同劳动产品之间处于异化关系，工人无产阶级代表生产力但是不占有生产资料。当劳资矛盾尖锐化时，无产阶级采用颠覆性的革命手段重组国家—社会关系，使人民群众成为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同一占有主体，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历史的狡计”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着这个

制度的掘墓人，工人阶级是自己解放自己的主体力量。然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完全不同于西欧社会。19世纪末的俄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但是俄国封建制与农奴制残余阻碍生产力向纵深发展，绝大多数俄国民众还是局限在宗法式与小商品经济之中，并没有成长为现代无产阶级。缺乏现代大工业训练的俄国无产阶级必然陷入狭隘的、地方性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成员有反抗统治阶级的直觉，但缺乏推翻统治阶级的组织力。无产阶级成员只有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与科学理论相结合，产生成熟的阶级意识，认识到个人的行动是无法对抗反动的统治阶级，必须以整体性组织行动来实现阶级利益时，个人的利益才能如愿以偿。为此，“单凭突击、冲动、热情，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唯有组织、坚毅、觉悟才能有济于事”，人民群众着眼于眼前利益的自发性必须上升到对阶级共同体利益的自觉阶级意识，“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列宁，1920）。

为此，报纸要积极发挥宣传鼓动作用，启发人民群众自觉阶级意识，让人民群众发挥出历史推动力量。马克思在创办《莱茵报》时说：“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他担心的不是群众掌握不了理论，而是写作者怎么把理论说“彻底”，这就要求写作者在社会实践中淬炼理论的力量。列宁强烈认同这一观点，明确要以实际生活和利益来引导人民群众的革命本能。他认为，实际生活是阶级意识的真正来源，但是在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俄国，有必要用新闻宣传工作激发阶级意识的能动性。

总之，列宁立足东方社会特征，探索新闻宣传与阶级意识的关系，大大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内涵。

第一，开展以“灌输论”为基础的新闻宣传工作。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崇拜自发性，否定客观现实与阶级力量，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左派社会主义”一味地夸大工人阶级的“总体性”阶级意识，落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深渊。列宁认为，俄国革命有客观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力量，以此为基础，通过新闻宣传组织和鼓动人民各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就有了现实依据。1900年，列宁为《火星报》创刊号撰写了题为《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的社论。他指出，工人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的理论创造。在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民主教育方式掌握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1902）。看上去，“灌输”是一个精英色彩浓厚的论述，因而在党内引起了广泛争论。实际上，“灌输论”是针对东方社会革命实践远远落后于革命理论的现实而提出的策略。列宁一生的新闻实践以政治评论见长，发表的绝大多数新闻评论内容都是同阶级分析法揭露时事新闻背后的本质，引导人民大众的阶级意识与集体行动达成一致。

第二，开展以“科学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闻舆论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报刊上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否定的意识”与“虚假的意识”来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列宁进一步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称之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党的报刊要宣传“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1900）在创办《火星报》时就

声明,“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党的报刊应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同时,报刊鼓励发表党内各种声音,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但是不能“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列宁,1900),而应公开对意见分歧进行评论与指导,引导党内同志掌握正确的意见。

第三,党的新闻传播工作要照顾具体的受众水平。列宁按照传播原理指出,报刊的受众对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党的报刊应根据受众的理论程度与文化水平做好分众化传播。他指出,无产阶级受众主要分为先进、中等与水平低三个部分。针对先进部分,党的报刊必须代表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不能迁就工人的最低水平,“它不仅不应该人为地降低自己的水平,反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对于中等水平的工人,报刊则可以采用通俗化的口头传播或文字传播等方式。对于水平低的工人,报刊内容要“全面照顾地区、职业及其他方面的特点”(列宁,1899)。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发展无线电技术,关注电视技术,开拓电影市场。站在传播角度,列宁认为无声的电视电影与无线电广播分别作为视觉与听觉媒体,是当时最适合在文盲率高达90%的俄国人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的媒介工具。

3 发展资本主义垄断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哪个天才人物脑袋里蹦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成为主导趋势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掌握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历史条件,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将继续发展所属时代的具体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们从宏观的社会传播过程视角分析资本“时间消灭空间”的世界交往特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电报等精神交往技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在革命路径上,从实现人的“类”本质的政治解放演进到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劳动解放,在思想武器上,从人民报刊的理念演进到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历史使命。1848年,马克思主义诞生,欧洲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由于当时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力量较强,工人的组织性却很落后,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过新闻舆论工作来鼓舞无产阶级群众。于是,他们在普鲁士莱茵省的科伦市出版《新莱茵报》,以此为阵地号召无产阶级不能因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陷入消极被动,应该积极主动组织起来,适时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这份无产阶级政党报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反动当局查封了,但是它成功地发挥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干预运动、组织斗争的功能。1871年马克思总结法国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就此提出在各个民族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报刊也随之进入了大发展期。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发展党的建设学说,一方面发展党报理论与经验,他们利用报纸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做斗争,捍卫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战斗性。但是,马克

思、恩格斯无论怎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其政党形式都必须参照西欧资本主义政党，不能脱离西欧社会历史的条件。

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不同，列宁处在资本主义垄断时期。恩格斯去世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国际组织的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抬头，在思想上整体停留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阶段，所有的活动都局限在议会、罢工等“合法”斗争范围内，其新闻自由理念局限于民主主义，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建立在松散的自愿联盟基础上。虽然推动了各国政党之间民主交流，但是这也使第二国际组织缺乏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这些都显示第二国际没有顺应时代变迁，做好转向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实践准备。列宁认为，第二国际必然要走向破产，已完成帝国主义过渡的俄国不同于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它兼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主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面对异常强大的反动阶级统治，必须要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所谓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就是不能照搬西欧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它应该是强有力的、集中的政党，因此不能仅靠党员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自觉代表来组建“自愿的党”，还要靠党的规章制度来建设思想上与组织上统一与集中的党。

列宁青睐《新莱茵报》的光辉历史，称赞它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他受其鼓舞与启发创办党的全俄机关报、改革编辑部体制，以此来强化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架构与集体领导能力，推进俄国革命进程。

第一，党的报刊要坚持党性原则。俄国沙皇政府比西欧资产阶级政府反动数倍，俄国人民深受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双重压迫，既受经济剥削又无政治民主。无产阶级政党没有结社自由与新闻自由，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很容易在党内形成各立山头的团团伙伙，破坏党的统一。因此，列宁要求党要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毛泽东（1945）评价列宁的党性就是：“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党可以通过传播渠道把自己的意志与观念传播给每一个党员，以此让全党上下统一思想与行动。就此，列宁着手公开出版党的机关报。党的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够克服小组习气，就在于它“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列宁，1905），它要反映全党的共同意志。因此，党的报刊要首先坚持党性，服从党的领导，才能充分发挥统一全党思想的作用。

第二，党的报刊要发挥“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列宁看到，在无产阶级政党无法公开活动、只能采取秘密活动的条件下，党的出版物是思想上组织政党的武器。“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列宁，1901）列宁组建《火星报》与《曙光》杂志编辑部，通过报刊的通讯网络将分散在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实现了党的重建。《火星报》被列宁比作“基线”，它将分散各地的党小组与个人“串联”起来，它又被比作搭在建筑物周围的“脚手架”，它使党小组、个人与党中央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强调党的报刊在党组织落实集中制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党的组织和报刊就忽略民主制。从列宁的实践策略来看，当来自党外的挑战减弱，党内的团结更加自主，他就越提倡民主制的广泛实施，反之，组织的集中就会被强化。

第三，完善党的中央机关报体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第二国际的支部，其

包括党报体制在内的党的组织结构体制都参照了西欧工人政党，这导致其无法应对俄国反动政府压制政治自由的现实。因此，列宁认为有必要改革党的中央机关报体制。1903年党的二大在列宁的倡议下，在党章中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前者负责思想上的领导工作，后者负责直接的实际的领导工作，两个领导机构要在恪守党纲的基础上确保行动一致。但是在实践中，这两个机构之间分歧重重。1905年党的三大明确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任命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12年党的布拉格会议最终确认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和监督机关报编辑部的体制。

4 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以其理论洞见与亲身实践探索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活动的新闻传播规律。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习近平，2013）。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具体思考过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规律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宣布，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属于人民，最关键的就是生产资料从剥削阶级手中转归为全体劳动者所有，这其中也包括新闻出版业的生产资料。列宁起草的《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中明确，人民享有出版自由权利的前提就是要将造纸厂和印刷所等相关的生产资料实现国有化，由国家分配给劳动者。随着人民群众掌握新闻传播权利并赋予媒体职业权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主题也就由无产阶级政党新闻事业拓展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列宁作为国家领导人首次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新闻传播事业建设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第一，苏维埃报刊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18年春天，列宁领导苏俄退出世界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并提出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来，苏维埃报刊同样应该“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列宁，1918），概括起来就是“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俄国革命时期，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党的报刊的重心是宣传革命口号、鼓动革命热情。随着党获得执政权，苏维埃迫切的任务就是用实实在在的经济建设及其成果来兑现党服务人民群众的承诺，苏维埃新闻工作也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展开，“生产宣传应当重新放在第一位”（列宁，1920）。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报刊应加强对生产和建设的宣传，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第二，报刊具有商品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次论述过报刊的商品属性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研究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否实行商品经济体制，及其与报刊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列宁这里得到了现实回应。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时期，列宁为了应对国内资源紧缺等困境，企图用军事化手段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阶段，他片面关注报纸的事业性，重点强调报纸的职能主要是政

治社会化与劳动纪律教育。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承认经济文化落后的苏俄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要经历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商品经济体制是实现小生产经济向大生产经济过渡的必要手段。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列宁关注报刊的商品属性问题。他指示人民委员会制定和颁布报刊收费的法令，将报刊的发行制度由分配制改为订阅制，结束了报刊免费发行的做法。在党的十一大上，列宁建议大会允许《真理报》刊登广告，承认报刊要通过广告增加收入，为报刊提升自身质量与竞争力提供经费来源。

第三，苏维埃出版物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列宁晚年在“政治遗嘱”中提出来，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列宁关于工作重心“转到文化组织工作”与“转到经济建设”之间是不矛盾的。他意识到，文化落后与经济落后是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困难，其中他更重视文化组织工作，因为文化关涉人的精神能动性，文化在苏俄的普及与提高，能使群众在经济上掌握提高劳动生产率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政治上提升保障民主权利所需的管理与监督能力。“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1923）无产阶级文化要善于吸收包括俄国传统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遗产，前提是党要掌握文化领导权。在党的文化领导工作中，列宁最重视的就是思想宣传与新闻舆论工作。新经济政策时期，面对私营出版业日益繁荣、消遣类图书异常热销的现象，列宁多次指示苏维埃图书出版业要沉下心来多撰写通俗易懂、贴近群众、喜闻乐见的出版物来讲清社会主义常识，回应民众关切的社会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提升文化产品竞争优势，运用商品经济规律夺取文化领导权。

第四，发展先进媒介技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认真考察并详细论述了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电报技术及其在世界交往体系中的革命性作用。列宁处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无线电技术是当时的新型媒介技术。一方面，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从世界交往的角度论述了无线电广播技术的革命意义，它实现了信息从有线传输到无线传输的技术革命，列宁将这一新媒体特征概括为“不要电线的报纸”。另一方面，列宁又从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角度高度关注无线电广播的战略意义。在国内，列宁反复强调这项技术的成功将会给宣传工作带来极大的益处。俄国地域广袤，国内绝大多数人口与政治经济中心聚集在东部，远东地区地广人稀，东部地区面向远东地区开展宣传工作更加需要无线电广播的支持。在国际上，苏俄政府利用无线电广播与英、法、德等国实现了国际新闻的交换，同时对外传播苏俄宪法与新经济政策等信息，让西方世界更加全面而客观地了解苏俄与社会主义。

5 结论：列宁新闻观的现实启示

列宁的新闻观顺应世界历史趋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的重心由西方转到了东方。其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的新闻工作实际，发展了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毛泽东,1942)不能否认,列宁新闻观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组织架构、体制机制、职责功能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便到了今天,它对于当代中国新闻工作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启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与竞争的时代。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依然顽强,它无法克服自身的根本性矛盾,就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领域,时刻企图用普世价值占据道德制高点。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抢夺领导权。党是唯一没有私人利益的政党,因而只有它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只有它的党性是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就是要落实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凝聚全社会的共同理想,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增强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

第二,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深化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时代主题已经从列宁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转变为和平和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的时代趋势孕育着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党的新闻媒体要通过实现新闻传播方式、媒介组织管理以及媒介技术的现代化,来提升群众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获得感。

第三,立足于中国最大的实际,践行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这是党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与现实方位的精准判断。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发展状况,制定“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争取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段征途中,党的新闻工作者要结合国情与社情,牢记和践行团结人民和组织群众的职责和使命,将职业信仰与民族信仰联系起来,将党的奋斗目标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发挥好思想宣传与舆论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祁涛.列宁新闻思想中的方法论特质及其表达[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72(3):20-27.
- [2] 童兵.试析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思想与政策实践——为纪念列宁150周年诞辰而作[J].新闻大学,2020(3):46-60,118-119.
- [3] 程曼丽.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忽视列宁主义——兼谈从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化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J].新闻与写作,2019(11):65-70.
- [4] 王飞霞.新闻、出版自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读列宁《关于“出版自由”》[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8):4-7.
- [5] 刘建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性与实践性[J].国际新闻界,2006(1):5-10.

作者简介：

吴文艳，女，1989年2月生，湖南衡阳人，翻译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国际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新闻传播研究。

杨晶，男，1984年8月生，江苏无锡人，法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传播研究。

责任编辑 云岩涛

装帧设计



语言与文化论坛

Forum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SSN 978-7-5108-9307-0



9 787510 893070 >

定价:35.00元